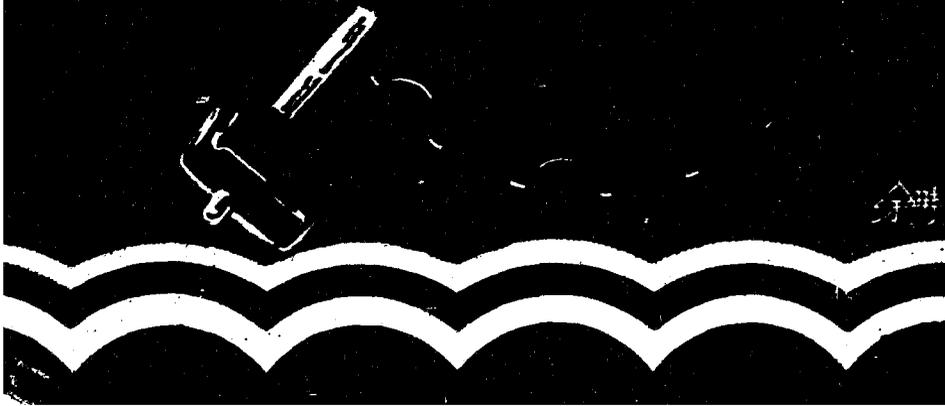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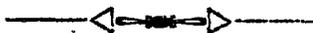
蘇
濬
都
宗
嚴



蘇俄治下的宗教

赫刻博士原著

張仕章補譯



◁ 一九三一年出版 ▷

譯者自序

近年來中國的出版界中關於蘇俄政治，經濟，教育，婦女和文藝方面的書籍已經編譯得很多了；但是關於宗教方面，簡直一本也找不到。這豈不是一種缺憾麼？況且宗教在蘇俄政府底下早已成爲一個極大的問題，並且也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注意。我們爲什麼還抱漠視態度，而不肯去研究牠呢；所以我特地把本書譯成中文，以供中國學者們的參攷。

這本『蘇俄治下的宗教』原名爲 Religion Under the Soviets，是美國先鋒書局 (Vanguard Press) 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蘇俄研究叢書之一。叢書的編者爲雅魯大學的哲羅姆大衛斯教授 (Prof. Jerome Davis)。本書的著者爲朱理亞赫刻博士 (Dr. Julius F. Hecker)。他在一八八一年生於俄羅斯列寧格勒 (聖彼得堡)地方。他從小在俄國受初等教育，後來却到美國的大學裏去研究政治學，神學，和

56489

56489

教育學。他在美國地方做了十多年的社會事業和文化工作。他在一九二一年又回到俄國去做賑饑和教育的工作。他現今在莫斯科神學院充當社會學兼社會倫理學教授。所以他和俄國的人民有密切的交接；他對於俄國的宗教很有深切的研究，他批評蘇俄政府和東正教會的言論，當然也是非常公平的。

但是讀者在未讀本書的正文以前，應該先要注意三點：

第一，俄國的東正教（或稱俄羅斯正宗教）是從希臘教（或稱希臘正宗教）裏分家出來的。希臘教又是從天主教裏和羅馬教分家出來的。至于天主教就是基督教中的舊教，當然與基督教中的新教——耶穌教——不同。講到浸禮會，路德會，監理會，聖公會等都是耶穌教的宗派。可是現在有許多中國人往往把基督教，耶穌教，羅馬教，希臘教，東正教混爲一談，弄不清楚，以致誤會百出，令人莫名其妙！我希望讀者別誤會這一點。

第二，蘇聯是現在世界上唯一最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牠裏面的國民也都是

世界上最富有宗教情感的民族。如今共產黨所領導的蘇維埃政府却根據唯物主義的哲學又應用科學教育的方法來消滅人民的宗教思想。這是一種最冒險的工作，也是一種最大膽的試驗。無論牠成功與否，都和全世界一切宗教的將來很有關係的。所以我希望讀者別忽略了這一點。

第三，教會不過是宗教信仰的一種形式，也就是宗教信徒的一種組織。有時教會也許受着多數宗教信徒的影響而腐敗到極點——甚至滅亡——，但是牠的宗教信仰或者仍然可以在少數的信徒中保存着，並且因此得以改良發展。我看俄國的東正教會（或稱俄羅斯正宗派教會）也有這種同樣的情形。牠在舊俄羅斯時代乃是唯我獨尊的國家教會。其實牠已被沙皇強姦了，又從官僚化而變為腐化了！好在有些異派教徒還能保持着基督真正的教訓與精神，並且創立了各種共產主義的宗教團體。至于將來這種宗教的共產主義能否和布爾什維克的科學的共產主義或政治的共產主義妥協合作，變成世界上——一種最偉大的宗教勢力，那是全在乎牠

們自然的趨勢了！所以我希望讀者別忘記了這一點。

關於上面未後的兩點，我還要請讀者讀過本書以後，自己去下一個確切的答案吧！

一九二九年，聖誕節，張仕章，序于上海。

原著者序

這本書的目的是要使讀者澈底的明瞭那些住在蘇維埃聯邦政府範圍以內的人民的宗教問題。

一個人若要明白社會和宗教的現象，祇要從社會組織的性質和環境兩方面去研究就是了。這樣，我們就該研究俄羅斯民族在心理上的特性，和教會歷史上的考察，以及牠以前在半封建時代所有的教義和近代反牧師制度的蘇維埃主義。

東方正宗派的基督教就是舊俄羅斯的國教。俄國大部份的人民在帝制時代至少在名義上是信仰這種宗教的。這本書就是要講到舊式正宗派教會和其他教派的命運。但是讀者不要忘記了俄國裏面有組織的宗教問題，並不完全是基督教會的問題。現在俄國還有一千五百萬回教徒和三百萬猶太教徒。蘇維埃政府對於回教徒已經很聰明的避免各種宗教上的爭執。牠對於猶太教徒反使他們從帝制時代的

壓迫狀況中解放出來。猶太人在俄國所有的賑災機關很能和政府合作。可是俄國的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同樣的受着有勢力的共產團體所俗化。

本書第一章是論到這種研究的心理方面；第二和第三章是要敘述俄國正宗派的教會在歷史上和學說上的背景；第四章到第六章是要追溯一九一七年二月（政治的）和十月（社會的）革命以後教會裏面所起的激烈的變化；第七到第十一章是要考察非正宗派和別種教派的運動，這些運動對於俄國人民的宗教生活漸漸的佔據了重要的地位；第十二章是要講到俄國知識階級在宗教上所演的悲劇和那些好像托爾斯泰（Tolstoy）麥立希考夫斯基（Merezhkovsky）柏狄夫（Berdyaev）等人使基督教適合于近代知識的需要上的努力；第十三章是要研究共產黨對於宗教的態度 and 他們反宗教宣傳的方法。末了，我對於蘇維埃底下的宗教的前途也作了一種冒險的預測。

我個人對於俄國人民宗教生活的興趣，和我以前對於俄國文化與社會學的研

究，以及我和俄國人民許多年密切的交往與觀察，可以給我一種勇氣去嘗試這個最難的問題——就是要做成本『蘇俄治下的宗教』的書。

在這本小書中所能討論的範圍，當然不過是這種精密問題一個總綱罷了。

俄國近幾年來所發生的事情同我們個人的希望和恐怖實在太接近了，以致我們對於這種情勢很難得到，並且也不願做，一種冷靜的科學的分析。況且歷史學應當超過人類的古生物學或是專門要想發掘過去時代的枯骨。所以我們在這種研究中若能明白革命時代所有宗教上的熱忱，禍患，和希望；那末我也心滿意足了。

我對於蘇俄宗教的將來並不抱什麼悲觀。我相信蘇維埃政府是最適合于真正宗教的表現。我對於斯賓格勒 (Spengler) 的見解，就是說，現在俄國人民不過是在開始他們宗教上創造的時，完全贊同的。

朱理亞赫刻 (J. F. Hecker)

蘇俄治下的宗教目次

譯者自序

原著者序

第一章 俄國人的宗教特性

第二章 東正教會的興衰

第三章 東正教會在教義上的特點

第四章 東正教會內部的改革

第五章 教會與革命的戰爭（上）

第六章 教會與革命的戰爭（下）

第七章 一九二三年的大會與東正教會的分裂

第八章 東正教會在統一方面的奮鬥

目

次

目 次

-
- 第九章 東正教改良的趨向
- 第十章 非正宗教派及其分裂的情形
- 第十一章 多數派中間的浸禮會教徒
- 第十二章 知識階級在宗教上的慘劇
- 第十三章 結論——宗教的存在與否
- 附錄
- (一) 蘇俄非基督徒與異國人的宗教
- (二) 編者的附註
- (三) 譯者的補白
- (1) 辰伯林的『俄國人在心靈上的奮鬥』
- (2) 斐尼斯的『蘇俄政教衝突的歷史』
- (3) 杜威的『蘇俄政教衝突的解釋』

蘇俄治下的宗教

- (4) 窩爾士的『蘇俄仇教運動的一瞥』
- (5) 凱洛克的『蘇俄反教運動的辯訴』
- (6) 基因的『無神國的建設』
- (7) 帕特蒙的『蘇俄反教運動的實況』
- (8) 斯特龍女士的『蘇俄反教運動的觀察』

蘇俄治下的宗教

第一章 俄國人的宗教特性

有句老話說，一個英國人或是美國人遲早要談到運動，一個法國人往往要講到女人，一個俄國人，尤其是普通的人，常常要論到宗教和上帝的神秘。那些很熟悉俄國人民心理的人稱他們爲上帝的差遣者或是上帝的尋求者。格累謨 (Steph. Graham) 說：「俄國人常常要走到那些可以找到上帝的道路上去，」這是很對的。俄羅斯人民的神秘性質在盎格羅薩森 (Anglo-Saxon) 民族的心目中看來，大概是很奇怪的；因爲這是比任何別的事情還要難懂呢。

我在俄國曾經做過一個討論會中的講員，但是在我長期的經驗中很覺得沒有別的題目要比宗教那樣的更能號召大多數的聽衆和引起很熱烈的辯論。俄國在帝



制時代，國家的教會雖然聯絡了秘密的警察去禁止宗教上自由的公開討論；但是人民對於這個題目的私下討論，無論在什麼時候，總不能停止他們的。在富人和貴族的客廳裏，常常聚集了小的團體來靜聽那些學者或是遊歷俄國的外國人對於宗教上哲理的演說。那些普通的人民在公墓中，樹林裏，車站上，商場中，公寓裏，私室內碰到的時候，也會非正式的談到宗教。在大的道路上常有整千整百的朝拜者要去朝見聖地和修道院，他們的談話當然是脫不掉那些上帝啊，得救啊，和靈魂不滅啊，種種永久的問題。

俄國人的心靈中對於人生的問題和目的常抱憂慮的。俄國最大的哲學家索羅維夫 (Soloviev) 要想找出些根本的原理來建設他的社會和道德的制度，因此他看出俄國人所具的三種心靈上的特性，就是敬拜心，憐憫心，和羞恥心。第一和第二的兩種特性在俄國人的中間確然是很顯著的。神聖的俄羅斯充滿了教堂，聖地和修道院，處處都在崇拜之中。每天有聖徒的誕日。教堂是終日開着，人民也

時常在那裏很熱心的跪着，彎着身子，並在裝飾很華麗的聖座和祭台的面前畫十字。俄國在歐戰以前，街上走路的男女看見了一個聖像，聖地，教堂或是一種出喪，都要停止進行，恭恭敬敬的畫十字，並且輕輕地唱他們『主啊！憐憫我們』的詩歌。我曾經在俄國一個很醜陋的牢監裏考察過幾個禮拜，看見那些犯人對於宗教的虔誠真令我大受感動。他們每天早上常在聖像面前跪着，在地板上磕頭；他們對於這種禮拜的儀式是很喜歡加入。有些時候這些『硬心』的人很願把他們最後的一個小錢買一枝臘燭，很虔敬的點在童貞女的聖像面前，或是作為崇拜他們守護神的表示。

科洛楞庫 (Korolenko) 有一次講到西伯利亞監獄中一個殺人的強盜，在入獄的時候用畫十字的記號來祝福他身上的手拷腳鐐，並且對其餘的囚犯講道說：『在世上有罪惡，在世上也有救法。……只有上帝沒有罪，但人是天生有罪的，並且要悔改而能得救的。悔改的心是拿罪惡來做測度的，而且罪惡是存在於

世界上的。倘然你不犯罪，你就不悔改；可是你不悔改，你就不能得救了。」這種結論就是說人必須犯罪，然後可以得救。這個犯人的虔敬是大家知道的，但是總不能阻止他每次所犯的大罪。所以在一個俄國罪犯生活中，虔敬的觀念和道德的標準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憐憫心就是俄國人虔敬心的真實表示。索羅維夫把這種憐憫心看做是他的社會學制度當中的根本原理。照他的意思講來，同情的憐憫心集合組織起來，就會變成國家。俄國裏面各種社會的關係大半確是為一種憐憫的自覺心所控制。格累謨稱牠為「俄國人的意念。」俄國人歡喜吃苦和受苦的人。他心目中的基督，常是受苦的基督；他決不承認別種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悔改的強盜能引起他最深切的同情。他真正的愛惜那些不誠實的，犯罪的，和作惡的人。在普通人民心目中可以說沒有「罪犯」這個名辭。他們稱罪犯不過是一個不幸的人。俄國的大小說家，如同杜思拖夫斯基 (Dostoyevsky)，托爾斯泰，高爾基 (Gorky)，科洛楞庫

等等，雖然極力研究罪犯，但是從沒攻擊他，倒反爲他解釋辯護的。

俄國人的憐憫心和饒恕的精神有密切關係的。我以爲這是俄國人宗教情緒的根本原則。至于饒恕的精神充滿在各種社會的關係當中。

在四旬齋(Лент)以前最後的禮拜日是稱爲『饒恕日』。在那日各人可以拿最能感動人的饒恕心來對待別人。在歐戰以前，做奴僕的和做主人的會互相鞠躬或跪拜，並且有時眼中還要流着淚互相求恕，結果大家很容易允許饒恕的。

他們在舉行聖餐的時候也有這種同樣的習俗。凡受聖餐的人，在進禮拜堂之前，要去拜訪他的親戚和朋友，並且求他們饒恕。從前有一次，我在一個俄國軍官和他的護兵之間，看見了很受感動的景象。這個軍官常要吃醉，並且要踢打他的老護兵。這個護兵弄得沒有辦法，只好請求他調換到別種服務。當這種請求已經照準，並且他也預備動身的時候，那個軍官很謙卑的低下頭說道：『伊凡(Иван)呀！請你饒恕我。』於是伊凡心中深受感動，並且回答說：『上帝是憐憫人

的；大人呀，也請你饒恕我罷！他們然後互相抱着大哭。

一個俄國人在出外旅行或是離家投軍的時候，總要召集朋友鄰舍們來參與離別會（Proshalny vecher）。其實照字面上講來，這種離別會含有饒恕的意義。俄國人的『離別贈言』（Proshai）也就是『饒恕』的意思。一個俄國人若是還沒有知道他的過失已經被人饒恕之前，他心中決不能得着平安的。

世界上沒有別的民族能比俄國人更容易饒恕和忘記他的仇敵。我在歐戰的時候，曾在奧國所有幾千俄國俘虜當中居住了一年，我從來沒看見他們對於他們的守衛兵有什麼仇恨或是報復的表示。他們對待他們仇敵倒反好像是他們的同族的人——同他們表示友愛，和他們分享家裏寄來的包物，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也能幫他們的忙。有一次靠近前線一個守衛兵押了幾個俘虜在路上行走的時候，被流彈打傷了手臂，以致他沒有力氣來背着他的鎗。那些俘虜對於受傷的守衛兵動了慈悲心，大家就同他拿鎗，並且領他到軍醫處去受醫。他們心裏面從來沒有想到這

是給他們一個報仇的好機會，並且可以恢復他們的自由。

對於懷恨仇敵的宣傳，如同在歐洲大戰的時候，美國有許多的講經臺和教會報，都爲了這種宣傳而降低了牠們的地位；但在俄國人中間，絕對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的。我所遇到的俄國人當中，無論他是一個兵丁，一個軍官，或是一個牧師，從沒有對於他的仇敵表示一種真正的怨恨。他們對於加入戰爭都很抱憾，而且他們也很願意饒恕和忘記別人對於他們所有的過失；就是在近來革命潮流中的階級鬥爭，也不能使紅黨與白黨中間發生真正的仇恨。現在多數派和小資產階級照理雖是仇敵，可是他們很能安居合作，並無什麼互相仇視的表示。

俄國人饒恕的特性可以說明俄國民族很容易接受非戰的教訓。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的哲理，不是從新約裏得來的。他起初從普通人民中和在大道上所遇見的朝拜者裏面就得到了這種見解，後來他在整理他哲學思想的時候，才尋出這些通俗的思想在耶穌的教訓中也是包含的。因此，他就接受耶穌的登山寶訓和禱告

文做他宗教哲學的基礎。

俄國人除了這些優美的，真實的，心靈上的特性以外，對於宗教還有一種活動的想像力和一種愛好表象的心；所以聖像和聖骨在他的宗教生活中佔據了一個最重要的地位。俄國有許多傳說，講到這些原始的神聖的藝術作品很有拯救和奇異的能力。聖母馬利亞和奇士尼古拉的像要算最有名的，恐怕比救主和使徒的聖像還要深入人心呢！聖議會（Holy Synod）在一九〇七年所刊行的一大冊書——名叫聖母的榮耀——足可證明這種聖像的通俗性。這本書的內容敘述六百十二種能行奇事的聖母像以及牠們的所在地和節期。書中最荒誕的故事就是講到這些聖像能顯神通，因此便可引起一般普通人民極強的想像力，並且激勵他們去做拜謁這些聖地的朝拜者。在這六百十二種能顯異能的聖母像當中，有些個能有移動地位的本領，有幾種像上的聖母或聖孩基督曾經流過淚，有時受了傷也會出血，又能分泌出聖膏來，可以醫病，放射出奇異的亮光，殺死攻擊者，嚇走敵人，醫好

病人，喚起死人，停息火災，除去旱荒和瘟疫，並且能給幾百萬良心上受責罰的罪人一種新的希望和救濟。非但那些原來的聖像能行這般奇事，而且後來的摹本更能大顯神通哩！

聖徒的墳墓和遺骸，更容易引起一般民衆在宗教上的想像力。年年總有幾千熱心的朝拜者去朝見這些地方。雖有不少的朝拜者明知這些聖地含有欺詐愚弄的手段在裏面，可是他們仍然不斷的要去朝拜。我曾經遊過基輔伯契拉（Kievpet-chera）修道院的聖地。在牠的古墓中尙保存最先住在地穴中的隱士的屍體。整百整千的虔敬的朝拜者依舊在拜謁這些地方。那些無神派的宣講員雖然不時的對他們解釋聖徒屍體的不腐化，實在是由於天時土氣的關係；但他們的虔敬心都一點沒有受着影響。

我想能鼓勵這種謁聖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定就是羣衆的心理。羣衆的狂熱很容易傳染的；所以在無知無識的人很難抵抗的。況且農村生活的乾燥乏味，尤能使

一般人加入朝聖的願心。

總而言之，俄國人的宗教特性就是：對於上帝和天道的一種不息的熱望和企求心；對於受苦和受苦者的一種愛好心；對於社會中被逐者的一種羨慕心和同情心；對於罪惡的一種饒恕心，隱忍心，和無抵抗心；最後對於聖的象徵主義和美的神秘主義的一種虔敬心。所以俄國人的宗教當以崇拜和默想爲最重要。道德觀念和一個人的宗教生活沒有多大關係的。他對於宗教上的組織也是莫名其妙的。

俄國人民的道德律完全脫離了他們的宗教生活和習慣而自由發展的。社會的和個人的關係不是拿根據于十條誠命的法律來規定的，乃是以他們民間文學中所表示出來的習俗和道德標準來裁制的。俄國大多數的民衆對於基督教會的道德教訓完全茫無所知的。俄國的國家教會素來不是一個傳道施教的教會。照宗教上的聖禮和遺傳中的表象看來，直到如今，牠還不過是一種禮拜的機關，和關於基督的奇事神蹟的守護者罷了。鄉村中的牧師所受的教育常不能及他的教友；所以他

既沒有知識，又沒有思想去教導他們關於教會裏的學理和道德教訓了。前聖議會大議長坡俾多諾塞夫（Pobvedonostzeff）——他管理教會和國家差不多有二代之久——曾經說道：「我們的教士很少傳道施教的。聖經不是爲不識字的人而存在的。……有些偏僻地方的人民對於禮拜時的言語絕對不能明瞭其中的意義，就是主禱文他們也背不清楚，常要變辭害意的。然而在那些原始的心中却建立了一座好像古代雅典人所崇拜的未識之神的祭壇，並且在他們的實際生活上也很順服天命的。」

俄國人民對於教會的道德教訓雖然茫無所知，但我們決不能說他們是不道德的，或是沒有神學的思想和裁制個人與社會間關係的標準。他們富有遺傳的民間文學和習慣的道德觀念，因此可以補足宗教上指導的缺乏。有些好古的學者曾經把這種民間的知識寶庫搜集攏來，印成幾冊專書，一共含有幾萬的箴言和俗語。凡研究過這些古諺的人都聲稱牠們的全部可以代表俄國人民歷代以來所實驗的宗

教哲學和道德法規。牠們的範圍大概是講到各人的需求和興趣。在俗語中論及上帝的很多，可是指出基督和童貞女名字的地方極少。這就可以表明牠們大半是在東正教流行俄國之前的。人民對於國家帝王和社會秩序所應盡的本分在俗語中是說得很清楚的。關於愛國心，財產權，契約的履行，納稅的義務，犯罪的行為，窮乏，公道，教育，飲食，健康，疾病，和死亡的方面，也都有格言的。有些著名的俄國法學家相信俄國的普通法是發源於俄國的俗語的。還有許多醫學家也相信俄國的古諺中是含有民間的醫學知識的。

我們還是讓這些俗語自己說話吧：

「上帝是自由自在的，並可爲所欲爲的。」「人是假定的，但是上帝是自定的。」「人是走路的，但上帝是領路的。」「人爲自己的，但上帝爲衆人的。」這類俗語可以表明他們心目中的上帝是全能自知的。下面這幾句古語是講到上帝對於人的需求並不淡視的：「上帝既給我們牙齒，他也給我們麵包。」「上帝既

然給我們身體，他也給我們健康。」「若使上帝不給我們健康，那麼醫生也是不能的。」窮苦的人，照民間的眼光看來，似乎能夠受上帝特別恩寵的；所以說：「富人詭異窮人怎樣過活，但上帝時常看顧窮人的。」「凡信託上帝的人總不會絕望的。」「上帝並不窮，他的恩慈也不少。」「上帝非但要人怕他，並且要人愛他。」「誰心中有懼怕，誰心中就有上帝。」「愛在那裏，上帝也在那裏。」「上帝要尋找那些尋找真理的人。」「上帝要賞賜那些護衛真理的人。」「上帝要幫助那些生活清潔的人。」「但依靠上帝並非要減少一個人的自賴心和勤勞心：「凡能保護自己的，就能受上帝的保護。」「凡能早起作工的，就能得上帝的恩賜。」「在許多的比喻當中也有講到禱告的：「下種時不禱告，收割時要糟糕。」「開始時要和上帝聯絡，完畢時要和上主同樂。」「你如果要上戰場，必須禱告一次；你如果要下海洋，必須禱告二次；你如果要娶新娘，必須禱告三次。」「關於基督的俗語很少，就是有，也不過是一種受苦的記號：「沒有十字架，就沒有

基督。』教會是難得提起的，而且牠的意義也是精神的：『教堂並不是拿木頭造的，却是拿肋骨建的。』『凡愛上主的也愛教會。』

這幾句俗語雖是千中揀一的，然而很可以包括俄國人全部的宗教觀念了。我們若把東正教所崇奉的尼西亚信經和牠們比較一下，就必希奇這種信經對於普通人民的思想上所發生的影響何等少啊！關於『三位一體』這個名辭，我祇找着了一次；但也講到一個家庭的建設，並不涉及上帝的品性的：『沒有三位一體，就不能建築家庭，沒有四個牆角，就不能造成房屋；沒有五塊聖餅，就不能舉行彌撒。』上帝的無所不能與獨一主宰的觀念常與俄王的觀念很相近的。在六十五句關於俄王的俗語當中，有二十九句是講到他和上帝與天的比擬：『上帝只有一位，沙王只有一位。』『上帝在天上，沙王在地上。』『上帝的權能統轄一切，沙王的權能也統轄一切。』『沙王發號施命，上帝引入正路。』『上帝是知，沙王是行。』『沙王是可怕的，上帝是慈悲的』等等。關於俄王的俗語大概是不帶責

罵的，不過對於貴族，官僚，修道士，和軍人的俗語，也很少稱頌的。

俄國的俗語對於過犯與罪孽的分別是不大清楚的。他們不常用『過犯』這個名詞，祇叫牠是『罪孽』。他們看犯人就是罪人或是不幸者。

在一般俄國人的思想中，罪孽就是觸犯了法律或禁例。他們的俗語說，『罪孽是經過法律而成立的。』又說，『禁例在那裏，罪孽也在那裏。』他們以為各人都是罪人，因為：『只有上帝是沒有罪的。』『無火沒有煙，無人沒有罪。』『穿衣難免污點，露面難免羞容。』『罪孽是由行為而定，非照思想而斷。』『一個人不是以心思犯罪的，但有意志犯罪的。』他們以為良心可以防禦罪孽的，所以說：『你若有良心，罪孽就不能吞你下去。』照俗語裏的意思看來，貧窮，困苦，和醉酒是罪孽的大原因：『窮困不知有羞恥。』『貧乏不是罪，但要引人犯罪。』『大主教為飢餓所迫時，也要偷竊。』

犯罪既是俄國人一種普通的事實，所以怨罪也是很平常的：『與罪惡爭吵，

但與罪人和好。』『上帝不責罰已赦的罪。』『憐恤勝過罪惡，正如同水勝過火一樣。』

這樣說來，我們不妨把普通人民的神學——就是由俗語中和習慣上所表現出來的思想——簡括成爲一個信條：上帝是有權能的，並且也是聖善的；各人都是有罪的；唯獨上帝沒有罪；然而上帝是憐恤人的；他爲了基督的緣故，饒恕了悔改的罪人。

俗語中所表示的道德原理大半是屬於社會的：『一個人不願和別人聚合，就完全變做笨伯。』『一個聯合的羊羣並不怕狼。』『有很多俗語是教人社交，但勸人留心惡人：『惡人好像煤炭，牠不燒痛你，就必塗黑你。』』『與善人爲友，與狡者絕交。』』『與狗同臥，起時惹虱。』

俗語中對於鄰睦，款待，友好，仁愛，謙虛，聰慧，忍耐，勤勞，和儉樸都很看重稱揚的。我們所知道的黃金律，也有好幾次講到的：『你不願人家做在你

自己身上的事，你也不要做。」「待我們好，待大家都好，這是合法的生活。」

妄談，誹謗，貪婪，諂諛，吝嗇和懶惰是當做惡習的。幸福的觀念在俗語中含有傲倖的意思，並且視為警戒的。他們看艱難勞苦的生活如同一種自然而然的道路，並且怕幸福好像一種風掣電馳的幻想：「幸福如同一只狼；牠欺騙了人，就回到樹林中去了。」「別相信幸福，因為牠是騎着一只毛色不一的馬。」

我們對於俄國人所有良善的基督徒品性固然應當承認稱羨的，可是對於他們黑暗的方面，也不能閉眼放過的。世界上也許沒有別種民族能像俄國人那樣的會把聖善和罪惡混合在一個心靈當中的。可怕的約翰 (John the Terrible) 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他的不道德行為和虔誠的宗教情緒完全可以混在一起的。這個很為莫斯科人民所敬仰渴慕的怪物，常要到他所建立的一個附近莫斯科地方的修道院裏去休養。他在清晨三點鐘的時光就要打着早禱的大鐘。他在長約七小時的禮拜式當中很熱心的讀經，唱詩，和禱告，甚至他額上所有俯伏在地的印記到午餐

的時候還留着呢。他把聖書中的教訓讀給會衆聽，但是他其間還要到修道院底下的牢獄中去看囚犯受毒打，不過等到他同上來的時候，仍然笑容滿面的。

這個俄王當然是一個迷道者，可是這樣的反常生活，在俄國人的品性中確是可能的。這種事實可以說是因為俄國人的宗教與道德沒有多大關係的。條頓民族中所認為無上命法與宗教柱石的責任心，在俄國人的宗教意識中是極少存在的。一個俄國人因為缺乏超自然的道德裁制與訓練，所以有時要使起性子，做出種種殘暴慘酷的行爲來；但是很少發乎預定的思想和報復的動機的。他所受的道德訓練實在太少，因此他仍然還是一個野蠻人。所以俄國革命時代中所發生的暴舉，也從此得到一部分的解釋了。

俄國人將來在宗教上和道德上的訓練的大問題，就是在乎怎樣保存他們心靈上固有的美德，同時又如何使他們在日常生活上得着道德的裁制。

第二章 俄國東正教會的興衰

當羅馬皇帝君士坦丁把基督教會做成一種國家機關，受他管轄的時候，他就開了一個先例，使後來聖俄羅斯的教會也走向國治教會那條路上去了！但是東方教會從沒有設立教皇，而且牠所有的教長都是附屬於希臘的皇帝的。在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奪取以後，希臘因此亡國。於是莫斯科的修道士纔想像到俄羅斯可以做正宗派的嫡系。他們聳動他們的王子說，莫斯科將來應當變成羅馬第三，並且是最後的羅馬，牠的王子做了基督徒的皇帝以後，就該承受拜占庭（就是君士坦丁堡）治理者的特權。

所以正宗派的俄羅斯教會的歷史可以分做下面的七個時期：

- (一) 完全附屬於君士坦丁堡教長的時期（九八八年至一二四〇年）；
- (二) 逐漸取得自主的過渡時期（一二四〇年至一四四八年）；

(三) 從莫斯科總主教的獨立到俄國教長制度的創設時期(一四四八年至一五八七年)；

(四) 教長制度盛行的時期(一五八七年至一七二〇年)；

(五) 廢止教長制度以後的聖議會時期(一七二〇年至一九一七年)；

(六) 恢復教長制度與政教分離的時期(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

(七) 第二次廢止教長制度與教內分派的時期(一九二三年以後)。

自從基輔佛拉德米爾 (Vladimir of Kiev) 信奉基督教以後(九八八年，)

在俄國所組織的基督教會都要受制于君士坦丁堡的教長，並且他看這種新支會是他的一種教區，所以他要派希臘的主教去管理牠。俄國的教士和希臘的主教非但在習俗上很少相同，就是在言語上也是不通的。他們久已想望一個本國的領袖。況且俄國的王子也怕他們會受制于拜占庭皇帝的威權之下，因為那些皇帝常常要利用教會的政治來在巴爾幹與俄羅斯邊界上的新歸化的國家裏擴張他們的勢力。

希臘帝國自從一〇五〇年被塞爾柱王朝的 (Seljukian) 土耳其人侵略和十字軍戰爭以後，君士坦丁堡的權勢漸漸衰弱起來了。到了一二四〇年，因為韃靼民族的侵略，俄國就和牠的母教會完全隔絕了。於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長只好讓俄國本地的主教去管理牠自己的教會。後來君士坦丁堡終究陷落了，俄國的主教就乘機宣佈教會獨立，莫斯科的總主教也就被認為君士坦丁堡教長底下最初的一個獨立的俄國主教了。

這位總主教名叫約拿 (Jonah)。他為俄國教會的獨立竭力奮鬥。他曾經宣傳拜占庭教會是違背正宗派的信仰的，並且說明君士坦丁堡的敗亡就是牠這種不守正道與攻乎異端的結果。他在一封寫給他主教的信息裏攻擊牠說：『我的孩子們，你們自己都知道那個皇城（君士坦丁堡）雖會被保加利亞人和波斯人好像天羅地網一般的圍困了七年工夫，可是希臘人因為保守他們的信心還能站立得住。不過等到他們的信仰一失掉，你們曉得他們如何受苦，並且如何被人擄掠殺戮。至于

他們的魂靈後來究竟變成怎樣光景，只有上帝知道啊！』這種結論是很清楚的。俄羅斯不必再有什麼希望于希臘的教會，因為牠的天賦特權已經失去了。不但如此，俄國的教會從此要做世界上正宗派信仰的守護人了。君士坦丁堡本是羅馬第二，如今已經傾覆了。但是還有莫斯科，牠的王子是最虔信的。所以牠必被選為羅馬第三直到上主的復臨。至于牠那裏的王子將來就是真正信奉基督的皇帝，也就是十字架的守護者。

俄皇約翰第三(John III)是一個圓滑的莫斯科人。他很歡喜這種意思，並且決意要做正宗派基督教國家的熱心皇帝。他爲了要達到他的志願，就設法和君士坦丁堡的王女索非亞(Sophia)結婚(一四六七年)，並且開始在莫斯科地方建立一所很大的禮拜堂，以代替君士坦丁堡遭人褻瀆的聖索非亞堂。他召集最聰明的教士到他的朝廷上去，並且很歡喜和他們談論將要變成羅馬第三的莫斯科。我們從淵博的修道士菲羅狄奧斯(Philothaeus)寫給約翰第三的一封信裏可以得到一

個很有趣味的例子。他說：「古代羅馬的教會是因着阿坡力內立（Apolinarius）所講的異端而敗壞了，羅馬第二的君士坦丁堡教會也被夏甲（Macarius）的後裔用斧子砍碎了。但是這個羅馬第三（莫斯科）的聖使徒教會能夠大放光明，比全宇宙中的太陽還要明亮。……以前的兩個羅馬已經傾覆了，這個第三者可以挺身而至，也不會有第四者出來。陛下就是全世界基督徒當中唯一的皇帝。」在這些情形之下，俄國的教會漸漸的被國家所管轄。所以凡是約翰和他忠心的教士所發起的事業都被後來的皇帝所完成。

約翰第四是一個「可怕的人。」他繼續這種使俄羅斯教會脫離拜占庭統治的運動。當他在位的時候，忽然發生了一種神話，就是說，使徒聖安得烈曾經到聶伯河（Dniiper）兩岸傳過道。這種神話當然很容易使人民相信的。那時教皇的大使波塞芬（Posevin）卻正到俄國來催促俄國的教會去跟從希臘人對於佛羅陵薩會議（Council of Florence）的意見，俄皇就對他說：「你爲什麼要對我們講起希

「希臘人呢？這些希臘人並沒有給我們福音。我們不相信希臘人，却相信基督。我們在基督教會開始的時候，已經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因為從前使徒彼得的兄弟安得烈到羅馬去的時候，曾經路過這個國家。所以我們和你們在意大利的人是在同一時候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的。」

這種直接發源於使徒的俄羅斯基督教（東正教）在學理上已經建設成功了，並且俄皇這種自以為正宗派基督教中真正的唯一皇帝的主張從此也可以強固了。那些修道士們爲了要完成俄羅斯教會的獨立，以證明正宗派的學說，所以就覺得真正的俄國聖徒是必要的。直到那時，俄國教會所尊敬的聖徒與殉道者都是些外國人，大半是希臘人，似乎在俄國自己的教會裏完全沒有見證基督教信仰的人。這個俄國的主教要想糾正這種退步的情形，就開始查考地方上所尊敬的聖徒中究竟有沒有俄國人在內，並且他們已經做過些什麼偉大的事業和熱心的工作。一五四七年他們在莫斯科地方召集了一個會議，到會的主教都把他們調查所得的俄國

聖徒的名單報告出來，然後由議會裏核准了二十二個聖徒。這種調查聖徒的工作在次年仍然繼續進行，等到一五四九年，他們又召集一個會議，並且另外再核准了十七個聖徒。那些胆敢反對莫斯科這種教會政策的主教都被該議會驅逐出去，並且大受呪咀。這種反對莫斯科教會誇稱莫斯科爲羅馬第三的舉動最初發生於東南方面。在伏爾加河下流的地方，有一個見解和學問都很深切的人，名叫尼耳索洛基 (Nil Soroky)，他在那裏設立了一個修道院，吸引了許多的信徒，並且極力反對莫斯科地方國家主義的教士所有這些帝國主義的趨向。直等到五十年以後，他和他的信徒纔被莫斯科的議會所壓平。

這些伏爾加的修道士反對教會與國家中間一種太親密的結合，並且要求政教互相獨立。他們說，教會裏面的牧師不應該怕暫時的權勢，却當爲心靈界中的正義辯護。國家的元首不應該做心靈上各種事件的審判官。宗教是一個人良心上的問題，所以國家不應該壓迫任何人在宗教上所有的意見。

這些伏爾加的修道院以及俄國別處地方許多宗教的隱士繼續不斷的實驗他們自由的宗教思想，尤其是在神祕的方面。至于正宗派的教會對於這種事情大概也取放任主義的。

俄國的教會裏缺少一件事情。牠自己既沒有教長，就不得不承認君士坦丁堡的教長。但是要得到一個教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這事必須要經過拜占庭地方教長的允許。到了一五八九年，希臘的教長耶利米（Jeremiah）剛巧到莫斯科來爲窮苦的拜占庭教會募捐。那時狡猾的偽善的俄皇哥杜諾夫（Boris Godunov）就徵得他的同意把莫斯科的主教約伯（Job）封爲俄國第一任的教長，於是俄國教士所有教會獨立與尊嚴的夢想完全實現了。不過俄國教會有了這種情形以後，却漸漸的走到衰落的地步。

如今俄國有了兩重的威權：就是教長與皇帝。這些教長在精神界方面漸漸得了統治權以後，就可和俄皇在朝廷上的榮華互相對抗。那末他們兩方面的衝突自

然快要發生出來的。

俄國自從路列克 (Rurik) 王朝滅亡以後，政局甚爲紛亂。各種虛僞的人都在莫斯科地方管理國政，後來被教長菲列勒特 (Philaret) 用了強有力的手段才把秩序恢復過來。他把他的年輕兒子邁克爾羅曼諾夫 (Michael Romanoff) 在皇帝的寶座上，可是實際上還是他自己在統攝朝政，直到臨終爲止。在羅曼諾夫二世登位的時候，亞曆西斯泥昆 (Alexis Nikon) 受封爲教長。他確是俄國的十個教長中最能幹的人。歷史家常常稱他爲俄國正宗派教會 (東正教會) 中的柏刻特多馬 (Thomas a Becket)。他是俄皇和貴族發生衝突的第一個人。他們都怕這個有力的人，好像見了一個太上的皇帝一樣。這種懼怕當然也有理由可說的。泥昆覺得他自己的職位與權力是很尊嚴的。有一次，他看俄皇的屬下不肯順服他的吩咐，他就惱怒的說：『你們豈不知道我們所有神聖的祭司職權，不是從君王那裏得來的；但是那些管理政治的却要受祭司膏過而後稱王的。所以祭司的職權清清楚楚』

楚楚的要比王權大得多呢。』這是一種危險的學說。這個胆小的俄皇對於他幼年時候所愛慕的教長非常懼怕。但是他並不阻當他的僚屬用詭計推翻泥昆的地位，而且這種陰謀後來也是成功的。泥昆的失敗就使教會受制于國家，並且也做了後來廢除教長制度的張本。過了幾十年以後，這種事工纔爲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所完成。

泥昆可說是這些有勢力的教長中最後的一個。他常被人家認爲俄羅斯教會中的改良家。他果眞使正宗派教會的外表形式發生了許多的變化。我們後來可以知道這種改革惹起了許多守舊的熱心教徒的反對，並且開了後來教會中分門別戶的一條道路；因此，大部份最熱心的教徒離開教會，又把教會自己所誇張的統一精神完全破壞了。

彼得大帝立志要使俄國近代化。他知道教長政治非但是專制皇帝一個危險的敵手，而且也是他種種革新事業中最大的阻礙。他利用了幾個教士做實施他這些

野心計劃的工具，就把教長制度廢除。到了一七二〇年，他把俄國的教會完全統轄于國家之下。

他組織一個教士院 (College of Ecclesiastics) 以代替教長制，並且委任一個平信徒做院長，管理一切教務。這種組織，後來稱爲『聖議會』 (Holy Synod)，完全摹仿新教徒國治教會的辦法。他這種改良的目的無非要使教會受國家的利用，又可鞏固中央集權的獨裁政治。他對於純粹心靈上的事情沒有多大的興趣，所以他和他的繼任者對於教會的道理或儀式都不加干涉的。其實這種聖議會並沒有規定教義的權柄，因爲牠不過是一個管理教會的團體，而日也要受國家的節制。東正教會將來的歷史可以證明牠做了俄皇一種最得力的工具，以延長俄國呆板的和落後的專制政治的命運。國治教會的結果常使教會在精神的發展上受着極大的阻礙，所以彼得大帝這種突然的手段也是後來東正教會在精神上衰落的大原因。如果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那就必須完全能夠了解聖議會的組織和功用。

這種聖議會是由各等教士組合而成的；但是他們都爲俄皇所派定，任期也是不等的。牠裏面的會員分爲兩種，就是責任會員與助理會員。前者是永久的，不能移動的；後者是暫時的，含有顧問性質的。至于會員的數目也無限制，增多減少聽憑俄皇的旨意。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輔地方的總主教都算爲永久的會員。佐治亞（Georgia）教會裏的會長也能得到相同的地位。不過彼得格勒的總主教受人尊稱爲第一席會員，通常也就是聖議會的主席。其他五六個責任會員都是些大主教與主教。他們的任期也是特別規定的。末了，還有幾個會員是叫做「白衣教士」，就是成婚的教士。在他們中間大概總有一個是俄皇向他承過罪的教士。

聖議會中的助理會員大半都是些主教和有勢力的祭司。他們只在必要時召來參議教務的。聖議會的總理就是俄皇的高等代表。我們不妨稱他爲「監督」。『得大帝曾經說明監督的功能爲「俄皇的耳目。」至于他的責任是要視察教會的事業是否依照皇帝的諭旨進行。他的職位等于政府中一部的總長，也可列席內閣，

祇對俄皇負責，與別人無關。佔居這種高位的人通常都是平信徒，而且彼得大帝最歡喜委任那些品性堅決，能夠用軍法來管理教士的武人做監督。所以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的時候，這位腳帶馬刺，手執鋼刀的普洛大沙夫伯爵（Count Protassof）會佔居監督的地位，管理教會中的牧者。

監督的職權是非常大的。教會中各樣事情若不得到他的允許是不能辦的。議會中的決議案若沒有他的署名是不生效力的。議會中任何決議案，若照他看來，是不合乎國家的法律的，那末他也可有權否決的。

在聖議會範圍以內所管理的事件也有各樣的種類，如同審定宗教的書籍與雜誌，處分教士的各種不端行為和異端邪說等等。關於這些案件大概都交給議會中普通的教士辦理的。關於教育，經濟等等事情都是由監督與他的許多助理員和書記辦理的。教會的事件既然能夠這樣集中，所以一個教士若不去得到聖議會監督的允許，就不能夠越過他自己的教區一步。這個議會每年大概要辦理一萬至一

萬五千的案件，而且每一種案件必須經過許多分部的手續。

這個聖議會在五個省份裏也組織支部，稱爲『教區裁判所』(Diocesan Courts)，以襄助教區中的主教辦理各種教務。這些裁判所都是由聖議會的監督委派平信徒去主理的。他們所受理的案件大概是關於罄飭教規，以及結婚，離婚的事情。至于聖議會就是牠們的高等裁判所。

凡是教會中的主教都要先經聖議會提名，然後再由俄皇委任，並且他也可任意頒給他們大主教與總主教的銜頭。這些主教後來都被召入聖議會中做會員。因此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教會中執政的人與聖議會都是做了俄皇獨裁政治的順服工具。國家是很積極的要利用教士以謀自身的利益，却常使全國人民與教會受着極大的損失。所以這種制度所要造成的統一政治不過是外表面的。

教會中那些心靈更加充足的教士竭力反對教會做國家的奴隸。於是那種反對十六世紀中泥昆教長改革運動時所有分裂的情形，現在爲了國治教會的問題更加

厲害了。彼得大帝被他們稱爲「反基督者」。那些歸附反對派的人口增月盛，把教會中最優秀的份子都吸收乾淨。這樣的情形當然可以促進國家的正宗派教會的衰敗。

尼古拉一世這種好像鐵一般的專制主義已引起俄國的知識階級從事於反對獨裁政治的運動。這種運動雖然受了種種的壓迫，可是一直繼續下去，等到一九一七年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把這個舊政府推翻。俄國的獨裁政府爲了要求生存的緣故，就招募教會中的掌權者與聖議會出來替他打仗。這就造成教會歷史中最黑暗的時期，並且必須經過長時期以後，才能把人民心目中對於政教狼狽爲好的觀念打破，從新得到他們的信仰。

那時率領教會從事這種反動工作的人就是聖議會的監督。他的名字叫做坡俾多諾塞夫(K. P. Pobedonostzev)，死於一九〇八年。他是一個很有幹才和學識的人。他很忠忠于俄皇與獨裁政治。他很愛護國家的教會。他深得皇族的信仰，

所以俄皇亞歷山大第三與尼古拉第二都是從小就請他做師傅的。

坡俾多諾塞夫不斷的用他的全力來維護現存的秩序。他對於這些異派教徒；革命黨徒，與猶太教徒特別的嚴厲；因為他看他們都是國家教會與專制政治的仇敵。他提議壓制他們的法律，並且組織宣教部，作為聖議會秘密偵察的機關。普通的教士都被招來做這種擴大的壓制運動。這些祭司都被請去與俄皇的秘密偵探合作，並且把他們區域內所有革命的宣傳運動都報告給警察。他們這種報告的結果已經使一萬多的學校教員監禁起來，或是充軍出去。

坡俾多諾塞夫相信愚民政策是防止革命運動最安全的方法；所以他就壓迫各種的公學。竭力組織教會學校的制度，使教區中的祭司監督牠們。他也要用一種嚴格的檢定方法來控制知識階級的思想。這種高級的教士大概跟隨他的領導，並且變成他各種反動政策的熱心的辯護者。有些人爲了偵察的緣故，甚至于假裝著辱罵最神聖的教會與認罪所。這種殘忍的偵察手段流了許多無辜人的血。有一

個祭司的教區內從前常有許多革命者出沒其間。他有一次曾經對我承認他以前所犯的這種黑暗的罪惡，並且他又說現在的教會恰正爲了從前助長舊政府爲虐的罪惡而受苦。我們確實知道這樣的痛罵並非難得聽見的，而且在高級的教士裏面也有不少的人起來反對獨裁政府爲了自身的利益而強姦教會的舉動。但是他們一下子就被全能的聖議會鎮靜了。如同替考文斯基（Father Tikhovinsky）與佩特洛夫（Gregory Petroff）這樣的人已經在歷史上稱爲公義的烈士與先知。他們的名字可以永垂不朽了。

這種下級的教士，特別是鄉村中的祭司，他們很少被官廳看重的，而且大半都依靠他們教區中教徒的善意。所以他們對於國家濫用他們的職權來從事政治上的活動大概都表示消極的反對。他們因爲遺傳與習慣的緣故，對於政治並不發生興趣。所以他們大概對於聖議會與高級教士所有政治上的努力是不注意的。他們雖然參加一九一二年的選舉，做了政府黨的選舉人；但是在那時參加的人中間有

許多並不出于自己的主張，却因爲上面的壓力。

教會中最大的恥辱就是怪人拉斯蒲丁 (Rasputin) 在末代的沙皇朝廷上所有種種不可言狀的劣蹟；因此，教會受他的污辱，墮落到不堪設想。尼古拉皇帝與他的皇后亞歷山達拉 (Alexandria) 生性都是很迷信的。他們常常恐怕失掉他們的生命與寶位；所以他們很容易相信神祕的邪術。在他們的朝廷上常常有許多神祕的人在那裏用種種預言與邪術來護衛他們的家事。有一個時期，這個很出名的江河騙子腓力潑 (Philippe) 在朝廷上得勢。後來察里勝 (Tzaritzin) 的喜列曷德 (Hiliodor) 也有一時被沙皇尊爲聖徒。但是即刻被他的對敵拉斯蒲丁把沙皇的寵侍奪了去。拉斯蒲丁是一個無知的，淫蕩的，醉酒的農民。他之所以能夠得勢，乃是因爲他的野性與魔力能使狂熱的婦女投入他的羅網。他是由一個富室的女人帶到莫斯科地方。這個女人自稱在西伯利亞朝聖的時候曾經遇見過「聖人」。後來因爲年輕的王太子生病，許多醫生都已束手，皇后因此非常擔憂。於是有人趁

了這個機會就介紹拉斯蒲丁進入皇室看病。拉斯蒲丁不知怎樣把王太子所患的出血症居然醫好。這件事情就使皇后確信他有超自然的神祕力。拉斯蒲丁又使她相信非但這個小孩子的生命他可救治，而且國家的平安也可靠托他的。她很信從這個騙子，直等到他被皇室中的人用極殘酷的手段來把他暗殺。拉斯蒲丁的狡猾本領使他達到一個好像皇后心靈上的顧問地位。他爲自己或爲朋友所請求的事情，沒有一件是被拒絕的。所以凡是要在國家裏和教會中求官謀事的人都去奉順他，請求他祝福。那些胆敢反對他的人即刻就被撤去位置。政府中任免大臣與將軍的權柄差不多都在他的手中。有人相信俄國的陸軍大元帥尼古拉公爵調遣到高加索去的事件也是拉斯蒲丁所提議的。

教會的名譽爲了牠容忍拉斯蒲丁的緣故就大大的敗壞了。聖議會中的會員爲了要保全他們的地位都不敢反對他。一位享受高名的教長撒馬麟 (Samarin)爲了與拉斯蒲丁的同黨不大友善，就被革職。那些沒有價值的人藉着拉斯蒲丁的勢力

就可做主教，甚至可以升任到總主教的地步。所以馬克里斯 (Makarius) 主教雖被人家控告他在一九〇五年趁着民衆在托木斯克 (Tomsk) 戲院裏開會的時候，曾經放火，並且燒死了許多人；可是他藉着全能的拉斯蒲丁的勢力就可封爲總主教，全俄的人民對於這個「神聖的魔鬼」如此專權，很是憤慨。他後來被人暗殺以後，大家都很稱快；只有朝廷上的貪官，污吏，以及皇后皇帝還要爲他悲傷。教會的地位本已爲國家的壓制手段所削弱，如今又經過拉斯蒲丁一番腐敗的專權以後，精神更加煥散了。當革命起來的時候，教會中的優秀份子都很歡迎這種改變，但是這些仗着國家權勢的高級教士却持異議。他們畏懼革命的勢力，對於那些要恢復從前的教會和政府的反革命者大概都很竭力保護。

所以俄國的教會因着歷史的環境而變成一種很有力的國家機關。牠的發展和中央集權政府的生長是並行的。在起初的時候，教會的政治與通俗的勢力互相結合，後來在俄皇彼得大帝的底下，牠就漸漸退化，做了國家的一種工具。教會既

然受了獨裁皇帝的專制主義所姦污，所以舊政府的惡名都歸罪于教會，如同歸罪于暫時的政府一樣。政教的結合在俄國地方已經證明是一種失敗，好像別的國家裏一樣。現在正宗派的教會已經脫離了舊時代的束縛，就可得到一種解放出來的新生命了。

第三章 東正教會在教義上的特點

呆板固定的教義與嚴格一致的禮節本是東正教信仰的特點。其中靜止的宗教觀念是很明顯的。教會自己常常誇張牠這種保守信仰的功用，並不假做從事于發現新真理的工作。

在俄國第九次信道百年紀念大會的時候，俄日宣教會由俄國的尼古拉主教領銜，寫了一封恭賀的信給牠的母會。在這封信裏關於俄國宣教師的教訓是明明白白的條舉出來，尤其關於俄國宣教師在國外所遇到的敵手。牠攻擊耶穌教與羅馬

天主教，並且當牠們都是唯理派的運動 (Rationalistic Movements)。至于這些運動要繼續不斷的改變牠們的意思，以適應現時代的急需；所以牠們都拒絕普及教會的權威與教義。這種普及教會就是在基督教早年歷史中由各種全體教士會議所設立的。這封信的結論說：『惟獨東正教會能夠給那些到她裏面來的人喝這種從上帝甜密的真言中出來的泉水，因為只有她才能保存神聖的教義，正如同她領受牠們的時候一樣。她要保存牠們永不改變，也不加添或減少牠們裏面的一點；因為她是真理的棟樑與基礎，又因為上帝的靈住在她裏面，何以保存她不致發生錯誤。』

這恰正是東正教會在教義上所站的位置。牠當牠的工作就是要保存真理，並非要發展或是尋找真理。所以正宗派的神學家所有的學問祇限于護教的功能，就是要防止任何改變的情形。在信中所提起的『神聖的教義』就是尼西亚信經以及其他七次全體教士會議中所定的條文。最初的四個會議中所定的教義是查士丁尼

帝 (Justinian) 所提議的，並且由第五次全體會議議決與聖經處于同等他位。至于這種條文已經爲俄國的東正教會所接受。

讓我們很簡單的追想這些議會裏所發創的教義中，那幾條是現在俄國教會裏仍然認爲有效的，並且要保存牠們永不改變的。在三二五年所舉行的第一次尼亞會議，因爲有天主教的代表在內，當然是創立教義的議會中最重要的議會。牠所能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給上帝的性格一個定義。這種定義，在有哲學頭腦的希臘人看來，是很重要的；並且關於這一點，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是發生于亞歷山大里亞 (Alexandria) 地方阿利阿 (Arius) 與阿塔內細阿 (Athanasius) 的門徒中間。講到亞歷山大里亞，在基督死後起初的幾世紀中是哲學上和神學上爭論的中心點。

這種爭論是述及三位一體中父子與聖靈的關係，非但在道成肉身，創造萬物與時間之前，而且在時間最初開始之前，他們已經發生關係了。他們對於神與人

的來往，基督的神性或人性，甚至對於三位一體的形式都沒有真正的異議。這些信仰的條文兩方面都是承認的。所以他們的爭點只在乎希臘文中最精細的字義方面。然而在這種抽象的人類思想方面所發生出來的獨斷主義，竟用種種呪咀的方法來抬高牠，封鎖牠，保護牠，如同『神聖的道理』一般。這種的『神聖道理』就是現在希臘正宗派教會所最熱心護衛的。

從尼西亚會議的熱烈辯論中最後發生出來的信條就是說：

『我們信獨一天主，全能的父，是創造天地的，並造有形無形的萬物；

『我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天主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爲父所生，是從天主的天主，從光的光，從真天主的真天主，且生不受造，與父一性，萬物都藉着他受造，又爲我們世人，爲救我們，從天降臨，取肉身成世人，受害埋葬，在第三天復活升天；

『我們信聖靈。

『但若有人說：「在沒有他的時候已經有了別的東西」，又說，「在他生下以前，他沒有存在」，並且再說，「他從無中生有」或者承認天主的兒子是與天子不同「體」，或不同「性」，或說他是受造，或改變無常，都要受天主教會的詛逐』。

這些創造信條的人，雖然要想使牠永遠成立，萬世不變；然在四五一年第二次的全體會議中，却把牠增刪了幾處地方。從那時起一直沒有改變。在這些會議中所討論的別種問題大半是關於審判異端的人，就是說那些不肯服從爭論中多數人的規定的教士。除此以外，這些會議還規定教士的行爲，並且漸漸的發展到希臘正宗派教會政治的制度。所以在四五一年中的第四次全體會議裏，就有一種設立教長制度的決議。在俄國教會所承認的第七次，也是末次的全體會議中，曾准許聖像的崇拜，而審判那些毀壞聖像的人。

這是在七八七年中的事。從此以後聖靈就停止啓示人生的道理。正宗主義就

此固定。教會中的神學家在一千多年當中專門把他們的心力費在防止教義方面的改變，並且不許人家增刪一點。

東方的希臘教會與俄羅斯教會所採取的固定的教義，可以說明牠們和西方天主教或耶穌教所區別的特點。其中最顯著的一種特點，就是東正教會缺乏學問淵博的教士。牠是不需要他們的，因為牠不必發現新的真理。牠雖然也有幾個學問家傳授遺傳的神學，防止那些埋沒正宗派信仰的叛教徒；但是創造的思想在正宗派教會中是沒有存在的必要與地位。這或者可以說明俄國所產生的幾個創作的宗教哲學家都是平信徒。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柯瑪耶考夫 (Khomayakov) 與最近的索羅維夫 (Soloviev)。俄國的東正教會不像西方教會那樣的已經設立了許多通俗的教育機關。在俄國地方牠從來沒有設立任何教會學校與大學，就是從前許多程度很高的神學院已經停閉了。新的神道學校正在慢慢的發展；就是在革命以前幾十年當中，教會要想發展的教區公學是很粗陋的，並且現在也已經無形消滅了。

西方的修道院大概都是學問的中心點。但是在俄國不是這樣的。教會對於有學問的修道士都抱懷疑的態度。牠以爲『書本上的狡猾』容易使人在精神上發生驕傲，並且認爲是魔鬼用以驅逐人的靈魂到地獄裏去的利器。

在有名的伯拆斯基修道院 (Perchersky Monastery) 裏的修道士，有一個故事講到他們弟兄中間一個名叫泥岐塔 (Nikita) 的，在異像中看見一個天使，吩咐他變成有學問的人，以教導那些問道的人。他就開始學習聖經，並且確能把全部的舊約聖經背誦出來。其他的修道士都疑惑泥岐塔這種愚笨的舉動是出于魔鬼的引誘；所以他們用了懇切的勸告與祈禱，纔把這個惡鬼從淵博的泥岐塔身上趕走。這個故事的終結說：『泥岐塔完全失去了他的知識』。

俄羅斯的教會爲了缺少學問的緣故，非但不能把牠所接受的宗教思想發展開去，而且牠甚至也不能保守牠們一定不變的。俄國文化的歷史家密利考夫 (Paul Milukov) 曾經說：『俄羅斯教會必須很容易的並且也無意的採取了她從前異教

徒的信條。她爲了要達到這種結果，就使東方的基督教變爲簡單化，並且減少到一種完全國有的情形。這種東方的信條經過簡單化與物質化以後，就變成俄國東正教特殊的與國有的樣式」。

俄國新進教的人，因爲大眾同受的洗禮與宗教教育的缺乏，所以在思想方面沒有多大的改變。他們以前所有異教徒的迷信大概仍舊不改的。從前的鬼神雖然已經稱爲魔鬼或惡鬼；但是他們還是不斷的相信牠們的存在。各種的災難，無論疾病或是旱荒，都以爲是魔鬼的作祟；所以要制服牠們種種的惡動作，非得祈求基督的聖徒與舉行神聖的禮節不可。這種元始宗教裏面所有物體的崇拜，仍然拿一種新的表像來繼續下去。比方一個俄國人在潛入水中游泳的時候，若使沒有把他受洗時的十字架帶在頸項上，就算是一種極大的冒險。這個十字架是他從小的時候就日夜帶着的。我曾經看見有些人要想停止火勢的傳播，就拿聖徒的畫像來放在着火的房屋與鄰近的房子當中。有的時候，他們要在舊的鬼神與新的聖像之

間，作一種互相調和的事情。譬如家庭中的『老土地』(Dyedouska Domovoy)是一個很受歡迎的神祇。一個家庭在遷移的時候就必用一種特別的儀式來移動這種神祇。一家的主母在離屋的前一日，要拿一塊麵包，一杯清水與食鹽，並且口中說，『土地公公，現在讓我們走罷』！當他們到了新的住宅中，這個主母就把這杯清水，麵包，與食鹽放在聖像底下，並且口中要說，『土地公公，現在你尊榮的位置就在那裏』。有人告訴我，這種風俗直到如今還是通行，就是在莫斯科地方有知識的家庭中也遵守這種習慣的。

在實際上看來，東正教裏的教士也不得不爲俄國的農民履行這些義務，與他們的祖宗請求于邪教中的祭司和醫家的一樣。他被人家請去用種種幻術的儀式與咒語來驅除屋中與田間的惡鬼。教士對於這種請求，也只好勉強允從。所以現今一個村莊上碰到旱災與瘟疫的時候，也可看到那邊的祭司從事于這樣驅鬼降魔的儀式。

聖像與聖骨的敬拜，若使能有正當的了解，那末對於虔信的人有一種美術的和表像的價值；可是俄羅斯的教會在實際上已經把一種精神的性質差不多完全失去了。聖像是俄國人民的宗教生活中一種最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不妨把東正教會對於牠意義上的教訓討論一下。東正教會在使用聖像的方面都要追溯到全體教七會議的解釋與准許。我們已經知道七八年中在尼亞西亞所舉行的第七次全體會議對於聖像發生了極大的爭論，並且議決准許聖像的崇拜。俄羅斯教會對於會議中贊成敬拜聖像的理由又加以擴充。

關於聖像的濫用與迷信，好像罪惡本身的存在一樣，並不算重要的事情。君士坦丁堡的聖麥托狄阿斯 (St. Methodius) 對於聖像的敬拜辯護最力。他寫給他的反對派說：

「你豈不是說這種聖像的崇拜已經把牠們變做許多神像嗎？但是你自己方面應當教導人民怎樣尊敬牠們纔算合適；因為設使有些個鄉民或是農民遇見王的一

個僕人，就當他是王的自身，匍匐下拜；他並且說，「最仁慈的主啊，求你賜憐憫給我」。那末，你就當這個接受敬拜儀式的僕人和這個奉獻敬拜儀式的農民都是大逆不道，而把他們處死嗎？若使他這種舉動是出于無知；那末當然不定他罪的。但是那些知道這事的人應當負責把這不是王的本身的意思解釋給這種無經驗的人聽；因為王住在他的宮殿裏，除了他在規定的時候出來表示他自身以外，沒有一個人可以看到他的。所以你應當教導那些因為無知無識的緣故而把基督造成一種神像的人說，這不是肉體的基督，却不過是他的形像罷了。因為照我所知道的，基督是在天上，沒有一個人可以看見他，除非等到他第二次來審判這世界的時候。這種意思他們當然是懂得的，因此他們就可規定他們崇拜的儀式。所以主教的意思就是要指教人民怎樣相信與禱告」。

所以在早先的教會裏，大概爲了聖像實用上的緣故就把牠們保存起來。這些聖像就是那些無知識人的教科書。其實，在古代的教會裏，這些聖像是代表正宗

派得救的計劃與教會的歷史。著名的聖母升天紀念堂就可以表明這種意思。這個禮拜堂最初在一四九三年建造的，可算是正宗派教會中最完全的模範。牠裏面的畫像就是在祭台的一部份地方，橫分爲好幾層。在每一層裏面裝着一排一排的聖像。這些聖像所表示的根本意義，就是要講到歷代以來，基督教對於聖徒的團體有完美的與真實的教訓。

最上面的一層表明摩西時代以前的聖徒，中間是萬軍之主，四圍就是亞當，賽特，以諾，亞伯拉罕，以撒與雅各。這些圖像就是要表明從一切生命的父繼續下來的聖潔。第二層的聖像表明舊約教會的聖徒，一直從摩西起到基督爲止，中間是聖潔的童貞女。在她兩旁都是些先知。他們手中握着包含米該亞的希望的羊皮卷。再下一層當中的圖像是講到福音書中十二種最大的故事。第四層（就是在莊嚴之門上面）的圖像是描寫基督教會的本身，基督坐在天上的寶座上，好像永遠的大祭司，仲裁我們的罪惡；在他的兩旁邊，有他的母親與施洗約翰站立着作

禱告的形狀，可以代表兩個完全的人格，在他面前做罪人的調和者。在他們的兩旁邊都是些使徒的形像，以聖彼得和聖保羅開頭，因為他們倆是基督福音的宣傳者與基督教會的建設者。所以從祭台內部的牆垣上所有自上而下的形像是要描寫教會逐漸的發展，如同看不見的聖徒的團體一樣。

教堂裏的四個柱石就是要表明殉道者的血已經變成教會的力量。在聖像處的莊嚴門上，畫着天使報信息給四個傳道的圖像。在南邊的牆垣上是畫着全體的會議。牠們的學說和法典是包含東正教會的教訓。在西面的牆垣上又畫着末日審判的圖像；除了這些以外，還有許多聖像和油畫，表明俄羅斯教會與國家中所認為重要的聖母像與聖徒像。

但是這些聖像在學理上的解釋往往超過牠們表象的意義。若照聖達馬星 (St. John Damascene) —— 他的見解已經在第七次全體會議中得勝過的 —— 看來，聖像已經變做道成肉身的一種物質。這種思想和現在俄國流行的神化的聖像的信

仰是很有關係的。在俄國的地方，有幾十種聖像是教會認為不是人造的，却是從天上的上帝降下來的。這是可以拿他們行奇事的能力來證明的。我很懷疑全體會議中的教父是不是接受這些神話。但是在俄羅斯地方，牠們不過是聖達馬星所主張的一種自然的發展，並且也就是密利考夫所說的基督教思想的物質化。俄國的人民與教士，若多受些教育以後；那末這種聖像的物質化當然漸漸的會消滅，而且這些圖像將要變成基督教思想的一種神聖的記號與美術的表像。

講到慈行善舉的意思，也被教會降低到一種自私的地步，直到如今乞丐制度在俄羅斯的教會看來，不是一種經濟制度中的罪惡，却是一種道德教育的機關。他們說，上帝要設立窮苦的和下等的人民，好使虔心的教徒可以有練習做慈善事業的機會。所以乞丐制度是當做神聖秩序中的一部份，不必去破壞牠或是永遠的減少牠的。這種物質化的道德理想，最好拿俄國的一個通俗的宗教教育家波索士考夫 (Pososhkov) 的勸告來說明的。他說：「你們當留心你們的德行要超過這些

士文和法利賽人，才能進入上帝的國。所以在你們獻給上帝十分之一以後，還要加添百分之五。這些法利賽人在一禮拜中作兩次的禁食；但是除此以外，你們還須在神聖的教父所規定的一年四個節期中禁食。這樣你們就可以超過這些法利賽人了。

幸而在過去的一世紀中，親斯拉夫派宗教哲學的運動使教會在正宗的教義上與遺傳上得到些新的解釋，比這些修道士和祭司的物質化的意象學裏所包含的道德教訓更加高尚。這些斯拉夫的哲學家都是很有學問的，而且也是很熱心的平信徒。他們看教會如同一種國家的機關，並且要想在牠裏面希望實現他們大斯拉夫主義的夢想。在這些哲學家當中要算科姆耶考夫 (Khomyakoff) 最受俄羅斯教會與教士所歡迎。這些教士常常自由應用他的著作來把他們正宗派的信仰與行為解釋給外國人聽。這可表明在固定的教派範圍裏面仍舊有創造的宗教思想的地位。在東正教裏祇要人家不攻擊牠的儀式，牠總不會舉發別人的異端的。

這些教士能夠接受科姆耶考夫的思想實在是一種很有希望的記號，可以表明將來必定有一個時候能夠拿這些新的解釋來教導俄國的民衆，以勝過正宗派信仰中不重要的物質化的宗教觀念。科姆耶考夫對於教會爲死人祈福與向聖徒禱告的解釋都有心靈上的美意。他看教會好像一種由信仰與愛心組合而成的有機體。

他說：『教會是建築在愛心上面，並且拿愛心來聯絡她的各部份與教友。沒有了愛心，她就不可思議了。……這個看得見的教會若使聯合而成爲一種緊密的有機體；那就變做基督的整個教會中的一部份，而且組成信徒在地上的天國。她雖然建設在惡意的世界之中；可是因爲她根據于一種新的生命原理，所以她能夠使她的教友脫離罪惡，接近創造衆人的天父，並且達到耶穌基督的面前——他就是愛的泉源，主要的柱石與全體教會的元首。他把無限的愛心充滿全體的教會，好像他自己的身體不能離開他一樣。至于愛心的要素是看不見的』。

這種教會的見解——就是看教會如同一種由那些承認基督爲救主的衆人所有

的信仰與愛心結合而成的有機體——使這種爲死人祈福和向聖徒禱告的觀念自然而然的變成顯露的世界與隱藏的世界中間禱告上的聯合。科姆耶考夫反對天主教中人類死後要入煉獄的觀念，與請求聖徒援助受苦的罪人脫離憂愁的思想。他以爲對於生者與死者的禱告是愛的一種真正結合，並且能夠把看得見的與看不見的教會聯合起來。

他說：『我們知道我們中間任何人跌倒了，他是單獨跌倒的；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單獨得救的。凡在教會中得救的人就變成她的一份子，並且和其他的教會是合而爲一的。若使無論什麼人相信了道理，他就在信仰的結合裏面；若使他有了愛心，他就在愛的結合裏面；若使他懇切禱告，他就在禱告的結合裏面。……』

『正因爲我們每個人需要衆人的禱告，所以每個人應當要爲活的或死的或未會出世的衆人禱告；因爲在禱告裏面，好像我們對付各種教會一樣，就是要求全世界都認識上帝。我們非但要爲現時代的人禱告，也要爲那些將要從上帝那裏得

着生命的人禱告。相互的禱告就是教會的血液，上帝的榮耀就是她的氣息。我們的禱告要有一種愛的精神，不要有一種自利的態度；要有一種忠實的和自由的精神，不要好像一個僕人要求工資的態度。凡是疑問「禱告有什麼用處？」的人就承認他自己已經受了束縛。真實的禱告就是真實的愛心」。

上面這種深切的敬拜的與禱告的精神是東正教會中真正的動力。牠本來在學理方面是固定的，並且公然不允許別人改變牠遺傳的神學。

東正教會在最黑暗的時代也從來沒有缺乏過聖徒和先知。他們能夠維持教會的神聖與尊嚴，使牠不致中斷。他們常是粗陋平凡的人，但是他們都能引起民衆敬拜他們如同聖徒的心理。

若使讀者要在俄國的聖徒中找到像西方的聖徒那樣的偉大人格，那末他真是要大大失望的。俄羅斯教會沒有產生過好像聖奧古斯丁 (St. Augustine)、聖法蘭西斯 (St. Francis)、聖多美尼克 (St. Dominic)、聖伯爾拿 (St. Bernard) 舉畢

斯多瑪 (Thomas a Kempis)、路德 (Luther)、加爾文 (Calvin)、衛斯理 (Wesley) 等等宗教家。在俄國的聖徒中間沒有一個大的思想家或傳道者。這些聖徒的傳記寫得文字簡陋，毫無興趣，都是千篇一律的。講到他們在禁慾方面的成功，有時還要把它們所做的不可信的奇事加添進去。這些傳記在歷史上沒有多大的價值。牠們是不過描寫人民對於一個聖徒應當怎樣的設想，却不是他真正的生活狀況。牠們的價值只也能加添我們在研究東正教徒的宗教思想方面的材料。俄羅斯教會在會議中所規定的聖徒都是採取社會上一般民衆久已敬奉的聖徒。在許多的地方，他們的遺骸都被人發現出來，一點沒有腐爛，並且能行許多醫人的奇事。這些傳記常常是那些似通非通的修道士所寫的。他們很少經過歷史的考察，却是把各種傳說鋪張揚厲的牽強誤會而成的。我讀了幾部聖徒的傳以後，我曾經把他們作過一種分類的嘗試。

第一種就是禁慾派。這是在俄羅斯聖徒中要算最普通的。他們通常住在地獄

中，或是臥在棺材裏，並且有些時候把他們自己活活的葬在一個坟墓裏，祇把墓口封閉的牆垣中開了一個小洞，可以拿少量的麵包與清水供給這個埋葬在裏面的人。那個住在坟墓中的人有時間能夠經過十多年的工夫，並不看見人，又不和人說話，後來就漸漸的死于飢餓與污穢中。在外面的人看見他幾天不吃麵包與水，又不聽見他在裏面活動的聲音，於是就把墓口的牆洞閉塞。這個聖徒就算爲已經歸天去享受安息與快樂。那些人中間，有幾個屍體，大概因爲缺乏滋養與慢慢死去的緣故，就不致很快的腐爛，却變成僵化了。這些屍體就稱爲『不朽的屍體』，大受教會與人民的尊敬。

還有一種很普通的聖徒可以稱爲瘋癲派，或是教會中歡喜稱他們爲『因基督的緣故而瘋癲的人』。他們大概都是蓬頭，赤足，半癡的漂泊者。他們的頸項上和腳踝上都是圍着鐵鍊，滿身都是骯髒，並且從傷口處還要流出血來。他們中間有幾個人已經不會說話，但是他們呻吟的聲音與含糊的言語却被人家拿去當作預

言和默示的解釋。這些人中間有許多已經被教會認為神聖的瘋子，並且在民間也享受極大的榮譽。

另有一種經過教會承認的聖徒，稱為武士派。這些人都是勇敢的和度信的兵士與王子。他們爲了保護他們的人民和教會，犧牲了他們的性命。與這種武士派很相近的聖徒還有一種先知派。這些人都是教會中的主教。他們毫不顧忌的反對不公道的和殘酷的君主，甯願得到烈士的冠冕，不想取悅于殘忍好殺的君主。比方莫斯科的總主教聖腓力 (St. Philip) 是被可怕的約翰王殺死的。未了，還有一種聖徒，我們可以稱他們爲道學派。這些人都是莊嚴的度信的聖人。他們的學問大概是很淺薄的，但是他們的生活却很簡單，常常刻苦操勞，把他們的產業分給窮苦的人，一同享受。

這些人在內心中已經經歷了一種真正的變化 (Preobrazhenye)。俄羅斯的神秘主義者都教導這種爲各個真實聖徒所渴望的內心變化的道理。這種道理與耶穌

教中所講的心靈的重生，信徒的完全，與身心成聖的意思是可以互相比論的。俄國的人民都相信一個人離開了世界而住在完全孤寂的地方，或是在一個同心修道的團體中更容易得到這種內心默化的地步。這就是隱居者的起源，他們會常常發展到大的修道院，並且最後也能夠擴張到一個鄉鎮或是城市的地步。

如今俄國有許多地方，尤其是在西伯利亞與高加索的山上，當然還有許多聖徒住着。他們對於俄羅斯人民的宗教觀念發生很深切的影響。他們就是鹽和酵，可以保存東正教會在幾世紀來不致被國家的擄掠政策所破壞與損害。

第四章 東正教會內部的改革

「在基督降生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就是「聖母升天節」——在上帝教護的莫斯科城中紀念聖母升天的大禮拜堂裏俄羅斯東正教會舉行神聖的全體大會（The Holy Sobor）的開幕禮」。……這是東正教會的全體大會的議事錄中開端

的話。

每一個忠實的教士希望聖議會的重新召集，這是他信條中和日常禱告裏的一部份。虔信的東正教徒常常在口頭上念着說：『我相信神聖的普及的使徒正宗派全體大會的教會。這種全體大會的意思明明白白的和聖徒結合的觀念有關係的。我們也知道這是東正教會所溺愛的學理與行爲。至于全體大會的意見人家都信以爲絕對無誤的，因爲聖靈是藉着大會以啓示上帝神聖的真聖與旨意。』

若使我們把這些遺傳的思想牢牢記在心頭，並且也知道東正教會在二百多年以來已經被俄皇獨斷的意志把召集大會的權利完全剝奪，若使我們又能設想在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風潮中忠實的教徒何等的爲教會的利害着急；那末我們就可以明白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五日所舉行的全體大會要如何的感動這些虔信的衆信徒了。

在這個大會開幕以前，教會對於當面所碰到的問題曾經作一種詳細的研究。

這些研究開始于一九〇六年，那時沙皇因被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所震驚，終於允准召集一種全體大會。這個聖議會組織了一種籌備委員來研究各種問題，以便將來在大會中定奪。沙皇允許即刻就召集大會，但是他終不實踐他的說話，不顧羞慚的困循過去。

在一九〇六年的預備會議中有五十多個最有學問和勢力的主教，教授，祭司與平信徒赴會的。他們開了一年的會議，常常討論教會的各種問題，並且決定許多建議案。他們的討論與建議案包括在三本很大的報告書中。他們的內容大概是講到全體大會的組織規例與實施方法；教會的中央管理機關與地方管理機關的改組；教士的裁判所；結婚與離婚的法制；教區的小學與神學院；教會的產業；教士的團體；教會的統一與有些個學理上的問題；末了是講到各種保護正宗派信仰與基督徒虔誠的方法，以防免虛偽的教訓與解釋，因為國家中宗教自由的原則漸漸的堅固起來了。

這些會議的記錄是很有價值的。牠們可以表顯教會中最好的思想家在革命以前所有的觀念。在這些會議中對於沙皇統治的批評雖然是禁止的，但是在這些教士中也有不少的人覺得教會裏最大的罪惡就是在于她的受制于政府。他們當然不想把政教分離。他們要得到政府的供給與保護，否則就要求一種以德謨克拉西爲基礎的獨立與自治，並且要拿全體大會來代替沙皇最後的與最高的權威。於是後來就明明白白的發生二種不可調和的黨派。這些自由派是贊助全體大會和教會中一種民主政治。這班反動派恐怕全體大會的原理得了勝利，那末沙皇的專制主義就要變弱而傾覆。後來恐怕沙皇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改變了他的心思，而不想召集這個全體大會。這個反動的聖議會監督波俾多諾塞夫和後來反動更厲害的監督薩布勒(Sabier)爲了要緩和自由派的分子——他們的領袖就是彼得堡的總主教安多紐(Antonius)，他也是教會中大會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們也繼續的談論大會的事情，但是毫無召集她的誠意。所以在一九一二年薩布勒把大會的意思從

新復興起來，作爲一種護身的盾牌，好使他不致受着國會中自由派的攻擊，並且他允許他們在舉行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紀念典禮的時候（一九一三年）可以召集全體大會。但是慶祝典禮過去了，大會却未曾召集。

然而一九〇六年大會的籌備委員會和一九一二年反動的薩布勒委員會所做的工作也還沒有失去。她們的決議案無論好歹都被一九一七年的正式大會所借用。從一九〇六年到一九一二年與一九一七年中間，教會的地位自然有一種極大的區別。自從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二年直到歐戰發生的這個時期當中，教會與國家裏面反響的勢力大大得勝。在一九一七年中教會的首領——就是沙皇——已經消滅了。這個新組織的臨時政府雖然不公然反對教會，可是也不維持舊時的關係。況且這種使沙皇遜位的政治革命很快的發達到一種社會的革命。天空中好像黑雲密布，風雨驟至的光景。這些風潮對於教會不無損害。這是教會中的領袖所確切覺得的，所以他們都觀望這個延擱的全體大會如同一隻船在風浪中能夠達到安全的

港口。

在這個大會中一共有五百六十四個代表。在這些代表中間八十個是主教，二十個是修道士，大半就是修道院中的神父，一百二十九個是祭司，三十六個是會吏和執事，其餘有二百零九個足可代表社會中一切階級的平信徒。但這些平信徒當中除了十個伯爵和王子以外，有許多貴族的代表，三十個神學院與大學院的教授，還有許多大地主，廠主，政客，軍人與農民。他們選舉了三百四十一個正式代表。其餘都是當然會員，可以代表主教團體，修道院，海陸軍，神學院，科學院，大學院，國會，政府的人員等等。這是一個可以代表一切階級的團體，但是大半自然是代表教會中守舊的份子。

在各個教區中選舉代表的方法都是採用一種間接的選舉法。先由各鄉區選舉代表到縣區大會，再由縣區大會中選舉代表到教區大會，再由教區大會選舉代表到全體大會。在這個全體大會中平信徒却占多數，這是西方的教會大會中所罕見

的事情。

從各處地方來的講員對於大會都有一種相同的情感，就是說：這個國家是被國外的仇敵所壓迫，可是更壞的事却是國內的紛爭與腐敗；人的能力再不能救治這種情形，所以東正教會必須對於她的責任有相當的覺悟。

聖母升天紀念堂的牧長說：『我們俄羅斯的祖國並非爲一種凶惡的國外仇敵所征服，却是被國內各種虛偽的教訓和叛教的信仰所破壞。……我們處于這種驚慌困苦的生活中從什麼地方可以得到安全呢？除了基督的教會以外，那裏還有安全的地方呢？……』

莫斯科的總主教替康 (Tikhon) 就是後來當選爲教長的，在歡迎這個大會的時候說：『我們的祖國是在混亂和危險的當中，幾乎已經到了敗亡的地步。我們怎樣救牠呢？這個問題是要我們作深切的思考。俄羅斯幾百萬的人民信托這個教會大會在這種困難的情勢中不致默然不動。……』羅狄諾夫 (C.K. Rodionoff) 代

表全體的公學發問道：『這種能夠控制放蕩不拘的俄國人的呼聲究竟在那裏呢？那裏有一種聲音能夠喊着說，「同胞們，請留步，我們都要死在放縱情慾的當中呢」？這種同樣的恐慌在社會革命起來以前的各種演說辯當中常可聽到的。衆人都希望這個全國大會是危險的狀態中最後的一種希望。

大會中第一個決議案就是要發表一篇宣言，勸告軍隊與人民把九月二十七日當做全國悔改與禱告的日子，好使國家與教會能夠從內亂與外患中拯救出來。

在這種危險的時期中，這個大會是在試驗牠道德的威權。那時俄國當然處在很容易被德國軍隊征服的危險當中，並且政黨的紛爭也好像要發生一種國內戰爭的結果。俄國軍隊已經毫無紀律，好像一隊土匪那樣的槍劫牠自己的國家，尤其是要常常擄掠男女的修道院。這個臨時政府實在無力應付這種情境，牠唯一的信靠就是要召集一個立憲會議以解決新政府的形式問題。

全體大會中所有迫不待緩的問題就是『參加與不參加』政治的問題。其中有

一部份的人竭力贊成積極的參加選舉，並且要組織一種好像教士黨的樣子。別的人都反對參加政治，恐怕教會的心理方面要被牠妨礙。

在一九一七年八月底科尼洛夫將軍 (General Kornilov) 進入莫斯科的時候，他爲了要想建設一種武力的狄克推多制，就致書於全體大會請求牠的贊助。大會中許多會員歡迎他的舉動，並且催促大會和他聯絡。只因爲這種軍事行動忽遭失敗，就把大會公然贊成科尼洛夫將軍的舉動完全打消。於是牠末了只通過一條議案，就是要勸告人民有一種「團結和友愛的精神」，並且要求民衆對於這個失敗的篡奪者有一種憐憫的心。這種科尼洛夫事件給大會一種關於教會參與政治的危險方面最合時的警告。他們對於教會參與或不參與選舉的問題，經過熱烈的辯論以後就得到一種調和的主張說，教會當國家處於無政府的危險狀態中的時候不能取漠視態度，卻應當使用牠在各種政黨裏面所有道德的與心靈的影響，並且要勸告民衆說：『你們應當小心的公平的盡你們做國民的天職。你們應當選擇那些承

認基督的宗教與正宗派的教會有極大無比的價值的人做候選員」。在選舉以前，大會曾經發表一篇告民衆書，裏面就是包含這樣的思想。我們如今知道這種請求書對於民衆無足輕重。這樣的勸告斷不能鎮靜社會革命急進的運動。革命的火山自然要爆發出來的。

大會中主要的工作就是要議定一種新式的教會政治。這種舊的議會政治已經完全崩裂了，就是大會中最守舊的份子，也不歡喜恢復這種制度。臨時政府爲了要免除那些附屬於聖議會監督的種種討厭的組織，索性把牠的職位裁廢，並且臨時另外組織一個教務部。

對於新教會政治的問題當然要發生長久的熱烈的辯論。大會中有一派人以哈科佛(Khar'kov)地方的大主教安多紐克拉波維次基(Antonius Khrapovitzky)爲領袖。他是主張一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政治，並且願意使教長得到極大的權力，把聖議會變成他的參事會。還有一派人完全反對這種教長的政治，並且指出獨裁

政治與中央集權的危險。他們也引證俄國歷史上以前的教長所造成種種擾亂的事。這種反對君主主義而贊助民主主義的趨勢在革命的俄國已經到處流行，所以對於教長制度的恢復都不贊成。有人說：『在喚起迅速行動的時候，獨裁制是需要的；但是在需要詳細與安全的動作的地方，那末委員制是比較好些』。在十月裏的時候，人民中間充滿了這種民主主義的意見，但是等到多數派得勢以後，這種情景又忽然改變了。

這個大會突然受着了一種驚慌。他們恐怕在完成他們聚會的目的以前就被政府解散。關於這種贊成和反對教長政治的辯論差不多經過兩個星期的工夫，六十個講員對於這個問題已經表示過意見，還有五十多個報了名而沒有機會發言的。牠後來就決定停止討論，從事于選舉教長方面。牠覺得仇敵已經在教會的裏面並且急需一種斷然的處置。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七日，這個大會通過了一種議案，作為教會憲章的基

礎。這種有歷史價值的完全條文如下：

『(1) 在俄羅斯的正宗派教會裏面最高的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都屬於國內的全體大會。這種大會在規定的時間召集，並且是由主教，教士，與平信徒組織而成。

『(2) 教長政治應當從新組織起來，教會的行政以教長為首。

『(3) 教長是在他同等的主教中算為第一。

『(4) 教長可與教會行政機關聯合，對於大會應負完全責任』。

我們可以看出上面這種簡單的條文對於全體大會的權力總算規定了。但是對於教長方面，除了他是同等主教中的領袖以外，並未提及他的權限和責任。至於教會的管理機關也沒有說起。在選舉方面，仍然照着老的規矩，先揀選三個候補員，然後用抽籤的方法從他們中間選定一個教長。那時教長的候補員當中得票最多的要算哈科佛地方的大主教安多紐克拉波維次基。他是主張教長政治最有力的

人，並且也是代表大會中的右派。其次爲諾弗哥羅 (Novgorod) 的大主教阿森紐 (Arsenius)。第三個得票最少的候補員就是那時莫斯科的總主教替康，他後來却被當選爲教長。在十一月八日，那時莫斯科城裏因爲戰爭的逼近，萬分驚慌，所以這個大會就聚集在救主堂裏，叫這個九十歲的老教士亞曆西斯 (Alexis) 抽籤，結果總主教替康就當選爲俄羅斯正宗派教會的教長。

替康的當選于大會中的右派很是失望，尤其是那些和安多紐交好的人。他們都希望他做教長的。他們並不以爲總主教替康是一個自由派，也沒有人拿這樣的異端來控告他；然而他們以爲他的力量不夠對付這種環境，因爲那時的情勢需要一個好像安多紐那樣有強力勇氣的人。替康是一個很和平，太穩健的人，容易爲左右的人所改變。所以大會中就議決組織一種有強力的高級參事會和一種聖議會去輔佐他。他可以做這兩個團體中的主席，並且在管理政治方面也可得到牠們的助力。

這個大會給教長一個銜頭，就是所謂「莫斯科與全俄最神聖的教長」。牠使他有一種看顧教會利益的責任。在這方面他可以與聖議會與高級參事會合作。至于這兩個輔佐的團體就是要討論和核准他所提出的各種議案，並且牠們也提出關於教會利益的建議案。然而這些建議案必須由聖議會和參事會中永久的主席——就是教長——提出討論的。教長也有否決權。至于這種否決權只能拿全體大會的議決案來打消的。教長至少要在三年當中召集一次大會，並且報告他所做的各種事業。教長也有權執行與國家和別地方自主的正宗派教會（比方保加利亞，希臘的正宗派教會等等）中間所有必要的關係，補足主教的空位，接受主教的告訴，和解決他們中間的紛爭，以及別的行政上與司法上的功能。

對於教長的彈劾案可以由聖議會與參事會的聯席會議中決定，在一個特別組織的委員會中提出。在這個委員會中教會所有的主教和別地方正宗派自立的教會裏的教長和代表也被邀請列席。關於教長的彈劾案和判決書都要經過這個特別委

員會中三分之二的可決方爲有效。末了，牠也規定在教長因死亡或被彈劾而出缺的時候，那末聖議會與參事會裏面年長的主教可以代替他的位置，但是只有坐在教長座位裏的人，就是他的繼任者，才能承受他的產業。

這個聖議會是由十二個主教組織而成的。在這些主教裏基輔的總主教是一個永久的當然委員。其他六個會員是由大會中選出的，還有五個會員是由教長每年輪流委任的。教會的高級參事會是由十個人組織而成的。其中有三個主教是由聖議會的會員中選出的，還有一個道修士，五個教士，和六個平信徒都由大會中選出的。這位教長就是聖議會與參事會兩方面的主席。

聖議會可以受理那些關於教會中的信條和戒規，佈道與教育的政策，行政方面的任免人員等等問題。參事會大概管理關於教會暫時的利益，如同商業管理方面，經濟核算方面等等的問題。凡是關於特別緊要的事件可由教長或是兩個團體中任何一方面的請求，再在聯席會議中解決的。

教會中的主教都是那些在修道院受過戒規的獨身主義者或是鰥夫。他們是由聖議會提名，在教區大會中選出的。他們可由各地方的教區會議所提議的候補員中選出的。在這種教區大會中，到會的教士與平信徒的數目大概是相等的。這些當選的候補員都要經過聖議會的核准。在緊急的時候，教長和聖議會也有權委任主教的。教區中的主教在管理教務的時候可以和區議會中的教士和平信徒合作。這些教區再各分為縣區。在縣區中也可從地方上的教士中選出一個主理並且組織一個包含教士和平信徒的縣議會。縣議會的會員都要經過區議會的核准。

每個鄉區的組織也根據于同樣的原理。鄉區中也可以舉出一個鄉議會與長老來管理地方上教會中暫時的事務。教會裏的教友可以有權在鄉議會或教區中的主教所提議的候補員中選出他們的祭司。但是各種當選的候補員都要經過教區中的主教核准的。

這是由大會規定的俄國東正教會的組織大綱。從上到下，牠的根本原則要使

平信徒與教士有一種密切的聯絡，並且給主教團與他們中間的首領（就是教長）一種相當的權限。至于最後的權力是在全體大會中，不過這個大會又是由主教，教士和平信徒組合而成的，並且教長就是牠的主席。東正教會有了這樣的組織，自己信以為足夠對付社會革命中所發生的種種問題。牠雖碰到各種的困難，仍舊希望維持牠以前在國家裏所得到的權利與努力。無論如何，這是從前沙皇所要創設的教會政治。這種政治已經使全體會議受牠的節制。但是牠總不能洗刷牠在沙皇時代所有污辱的歷史，又不易恢復牠對於大部份民衆所失去的信仰。

教會中的舊領袖完全不知道教會是不能避免社會革命的影響。這種社會革命的呼聲說：「國家的權利只用以服務民衆的」。這種服務事業教會還沒有做過。並且牠只有從根本上改組以後，才能實施這種服務的事業。

第五章 教會與革命的戰爭（上）

教會政治的重組對於革命實在是一種挑戰。牠可表示全體大會右派反動勢力的得勝與教會中一種真正自由思想的軟弱。因為教長政治的意思就是在教會裏的君主專制政體，並且使人民保持帝王的思想，所以對於革命的輿論當然是一種挑戰。這時全體大會中佔居完全勢力的反動派希望教長的地位就是預備將來復興王位的道路。這個大會很不識事務，對於社會革命的勝利完全沒有信心，等到布爾什維克的共產黨得勢以後，因為牠知道牠的要求並且毫無顧忌的要執行牠的革命計劃，所以把大會的反動目的愈顯得濃厚了。大會繼續牠的反動工作，對於實際的情形盲目不知，並且對於工人的正當要求也完全誤會。

然而大會反對革命的舉動在多數派得勢以前早已發生了。大會的記錄就可以明明白白的表示這種事情。克倫斯基 (Kerensky) 的臨時政府曾經用一種很小心的政策來對付教會。牠很怕教會在政治上的勢力，但是牠不能阻止時勢的要求，所以不得不採取一種強硬的手段，反對教會中最受人批駁的主張與習慣。

革命對於教會已經創造出兩個顯著的問題。第一，就是政教分離的問題。進步的輿論都要求分離。教會反對這種事情並且想出一種計劃來脫離他在沙皇時代所受國家的拘束，同時要想保障他在這個時代所享受的種種權利，甚至還要加增牠們。臨時政府贊成用一種漸進的步驟來使政教分離，但是讓這個問題在立憲會議中解決。

還有一個問題，已經爲輿論所迫而不得不即刻解決的，就是學校與教會的分離。大會對於這事是絕對不贊成的。我們必須記得教育並不是東正教會自然的功，因爲牠從來不是一種教人的教會。牠却反對世界上的學問並且牠覺得知識不能增加宗教的虔信。

教會與政府的領袖，如同著名的波俾多諾塞夫一流人物，都有這種同樣的見解。但是教會對於通俗的教育雖然取漠視與仇恨的態度，却終不阻止牠的傳播。近代的生活是需要教育的。俄國若不使牠的人民都受教育，斷不能維持牠自己，

以反抗西方的國家。所以政府就從事公學的組織，可是這些公學雖經教會反對，仍然帶着反教的精神。教會爲了要排斥這種教育並且從新要在人民中間得到牠的權威（尤其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以後），就想用一種擴大的教區學校來控制公衆的教育。因此牠從政府那裏得到了許多經費。在一九一七年的時候已經有三萬七千所的教區小學。牠們的房屋要值一萬七千萬羅布。除了這些學校以外，教會還設立許多神道學校和幾個稱爲『精神學院』的高等神學院。這種學院和其他的教會學校比較起來，確是學府的中心。

這些教區小學特別是不孕衆望的，也是沒有效能的。所以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決定把這些學校和教會分離並且使牠們受教育部的節制。一種批准這個計劃的法令恰正在大會召集的幾星期以前通過的。這種革命的運動在大會看來自然是教會的一種打擊。那時政府還有一種計劃要使公學裏的宗教教育不可強迫施行。凡在十四歲以下的學生可由父母決定，但在這種年歲以上的學生都可自由選擇。大

會對於這種計劃竭力反對並且特別創設一部與牠抗爭。後來大會爲了臨時政府無力保護教會的產業，所以大大的失望，因爲那時的農民常常佔據修道院的土地，並且在城市中教會所有的印刷所與別種產業常常被革命的工人團體沒收去做自己宣傳的機關。同時在人民中間也常常發生對於祭司和修道士種種不法的舉動。所以大會很願意加入科尼洛夫將軍的兵力，以推翻這種臨時政府。

多數派的忽然得勢使大會非常吃驚。教會不願意不戰而自棄其特殊的權利，於是教長對於新的革命政府與新的社會秩序公然宣戰，並且決意奮鬥到底。

這是教長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九日對於教會所公佈的第一次通告書裏面的意思。這件公文是要責備革命的非法行動以及一切攻擊教會的事情。牠要用地獄的火與開除教籍來恫嚇那些胆敢傷害教會的人。我們不妨把這封公函裏顯著的言論引在下面：

『你們所做的事情不但是一種暴虐的行爲，實在是一種撒但的舉動；爲了這

個緣故，你們要在將來的生活裏受一種不滅的火的刑罰，並且在今世的生活裏也要爲後來的人所唾罵。

『我們藉着上帝給我們的權柄來禁止你們參與基督的聖餐；你們若仍然背了基督徒的名字，縱使你們生下來就屬於正宗派的教會我們還是要詛逐你們的。』

『我們也要懇求你們，就是在正宗派教會裏面一切忠信的兒女，切勿和這些人類的怪物發生任何關係，應當把這班惡人從你們中間趕出去（哥林多前書五章十三節）』。

這封通告書還繼續下去歷數『這些人類的怪物』的罪狀，其中最重要的罪狀就是：婚姻與學校的世俗化，教會土地與房屋的收歸國有，佔據莫斯科時對於教堂的轟擊與對於彼得堡救主堂的褻瀆。這封佈告書末了還要懇求虔信贊助教會的人組織一種神聖的團體來保護教會。爲了表示牠的精神能力起見，牠請他們『留意這些地獄的門不會阻止他們進去的』。

大會對於這封佈告書很熱心的接受。大會中有一個會員希望「這種與撒但的奴僕所發生的第一次衝突可以當做拯救國家和教會脫離仇敵的一種起點」。他末了也宣佈說：「我想最好稱布爾什維克主義爲撒但主義或是反基督主義」。另外有一個人說：「現今這種攻擊基督教會的撒但舉動，以及這些弑兄殺弟，搶劫擄掠，與互相仇恨的事情不是昨日才碰到的，也不是到了多數派的時代才碰到的。在革命的開始時代，執政的人已犯了叛教的行爲。（大衆說：「這是對的」）。禱告在軍隊中是被禁止的，凡是有十字架記號的旗子却換了紅色的破布。在這種地方非但要譴責現在執政的人，而且也要責備那些已經過去的人們。讓我們希望現在這班殺人流血的統治者會離開政治的舞臺」。大會中的情緒已經在牠中間一個最有勢力的會員的演說辭裏很坦白的表示出來了。他說：「俄國人民唯一的救星就是一個聰明的正宗派的俄皇，只有選舉一個正宗派的聰明的俄皇才能使俄國上了正當的歷史軌道，並且可以建設一個很好的秩序。我們在沒有一個聰明的

正宗派俄皇以前一定是沒有秩序的。……」

這樣坦白的言論使人對於教會在革命戰爭中所站立的位置可以完全沒有疑惑了。兩方面都預備戰爭，各方面都利用牠勢力所及的工具。教會就行施牠斥革教徒的權柄。非但以此反對政府中的人員，並且也反對每個與革命政府合作或爲牠效力的俄國人。牠組織民衆的示威運動並且要引起無知民衆的狂熱的信心。這個全體大會組織了一個總部來計劃出一種以攻爲守的策略，並且要把教會的全部勢力組織起來，以爲作戰之用。這些勢力是不可忽略的。牠有四十萬的祭司和修道士與幾百萬農民和市民的信徒。還有那些被多數派打敗的仇敵，從前對於教會是毫無用處的，現在却也來加入教徒裏面，要用聯合的力量來驅逐勝利的蘇維埃的兵力。有幾個沙皇時代的將軍和朝臣都把他們的軍裝和光潔的衣服改爲祭司的長袍，有幾個人就變成祭司和主教。大會的總部用盡力量來傾覆新的政府，並且有不少的祭司與主教相幫組織白色的軍隊。在城市中舉行種種大規模遊行召聖的

運動。教堂裏的警鐘是用來召集特別的禮拜與民衆大會，並且組織護教的團體，又用各種大規模的宣傳方法來恐嚇革命的兵士和驅逐多數派到卡諾沙（Canossa）地方去。在起初的時候，似乎教會可以得勝，並且革命政府的不得不放棄牠政教分離與教產國有的計劃。這種經濟上的損失最使教會發怒並且惹起牠的反對。有時這些暴徒對於不孕衆望的修道士和祭司所下的野蠻舉動可以幫助教會取得民衆的同情。但是這種教會受逼迫的呼聲就把真正的經濟上的問題和政治上的問題遮蓋過去了。至于這些在宗教的與社會的哲學裏所發生出來悖道而馳的區別，使這種戰爭加添許多熱忱和理想。

多數派中的人都是不妥洽的唯物主義者與無神主義者。在他們看來，宗教不過是野蠻人心中一種錯誤的幻想，或是一種事實上的欺騙，與「人民的鴉片」。他們看教會至多也不過是統治階級用以保守無知的民衆順服他們掠奪者一種歷史時代的錯誤。教會在人民的教育方面與勞動家爭得自由方面所取的反動地位更

可加添多數派信仰上的熱力。所以我們的希奇不在于民衆對於修道士與教士的暴動，却在于這些暴動的行為比較法國革命的時代不知要少了多少。這種在教會與革命政府中間所發生的流血很少的戰爭實是由于後者聰明的緣故，因為革命政府很明白無論拿什麼越軌的和強暴的行動來反對教會與教士都可使牠們的仇敵得到民衆的同情心。所以在教長呪咀牠的時候，牠仍然給教會一種保護。但是同時蘇維埃政府也不放棄牠反對教會的種種計劃。

蘇維埃政府的計劃是要把教會從政治中永遠排擠出去，使教士的權力打破，並且禁止他們參與國家中社會的教育的，和經濟的生活。牠希望教會在教育的與社會的團體中所有的勢力漸漸消衰，並且在經濟上完全失掉效能，以後宗教的本身自然會分離而失去牠控制民衆的權力。這種革命的新領袖很有一種政治家隨機應變的頭腦，但是他仍然保守一個多數派的心腸，就是要熱烈的努力于實現一種新社會秩序的烏托邦的夢想。共產主義是要組織一個共和國，在牠裏面末後會沒

有特殊的階級，政府，愚昧，罪惡，與疾病，並且裏面的生活也應當拿科學，理性，和美術來管理的。這些多數派覺得在這樣的社會秩序裏當然沒有舊社會秩序中教會佔居的地位。這種反教的無神的熱情有時就要發生粗暴的行爲，甚至要殘酷的反對有些人民和教派，並且這些行動才配稱爲宗教的逼迫。但是政治家的頭腦已經得勝了，那時反教的熱情也就此平靖，只有政治家的智慧獨能管理全部的情境。

我們已經指出蘇維埃政府應付教會的最近的目的是要使牠不能變成反革命的勢力，也不要祈求回復一個聰明的正宗派的俄羅俄皇帝。至于多數派最後的目的是要完全把教會破壞，並且使宗教從人民的心裏排除出去。爲了要達到牠眼前的目的，蘇維埃政府是要用立法的手續來破壞教會舊時經濟上與政治上的基礎，並且嚴密的看守各種反動領袖的行動與取消教長政治的中央集權。

同時牠對於正宗派教會內部的反對運動取一種聽其自然，讓牠過去的政策，

並且使各種反正宗派與異流的教派，如同福音宣傳派等等，在牠們宣教與勸化的工作方面得到完全的自由。這種宗教自由的政策在俄國歷史上從來所未有的，並且對於以前受逼迫的教派很有利益。自從這種政策實行以後，那些被逼迫的教派就表示一種很快的發展。各地方的正宗派教會，無論是守舊派或是改良派，也得到同樣的信仰自由，並且國家祇對於舊時要想恢復中央集權的反動教士才取一種嚴重的干涉手段。所以國家爲了要防禦教會制度的危害，却爲精神的宗教創設了非常適宜的環境。這似乎與多數派破壞宗教與教會的最後目的相反。是的，這種矛盾是確實存在的，並且也是歷史上辯證的程序中必然的結果。這種的事實沒有別的地方能夠像革命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那樣的彰明較著。

——如今讓我們再回復到正宗派教會與蘇維埃政府中間戰爭的慘劇罷。

在教長呢咀的佈告書發出以後，不到幾天工夫，政府就公佈了一條著名的法令（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回答他。這道命令是講到「一個人的良心與宗教

的社團的自由』。因此就把一千年來俄國政府與正宗派教會中間密切的結合完全打破，並且立下一種新的基礎，可以使蘇維埃共和國中有組織的宗教得以存在。

我們把這種法令的全文引在下面：

(1) 教會與政府完全分離。

(2) 在共和國的範圍以內，教會不能頒佈任何地方的法律與命令，以阻礙或限制良心的自由，或是根據于國民宗教的信仰來建設任何優先權或特別權利。

(3) 每個國民可以信仰任何宗教或是不信仰宗教。在法律上關於信仰任何宗教和不信仰任何宗教的限制都當廢止（附註：在一切公文中都不可述及人民的宗教信仰與不信仰）。

(4) 在法律上一切政府的和別種公眾的與社會的職務都不可附帶任何宗教的風俗與禮節。

(5) 宗教的風俗祇要不擾亂公眾的治安與不侵犯蘇維埃共和國人民的權利的

都可自由採行。地方的政府在這些情形中有權採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來維持公衆的治安。

(6) 沒有一個人能夠拿宗教的理由來避免國民的義務。凡關於這些義務的豁免以及兩種義務的互相調換等等事情，必須由人民法庭議決後才能允准。

(7) 宗教式的起誓一律廢止。在必要的時候祇須作鄭重的允諾。

(8) 關於民事的記錄應完全由民政的官廳或是婚姻與生產的部局所保管。

(9) 學校應與教會分離。在國立的，公立的，與私立的學校中不許教授宗教的信仰，祇可教授通俗的學科。但人民可以用一種私人的資格來教授或被教以宗教。

(10) 一切教會和宗教的團體都要受制于現在對於自願的團體與聯合會普通的規則，並且不能享受國家或是地方自治團體的特權與津貼。

(11) 關於教會或是宗教團體的利益實行強迫的捐款或課稅，以及這些團體

對於牠們的會員所有強迫的手段或處罰的規則是在所不許的。

(12) 教會和宗教的團體都沒有置產權。牠也無權稱爲法人。

(13) 現存的教會與宗教團體所有一切的產業都稱爲人民的產業。至于特別爲禮拜儀式而用的房屋與物件，祇要根據于地方或中央政府的特別法令，都可給這種宗教的團體自由使用。

這種法令若和別個政教分離的國家，如同美國和法國地方的法律與習慣比較起來，似乎有許多新的條文是真正帶着革命性質的。牠好像美國那樣的承認一切教派在法律上都是平等，一無所偏，並且容忍各種宗教的風俗和儀式，祇要牠們不擾亂公眾的治安與不侵犯別個國民的權利就是了。但是牠在政府通俗化的原質上比美國更加澈底些，因爲牠已經在政府的職務上排斥各種宗教風俗與習慣的痕迹。在這方面牠和法國的習慣更加相像。牠把各種教授通俗學科的公立和私立學校裏的宗教教育完全廢止。這一種使教育通俗化的方法除了近年來墨西哥地方小

學裏所施行的以外，沒有別的國度能夠和牠比擬的。

然而這個法令的真正革命意義在於牠對於教會產業的態度。我們必須注意教會收歸國有的時候，蘇俄政府並不要特別反對牠，却對待牠如同別的社會團體與私人企業，好像實業公司，銀行，大地主以及別種被收歸國有的私人財產一樣。

在實際方面，牠並不減削教會的宗教意義，因為那些用爲禮拜的教會房屋仍舊歸給牠們的教友，並不納租，而且祇有教會中這種有收入的產業才被沒收，以謀人民的利益。這樣的產業是很多的，包括種植的田地，森林，工廠與市房，大概價值好幾千萬羅布。

那些最受影響的就是修道院，上級的主教團體，與教會裏中央的管理機關，因爲牠們的經費都全靠這些產業的收入與政府的津貼。收歸國有的意思就是使教會經濟上失掉能力，並且可以減少牠政治上的權勢。末了這種法令非但剝奪了教會的財產與國家的津貼，而且也使牠不能變成一個積聚財產的團體。這就是法

令中那段剝奪教會有一種法人的權利的意義。

簡而言之，革命政府對於教會所取的不妥協的態度，正如同牠普通對於舊的經濟與社會制度一樣。因為牠要一致起見，非如此做不可。牠不能廢止一般私人的與團體的財產而獨讓教會享受其利。各種的法令當然要在各方面一律適用的。教會中的領袖若能承認社會革命的正義與必然性，那末牠當然與政府商議，使雙方互相諒解，因此可以解決牠的事情，免去許多的痛苦。但照事實上看來，教會與政府中間所劃分的鴻溝離開太遠，以致不能在牠們中間建設任何妥協的橋樑。在牠們中間總得有一方面屈服牠的主張。因為雙方都不肯讓步，於是戰爭就繼續下去了。我們若使再把全體大會對於政教關係的見解仔細考察一下，那末這種事情更加可以清楚了。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日，大會中通過了一種最後的決議草案。這種決議案預備將來新政府創制憲法的時候所採取的。這種教會認為適當的公文一共有二十五條，並且要請求：

向政府要求將
此而不受他的拘
束
對人民是聖教

(1) 俄羅斯的東正教會應當在俄羅斯政府中比別的教會要有一種特殊的地位，但是得以自由不受政府的管理。

(2) 牠的法庭上所有的法律與決議若不違反政府的法律，應該為政府所承認，並且政府關於教會的法令，事前未得教會的允許，不得通過。

(3) 政府對於教會政治與教會律法的解釋應當與教會相同。

(4) 政府中教務部的部長與他的助理員應當是東正教徒，並且他們的職務應限于視察教會法的正當應用。

(5) 政府一切可能的宗教舉動應當是屬於東正教的，並且教會中一切的節期都定為例假日。

(6) 實行與宣傳東正教信仰的自由權也當由國家保護，並且任何反對這種自由權的行動，如同公然侮辱和誹謗教會的教訓，聖物，與教士，以及強迫東正教會的教友改變信仰，都當認為一種犯法的行為。

(7) 一個教徒在結婚年齡以前不准自動退出教會，在這種年齡以下的兒童只在父母與本人同有此種願望的時候才准脫離教會，並且在九歲以上的兒童也應當徵求他們同意的必要。

(8) 凡關於東正教徒中所有生產，結婚，與離婚的事情必須依照教會的習慣註冊。

(9) 學校的教訓應有東正教信仰的精神，海陸軍的兵營中應當有隨行的牧師，並且教士可以免去當兵的義務。

(10) 教會任何的產業，如不得教會的同意，不可沒收，並且凡是不在出租的教產應當豁免各種捐稅。

(11) 末了，東正教會可以得到政府一種津貼，以補足牠的需要，維持牠法人的權利，並且照牠自己的判斷來擴大教會的基礎。

大會中這種決議顯然與蘇維埃政府的法律大相悖殊。在質的一方面看來，牠

要維持教會在沙皇時代所享受的舊利益和特權，却祇要取消以前沙皇藉着聖議會中的監督對於教會所施的干涉手段。我們就算大會的要求包含牠們最大限度的請求，祇讓一小部份可以有商議的餘地。但是牠仍可表示教會的請求，甚至在最和平的克倫斯基政府看來也要反對的（如同教區學校的維持）。所以牠對於國內革命的變動並不認為很嚴重的。牠不信仰社會革命有勝利的可能，而蘇維埃政府能夠持久，所以牠在計議律法的時候，完全忽略了新的政府，却爲了將來蘇維埃廢止以後的政府預備牠的決議案。

在蘇維埃政府公佈政教分離的法令以後，這個全體大會以爲政府方面總要用斷然的手段來執行這種法律。於是大會的總部就發佈命令並且在兩方面組織抵禦的辦法，就是：與政府的人員不合作和民衆的抵抗法律運動。但是政府很聰明的不急于實行國有的計劃，不過地方上的農戶却自動的所佔據了修道院，尤其是修道院的地產。這些修道士在保護修道院的產業方面實在難得有機會得到農民方面的

同情與贊助。

這些教會在牠們禮拜的習慣方面看不出這種法令的特別影響。那些爲禮儀上所用的教產仍然讓給教徒自由使用，並不取費。至于政府所要求的就是使這些教徒把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揀選一個負責的團體來管理教會的房產。對於這樣的處置實在無話可說的。所以教會不能拿宗教逼迫的情感來鼓動民衆。中央的教會機關和教會的學校與印刷所爲了缺乏國家津貼的緣故或是閉歇或是停頓的事實，也很難引起民衆的注意。因爲牠們從來沒有和這些機關接觸過，也沒有受過欣賞牠們的教育。

有些時候在公學裏爲了廢止宗教教育的緣故很受激動，並且也有人不管這種法令，仍然繼續教授宗教。但是等到後來政府與教會都沒有經費給這些教士作爲工作上的酬報，於是他們對於這種反抗的熱忱立刻就失去了。至于那些願意或有力盡義務的祭司也是很少的。

然而生命的本身是需要合作的。抵制政府的事情若不使人民中間吃苦，是不能持久的。況且也有不少的教士要受着教會中舊王子的壓迫。他們對於教長的政治是不很忠信的，所以教會中常要發生紀律寬鬆的事情，以減少牠對於政府的反抗力。在一九一八年四月裏，却正在政教分離的通令公佈後只有幾個月的光景，大會以為必須採取一種壓制的手段來反對那些不肯順服教會，却反抗教會權力的主教，教士，修道士，與平信徒。他們把教會的事情交給那些反對教會的政府機關辦理，因此使教會與牠的僕人，教友和產業發生許多的困難。牠的決議案就是要審判這些『上帝的仇敵』，並且規定了下面的三件事情：

- (1) 若使一個主教反抗教會最高的威權而求助于政府的勢力，就被禁止執行主教的職務，並且要受教會法庭的裁判。若使經過三次傳審以後，他仍抗不到庭，那末就把他的主教資格取消。
- (2) 凡是教士反抗他們教區中的主教而轉向政府的法庭請願，也要受同樣

的處分。……………

(3) 凡是教士在反教會的團體裏担任職務，同樣還有那些教士幫助實施這種反對教會的法令，如同關於良心的自由等等，也當禁止他們執行牧師職務。若使他們不悔改，就當取消他們的資格。凡是下級的教士與男女修道士也當受同樣的處罰。若是平信徒，就當把他們從教會中開除出去，並且不能在教會的機關中佔居任何職位。若使在一個地方全體的居民參與這些反對教會的爆烈運動，尤其在擄掠教會與修道院或是佔居修道院的土地方面，那末必須把這樣地方的教會關閉，並且把教士撤回，直等到全體的人民都有悔改的心，而把擄得的財產仍舊歸還教會。

大會所採行的這些強固的辦法可以表示在牠們自己中間也很難維持教長與大會對於政府的法律所抱的一種不妥協態度。

教會的抵抗力慢慢的動搖了。蘇維埃政府在無意中得到一種助力，就是那時

教會拿假造的聖骨來欺騙民衆的手段忽然曝露了。

在俄羅斯地方的大修道院，爲了要吸引召聖的信徒起見，就想得到些能行奇事的聖骨，特別是拿地方上聖徒的不朽的尸體來做標榜。我們已經知道民間通俗的觀念，以爲一個真正聖徒的身體是不應當腐爛的。這種觀念大概是從基輔伯契拉修道院（Kiev-Pechera Monastery）中住在地洞裏的隱士方面發生出來的，因爲那邊的氣候和別的情形都可使這些自願埋葬的狂信徒的尸體有殭化不腐的可能。別的修道院覺得牠們那裏的隱士比較基輔地方的聖徒不見得減色，並且也要求得同樣的名譽。於是就用蠟和別的原料照聖徒的形像做成尸體，放在寶貴的銀子棺材中。這種欺騙是在一九一八年十月裏在奧羅涅次克（Olonets）地方的亞歷山大斯微斯基修道院（Alexander-Svirsky Monastery）中清查財產賬目的時候發現出來的。有人在銀棺材裏尋出以前所藏的聖亞歷山大微斯基並不是一個不朽的屍體，却是一個蠟做的聖徒的模型。這種事實曝露以後，大大的引起各地

方人民的憤怒，因此要求一切不朽的聖徒都須受檢驗，並且把檢驗的結果公佈出來。然而最大的欺騙就是替康黎頓斯基（Tikhon-Zadonsky）與聖塞澤阿斯（St. Sergius）的假聖骨也被披露出來，因為聖塞澤阿斯的神龕是俄羅斯境內一個最著名的召聖的地方。至于塞結服（Serjiev）的修道院（現在已改為博物院）是俄國最富的一個修道院。

革命政府要利用這種顯露的事實來減少教會在道德上的權威當然是不會成功的。教會中的領袖與教長也覺得他們的失敗，於是就無精打彩的和政府接洽，要想說服牠對於教會改變態度。但是這些努力已經太遲，所以得不到什麼結果。在前次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從新召集了全體大會中，對於這種情景也沒有什麼改變。牠預備種種的決議案，要想引起民衆的同情心，以反抗政教分離的法令；但是牠的成功當然是沒有希望的。他們也並不信託自己，却希望各國干涉政策的勝利與蘇維埃政府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中間最激烈的國內戰爭中失敗。

第六章 教會與革命的戰爭(下)

蘇維埃政府在國內戰爭中佔了優勢以後，教長和他的顧問就改變了他們對於革命的態度，而開始主張教會對於政治問題應當嚴守中立。地方上的主教也想使執政者得到一種更加友誼的諒解；所以一九二一年總算和平了一年，並且還能做些建設工作，以補足長時期戰爭中所受的損失。

麥穀的無收成與饑荒的臨頭就把局勢改變了。蘇維埃政府又要受試鍊了。牠的仇敵又希望牠傾覆了。教會也有同樣的希望；教長就聽信那些顧問要想從國家的災難中得到政治上的利益。

在一九二一年的十二月裏，這班逃避到國外的主教忽在塞爾維亞的卡羅威次 (Carlovitzky) 地方召集了一個東正教會的教士會議。牠的領袖和主動者就是著名的大主教安多紐克拉波維次基。他想饑荒的情形實在是一種重新集合失敗的白

軍以推翻蘇維埃政府的好機會。這個卡羅威次會議決定要重建帝國政府，並且責任大主教安多紐在羅曼諾夫王朝的遺民中尋找一個繼位的嗣子。

蘇俄教會中的領袖當然要受着卡羅威次會議的影響，尤其是關於賑災的問題方面。在秋冬之交的時候，教長勸告教會援助饑餓的災民，但是教會中所募得的款項微乎其微。到了饑荒更厲害的當兒，有幾個祭司和平信徒開始在報紙上鼓吹教會中許多裝飾的貴重物品可以充作賑災之用，於是這種意思立刻就傳徧全國。凡是進步的輿論都贊成拿教會中國有的財產來救助災民。這事就引動了教長的感應。大約在二月的中旬他就佈告教會將無用的物品，如同無價值的首飾，寶石，與破碎的金銀東西，都可尋出來捐作救荒的款項，祇要徵得全體教友的同意就是了。這似乎是教長所願意做的極大限度，其實並不發生多大的效果。於是政府就自行處理。在二月底的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議中通過了一條法令說：

『爲了急需要集全國的財源以救伏爾加區域內的饑荒與播種起見，本執行委

員會除關於博物院物品使用法外又議決：

『訓令地方蘇維埃在本法令公佈後一月以內將以前國家給與各宗教信徒所使用的教會產業中一切貴重物品，金銀寶石，如不妨礙該教派之利益，應按照清單契券悉數移交財政部各機關，撥充中央賑災委員會款項。』

這道法令又規定移取教會的貴重物品時，應在保管教產的信徒代表的面前舉行，並且這些貴重物品應專為賑災之用，而賬目也須公開清查。

教長替康對於這條法令用一封致教會的公函來答覆（二月二十八日），其中口氣和他從前表同情于災民的宣言大不相同。他罵這條法令瀆神的和非法的，所以要叫忠實的教徒用各種方法來反抗牠的施行。各地方所起的騷擾情形正如同一九一八年政府公佈政教分離的法令時一樣。但是現在的問題完全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性質；所以蘇維埃政府就得了一種道德上的後盾，這是為一九一八年中所未有的。

要在一個剛從戰爭，革命，和饑荒中奮鬥出來的國家裏根據于教會的法典來與政府的法律爭辯，當然是一種失敗的工作。即使照法律上講，教會的團體也不能拒絕把牠們由訂立契約而得到使用權的教產歸還政府。

教長的這種反抗，非但在基督教的觀點上說不過去，就是從人道主義方面看來，自然也是不正當的。因此他的政策終究失敗了。政府並不取消這種法令的執行，而且把教會領袖方面的各種反抗行動也都制止。這些搜取教會貴重物品的委員對於選取物件方面很是留心。他們把禮拜時所用的東西都不取去，好使沒有一個人可以說他的宗教儀式已經受了損害。從教堂裏取出來的過剩財物很多；然而在外觀方面，令人看不出來，因為所留存的寶物還是很多呢！

在教會與政府中間，因教長的反抗而起的衝突也犧牲了不少的生命。政府有時要用高壓的手段來取締人民的暴動，因此發生了流血的慘劇。比方在列寧格勒有許多祭司和教徒都受法庭的審理，並且判決死罪的有十人，這位年邁的總主教

便雅憫 (Benjamin) 也在其內。在莫斯科地方也有一大批祭司和教徒受審判，其中有十個人被槍決，另外有許多人都被監禁起來。據說共總有四十五人定為死刑，二百五十人判做長期拘禁。全國教會頓呈無政府狀態。教會中大部份的人，尤其在饑荒的區域內，都起來反對教長的地位。那些本來很忠心於上面教權的祭司和主教心中覺得非常悲痛，有幾個胆量很大的，竟敢公然批評教長的主見。後來在列寧格勒地方有一羣思想自由的教士，在吠登斯基 (Vedensky) 柏爾考夫 (Belkoff) 和其他的祭司領導之下，就此首先發動。他們聞得教長已被禁錮並且在莫斯科地方已有許多祭司爲了抗令而定爲死刑；於是大家就跑到莫斯科，那邊維新派的祭司克拉斯尼次基 (Krasnizky) 和主教安多寧 (Antonine) 先加入了他們的運動。在五月十二日，就是在槍決莫斯科祭司的前一天，他們來到教長面前規勸他，並且說他對於教會中這種恐怖的和無政府的狀態應負一大半的責任，至於近年來教會中所有全部的反革命的策略都和他的名字相關的。

他們歷數他的過失：如同他呪詛多數派的公函；他反抗政教分離和教產國有的法令的通告——據克拉斯尼次基說，爲了這個通告全國發生了一千零十五次的暴動事件；他差遣主教澤莫根（Germogen）到業卡忒麟堡（Ekaterinburg）去獻給前俄皇一塊特別祝福的聖餅的事情；他濫封那些帝制派爲主教的行動；以及他普通對於蘇維埃政府所取的仇視態度。他們總結說，這些舉動最好先使教長退位，等到召集全體大會後，再把教務交給別個主教。這種勸告的結果就使教長寫了一封信給雅洛斯拉甫（Yaroslav）的總主教阿加芬格爾（Agafengel），請他接替教長的職務，又派克拉斯尼次基和另外一個教徒帶這封信前去勸駕。他然後和他的侍徒者退居在莫斯科邊界上的頓斯考修道院（Donskoy Monastery）中受政府的監視。

克拉斯尼次基查得總主教阿加芬格爾不能即刻到任，並且後來又聽說他已被政府拘禁了。因此，教會中弄得沒有首領。所以吠登斯基，柏爾考夫和卡里諾夫

斯基 (Kalinovsky) 就寫信給教長說：

「閣下雖然已經離開教會的政治，直指望召集全體大會，將所有職權交付年長的主教；但是教會現今並無主管人員。這種情景使教會的生命很受損害，尤其在莫斯科地方，人心非常混亂。我們在信後簽名的人已經請求官廳准許開放閣下的聖職。所以我們忠懇的請求閣下爲此祝福。好使這種妨礙教會行政方面的拘捕不致繼續下去；閣下的接替人一到，即刻就可行施他的職權。如今我們將邀請在莫斯科地方行動自由的人暫行代理教務，直等到後來在閣下的接替人領導之下組成一個行政機關爲止。」

教長在這張信紙上寫了下面的決議：

「以上簽名的人可將聖議會與教長的事務移交最尊敬的雅洛斯拉甫總主教阿加芬格爾並使秘書紐美洛夫 (Nimerov) 與他共事，關於莫斯科教區內的行政事宜可交給最尊敬的克林 (Kin) 主教英諾森細阿 (Innocentius)，在他未到

之前，暫交最尊敬的味寧斯克（Verninsk）主教李奧泥德（Leonid）管理並使幹事尼甫斯基（A. D. Nevsky）與他共事。一九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因為阿加芬格爾總主教和英諾森細河主教都不能到莫斯科去，所以只存下李奧泥德主教在那裏管理教會。那個久被排斥的維新派主教安多寧也住在莫斯科地方。現在他被改進派的祭司所邀請，就回復了他的職務。其實他變做教會中真正的領袖；因為李奧泥德主教年歲太高，無力作事，所以他也願意託付那些勇往直前的青年祭司領導教會的事業。

他們受了初步成功的鼓勵又想盡量利用他們的時機，所以就豫備了一篇告民衆書在報章上披露出來，以表明教會中這種前進的教士所有的思想。牠裏面說：

『在基督裏的兄弟姊妹們！

『近年以來，照着上帝的旨意——世界上沒有他的旨意就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在俄羅斯地方產生了一個勞農政府。

「牠的使命就是要在俄羅斯境內除去世界戰爭中可怕的结果，並且要和國家生活中的饑荒，瘟疫，與其他不自然的狀態奮鬥。

「在這種爲人類求真理與幸福的戰爭中，教會實在站在旁觀的地位。

「這些上級的主教已經加入了民衆的仇敵方面。

「這就可表示教會要取得各種機會來從事反革命的運動。

「這種事情不止發生了一次。現今在我們眼前遇見了這樁關於變賣教會的寶物以充饑民的麵包的嚴重事件。這事應當引起教會爲將死的兄弟們做一種快樂的慈愛的服務；但是牠却變成一個有組織的反抗政府權力的機關。

「這就演成了流血的慘劇。流了血就可不必幫助災民了。

「那些教士既然拒絕了救濟饑民的工作，又想達到推翻政府的目的。教長替康的佈告書被這些聚集在他四圍穿了教會的長袍和裝着教會的熱情者奉爲反革命的標準。人民在良心上總要懲罰那些流了血的罪犯。人民在饑荒中的死亡却使那

些要利用國家的災荒來達到他們政治目的的人受着一種極重大的譴責。

『我們這些在下面署名的牧師，要代表正宗派教會中大部份的信徒責罰那些主教和牧師所有違抗政府的行動；如同反對政府賑災的工作以及別種爲勞働界謀幸福的事業。』

『教會的本性應當是一種愛和真理的結合，不該變爲一個政治的組織或是一種反革命的黨派。』

『我們以爲急需召集一個代表各區域的大會，以審判那些破壞教會的罪人，並且解決教會的管理問題以及建設教會與蘇維埃政府間通常的關係。教會中上級主教所領導的反對政府的戰爭必須終止。』

這篇從教會中有勢力的教士所發表出來的宣言是要與政府媾和合作，並且要赤露露的譴責教會對於蘇維埃政府的舊政策；因此，就使教會反對革命和蘇維埃政府的戰爭得了一個轉機。教會已經有五年的工夫很強固的站在反對革命政府與

新社會秩序的地位，並且用各種方法來抵抗政府與接濟牠的仇敵。教會可說是革命的勁敵，而且也是最後屈服的。但是牠的前線一朝破裂以後，那末牠必然要投降了。那些教會中的叛徒終究不肯跟從他們的領袖，却把教會的降書獻給革命的面前。他們自然要爲這班失敗的教會領袖所恨惡，被他們當作叛教者與多數派，或是稱爲『赤化』的祭司。

這種前進的教士反對教長的政策佈告書在教士中間即刻起了響應，尤其是鄉村裏這些幾世紀以來受着那些主教的高壓手段的教士。在教會裏面。到處地方都發生一種真正的反抗運動。這班從來無權組織與參加教會的中央行政事業的教士。現在就開始組織起來。這種反抗運動的主動者就是那些進步的祭司。他們現在佔居了教長所放手的教會中主要的行政機關。這個團體決意要用他的權力來實施幾種改良的事業。牠拿一個『活的教會』做牠的標語，並且開始用這種名字發行一種刊物，以鼓動民衆。牠又把這些白衣教士組成一個團體，也稱爲『活的教

會」，其中主要的領袖就是列寧格勒的祭司克拉斯尼次基。牠的最初的憲章（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議定的）說到牠的目的就是要「保障正宗派教區內教士的自由權，使他們得以執行牧師的職務，不致再依賴社會中經濟的統治階級。

「爲了要達到這個目的起見，這個團體應當要用組織的行動在將來的全體大會中爲白衣教士求得下面的權利：

「（1）有權佔居主教的職位。

「（2）有權參與教會的最高行政機關中的活動事業並且在教區的行政方面與主教站在同等地位。

（3）有權參與分配教會的款項；至于這些款項應當聯合成功一個單獨的教區財政部。

（4）有權組織一個白衣教士的團體，以實現他們的權利。」

我們看出在這個時期『活的教會』的組織不過是一種教士工會，其目的要增進教士的權利與經濟上的幸福。牠知道牠的仇敵就是在於修道院的教規，所以牠要求白衣的或是成婚的教士也能合格做主教的權利。若使我們記得這班白衣教士在幾世紀以來所受修道院中高等教士的制服與教會中黑衣主教的壓迫；那末，這種反抗運動是不難明白的。況且那時大多數的主教都很贊助各種反革命的運動——無論是由主教，或是白軍，或是外國的侵略者所發動的——其結果總是使教區中的一般教士受着很大的損害。這就使他們更加熱心于要求脫離他們教政上的專制魔王。

這種『活的教會』團體也怕一種反動。牠知道舊的修道士與主教決不肯無抵抗的拋棄他們的特權，並且爭鬥臨到的記號已經就在手頭了。彼得格勒的總主教便雅憫（Benjamin）已經把改進黨教士的領袖擠出教會。吠登斯基與克拉斯尼次基也在其內。這些守舊派也組織種種示威運動來反對他們，他們又被稱為叛教

者與多數派。幸喜在年老的主教當中也有幾個表同情于『活的教會』，而且這些人在召集全體大會之前已經允許創設一種白衣的，就是成婚的，主教政治。在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大主教李奧泥德與安多寧封莫斯科的祭司產塞夫（John Chancer）和彼得格勒的祭司阿爾賓斯基（John Albinsky）為最初的白衣主教。因此，就把俄羅斯一千多年來黑衣主教的制度完全打破。別的白衣主教也即刻受封。所以這些改進黨覺得他們現在就能發動一種『清教』的工作，就是要拿更加忠實的領袖來調換這些反動派的主教。在一九二二年八月裏，『活的教會』開第一次大會的時候，因為已經有二十多個教士告退了，所以在九十七個教區內的主教裏面有三十七個已經接受了『活的教會』的政策，三十六個表示反對，二十四個沒有決定。於是這個會議就議決辭退那些反對活的教會改良政策的主教，並叫這些沒有決定的也選擇一邊。

這種進步的正宗派教士的第一次會議在一九二二年八月六日召集于莫斯科地

方當然是歷史上一件很重要的大事。俄國正宗派教會在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從來沒有召集過這樣的一個會議。那時到會的代表一共有一百五十個祭司，是從蘇維埃共和國的各方面派來的。這些人大半都從未互相見面過，也未通信過，但是他們共同的苦痛與希望已足使他們團結一致，進行教會中行政方面的各種改良事業。大會中的主席就是列寧格勒的祭司克拉斯尼次基。他把這個會議當做革命的教會運動中第二個時期。他說：

「第一個時期就是起于本年的五月十二日，那天有一小部份的改進黨的祭司跑到教長面前，說他是一個陳腐政治的附和人與破壞教會的主要負責者，所以要求他把他的職權移交改進黨的教士團體。他就簽名在他的退職書上，並且把他的權柄移交最高教會行政部。現在的會議就是走向教會中革命道路的第二步。我們在這個時期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拿從白衣的勞働教士階級中出來的一種新進的主教代替老朽的反動的寺院裏的主教。……第二步工作，就是要把平信徒引進到

教會的行政方面；但是祇有這些勞苦的人，並非那些剝奪者與壓迫者。『大會中對於這些政策都沒有異議，並且這種『清教』工作也實施得很是周密。所以在開全體大會的時候，照教長替康所說的話看來，在他的舊主教中只存了十五個來參加全體大會。其實有八十個舊主教已經被斥革了。

他們在擴清反動份子的當兒，一方面也竭力的宣傳『活的教會』的主義，並且組織『活的教會聯合會』以教導民衆迫切的改良計劃而預備將來選舉代表參加全體大會的根據。所以這些改進黨教士的第一種運動是要控制中央的與各區的教會機關，並且排斥那些反動的領袖，——因為他們使政府方面對於教會失掉信仰並且使各區的教士階級受了許多痛苦。這些改良事業是關於教會制度的與國家政治的，並非是關於宗教的。但是在教會裏面也潛伏着宗教的勢力，直到現在都沒有機會發表出來。宗教的改良家已經被強迫緘默或是被趕出教會。他們或是加入非教會的知識階級，或是在各種異派的團體中活動。但是這些不從國教的宗派難

以滿足他們，因為牠們缺少正宗派教會中所有美術觀念的神秘主義與禮拜儀式中的高深精神。

在活的教會運動中最有思想的倡導者希望一切的改良事業——關於教政的與宗教的——都要在教會脫出了政治並且與政府講和以後纔能實現的。衆人都指望召集全體大會以解決這些問題，並且這些呼聲也一天高似一天了。

第七章 一九二三年的大會與東正教會的分裂

經過將近一年的擴清教會的行政機關，組織教士的團體，與鼓吹改良的事業以後，這班新領袖就想可以安全的依照教會的法典發佈召集全體大會的通告書。這實在大半已經爲這些改良家的革命活動所成就了。

全體大會中選舉代表的規則在原則上和一九一七年的大會相同的。各鄉區至少選出兩個平信徒代表，但不得超過本區內教士的數目。鄉區中的教士與平信徒

代表就可參加縣區會議。在這個會議中選出兩個平信徒與三個教士去參加教區會議，再由這個會議中選派兩個平信徒代表與兩個教士代表到全體大會裏去。至于教區中的主教是大會中當然的會員。除了這些選派的代表以外，最高教會行政部的一切部員都是大會中的當然會員。這個行政部也有權另外邀請二十五人參加大會，與當選的代表站在同等地位。

「一個小的組織是一種希奇的东西。」這句話的真理已經在活的教會運動裏完全證實了，因為在大多數的教區中都有活的教會的組織，所以很容易把牠的候選員都通過了。這些守舊派既已被「清教運動」所分散，就毫無能力，並且他們的候選員也不能得到大多數的贊同。只有在那些守舊派的勢力很強固的地方，特別在莫斯科的教區中，他們纔能勝過這些改良派。從大體上說來，這些改良派在全體大會中可以很安全的佔居大多數並且很容易實行他們的計劃。

常常有人發問說：「若使在選舉的時候守舊派的反對既然這樣沒有用處，那

末這個大會算爲合法麼？」這些改良派所有唯一的回答就是說，在俄國一切別的選舉會中（政府的與教會的，）這些急進派所受着的阻礙更要厲害。一九一七年的大會是爲寺院的主教與貴族所控制，因爲他們能管理教會的組織而對於鄉區中的教士不大加以考慮。一九二三年的大會完全相反，是爲歷來一般被壓迫的教士與平信徒所管理；所以比以前的大會更能代表教會的意見。但是這一點不能使改良派所有公然的專斷態度得到諒解。於是他們失去了許多的朋友與同情者，以致引起將來的反動。

這個大會的開幕禮是四月二十九日在基督教主堂裏面舉行的。牠的景况沒有像前次的大會那樣華麗。總主教安多寧宣讀最高教會行政部的訓辭，並且把大會的要點都說了出來。這種要點就是要使革命所創造的新社會秩序成聖。在訓辭裏說：「我們的祖國已經在新的原理上完成了一種生活改造的工作。……這種改變是從來所缺少的，並且直等到現在從內心的信仰中得了恩典的福分纔能發生出

來的。』教會對於革命的政府經過了五年的詛逐與反抗以後，如今藉着這個大會寫一封公文給蘇維埃政府。在這封信裏牠感謝政府給教會聚集大會的機會並且表示牠欽佩這種政教分離法令的意思。牠看這種法令含有『一個尊貴的動機使教會得到一種自動力，就是能夠在宗教的環境中得到一種心靈的自由，並且能夠免除警察的義務與政治的關係。這個年老的總主教在大會的訓辭裏終結說：『現在時機已到，我們的教會必須表示牠對於國民革命與牠勞力的基本目的所有主要的關係，並且教會也當用基督的同情心來祝福革命的事業，又把從宗教方面得來的道德勢力引導到革命的潮流中去。』

在大會的來賓所講的祝詞中，我們必須要注意布未克主教（Bishop Edgar Blake）的言論。他是和波士頓（Boston）^{Providence}聖教公報（Zion's Herald）的記者哈特曼博士（Dr. L. O. Hartman）同來參與大會的，他是代表美國監理會的主教團並且帶了一封信來祝賀俄羅斯正宗派教會的。

這位主教的人格與他所帶來的祝詞使大會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因為這是歷史上東正教會對於西方基督教會改變了政策的一種紀念。在一九二三年的大會以前，俄羅斯教會對於基督教取一種絕對排斥的態度，而且有時站在反對的地位。基督教青年會與東正教會在合作事工方面的努力已經得了些成功，尤其在大戰時代軍隊的服務方面。英國的聖公會^{〔英〕}在過去的時候也屢次要和東正教會聯絡友誼，然而在俄羅斯教會的歷史上像布未克主教這樣的一個著名的耶穌教代表能夠為全體大會中的代表一致歡迎，尊為上賓的舉動，却是破題兒第一遭。

這種的參加發生有利的和永久的影響。從此以後，東正教常常不斷的和西方^{〔美〕}的，尤其是美國的耶穌教互相接觸，並且可以發展到更大的友誼上的合作，使歷來所希望的基督教統一的道路得以築平。至于這種合作所以不能發展得很快的緣故，乃是由于西方教會的過失；因為他們假裝着對於東正教會內部的爭鬥抱嚴守中立的態度——但是大概是為了政治的關係，——很拘束的不敢與俄國的東正教

會來往。

一九二三年的大會確是在非常的情勢底下召集的。一個人可以當牠是教會與革命政府的一種和平會議。一個人也可說牠是教會中的維爾賽（Versailles）。在那裏戰勝的革命說出議和的條件來，容納和准許教會能夠繼續存在下去。其中主要的條件就是教會必須拋棄君主政治的制度，變成一種共和政治的形式。第二個條件就是教會必須與反革命運動斷絕關係，並且斥革各個政治上犯罪的主教，政府對於教會獨斷的或是宗教的利益並不干涉；但是對於這些政治上的見解，牠是不能妥協的。

這個大會很願意接受這些條件，甚至能夠更進一步。牠對於政府確切的表示牠的一致同情與忠實，宣稱資本主義是一種極大的罪惡，說明社會革命是很正當的。這樣牠就取消了前次大會對於政府的咒詛，並且承認了政教分離與教產國有的法令，甚至對於那些限制教士與教會公民權的規定牠也承認。

大會在五月三日的會議中把教會與革命政府中間的和平條件制定在教會的法典裏。所以在教會的歷史上從此開了一個新紀元。

因為教長既在監禁中，所以大會的領袖並不想到必須按照教會法典的規定要三次召集被控告者來受審判。然而這種缺席判決的行動在教會中也有前例可援：譬如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會在審判班薩（Penza）地方的大主教普鐵阿達（V. Putyata）的時候，也不召他到庭——雖然他可以到庭的——就定他的罪案。

大會裏五月三日的議事日程就是：「正宗派教會，社會革命，蘇維埃政府，與教長替康。」那日教父吠登斯基與克拉斯尼次基用令人感動的言辭來作數小時的報告，就是講到正宗派教會在歷史上的發展，一直到末了就發生這種危急的時期。經過斥責教會在革命以前所有反社會的活動與教長所有反革命的活動以後，大會就接受了下面的議決案，反對的只有一票，不投票的只有五個代表。這個決

議案就是說：

「聽了大祭司吠登斯基與大祭司克拉斯尼欠基的報告以後，全俄正宗派教會代表大會在教會與衆人的面前作見證說，現今的全世界是分成兩個階級：就是資本主義的掠奪者與無產者——資本主義世界的幸福都建築在他們的勞力與汗血上。在全世界中只有俄羅斯的蘇維埃政府已經冒著險與這種社會的罪惡交戰。基督徒在這種爭鬥中是不能袖手旁觀的。本會宣佈資本主義如同極大的罪惡，並且撲滅牠是基督徒一種神聖的天職。本會在蘇維埃的能力中看出一個爲國際間謀友誼，平等，與和平的世界領袖。本會要斥責國際的與國家的反革命運動，並且要用牠一切宗教的與道德的威權來定牠們的罪。

「本會要召集俄羅斯各個誠實的基督徒國民在蘇維埃政府領導之下，站在聯合的戰線上，向前撲滅世界上社會不公道的罪惡。

「一九二三年的正宗派教會的神聖大會對於教會在革命時期中的地位詳加討

論以後，就議決：

「（1）自從一九一七年的夏季以來，教會中負責的領袖採取一種確定的反革命見解。『教會必須重建統一的俄羅斯帝國。』在這個口號之下教會——牠以前曾經做過俄皇的工具——就開始牠獨立的生活。一九一七年的大會中的代表大半都是反動派的教士，也有上等的貴族，地主，和反動政黨的黨員，所以從起初的時候牠就變成一種政治上反革命的會議，假借救主基督的名義，以作種種反革命的行動。這個大會就與革命抗爭，牠甚至不承認臨時政府，到了十月以後，這種戰爭已經達到非常緊張的狀態。」

「在這個大會以後，教員替康繼續反革命的活動。他變成蘇維埃政府的一切仇敵的領袖和模範。他把教會捲入反革命的潮流中。」

「一九二三年的正宗派教會的神聖大會要譴責這種反革命的戰爭以及牠的方法——就是人類互相爲仇的方法。一九二三年的大會對於蘇維埃政府和一切承認

牠的人所受教會的咒詛尤其要表示歉意。本會就宣佈這些咒詛一概作爲無效。

「(2) 一九二三年的大會要懲責一切走向這條反革命道路以及引導別人跟隨他們的人。這大概說到這個負責教會全部生命責任的領袖——就是教長替康；因爲他不忠心服事基督，却服事反革命。他本該正確的指導教會全部的生命，却反率領教會的衆信徒走入歧途。所以本會認替康爲一個違悖基督真正的誠命的反教者與教會中一個叛教徒；因此根據教會的法典，剝奪他教長的職權，使他回復到原來平信徒的地位。

「(3) 教會改良運動的領袖已經與反革命完全斷絕關係，並且爲了這個緣故，他們遭受反動派教士的仇視。

「一九二三年的神聖大會宣佈這些咒詛他們的條例一概作廢。本會反要爲這些人的勇氣與他們對於教會的熱忱祝福，因爲這種勇氣和熱忱是從反革命的手中奪下來而歸給唯一的救主基督。

「(4) 這個神聖的大會要請求衆教徒拋棄他們利用教會來求得世界上政治利益的各種努力。在教會裏應當沒有反革命存在的餘地。蘇維埃的權力並不是教會的一個逼迫者。蘇維埃政府的憲法規定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權。這種政教分離的法令可以保障這種自由權。宣傳宗教的自由(與反宗教的宣傳站在同等地位)可以使信徒有機會辯護他們純粹的宗教信仰的價值。所以教徒不必看蘇維埃政府是一種反基督的權力。本會却反要請大家注意這種事實，就是蘇維埃政府乃要用國家的政策來實現天國的理想的一權力。因此各個信徒非但應當做一個忠實的國民，並且也要用各種方法來和蘇維埃政府合作，好使天國的理想實現于地上。

「(5) 本會在責罰前任教長不做教會的領袖，却爲反革命的領袖的時候，也承認教長政治的重組是一種確定的政治上反革命的行動。古代的教會並沒有教長的制度，却是共同管理的。所以這個神聖的大會也要革除教長的政治。從今以後，教會必須要爲一個大會所管理。

「（6）這個大會爲了斥責教會中的反革命，懲罰牠的領袖，革除各種教長政治的機關以承認政府的權力起見，就想教會的和平生活創設一種平常的狀態。從今以後，教會的生命必須建築在兩種原則上：（甲）關於上帝方面，要根據教徒對於救主基督真正的誠命所有真切的虔信；（乙）關於政府方面，要根據政教分離的原則。」

「教會根據這兩種原則就變成牠本來的面目——就是一種由信徒在上帝，基督，與真理裏面互相用愛心來共同結合的團體。」

大會的領袖以爲通過了這條議案，已經能使教會斷絕牠以前不榮耀的歷史，並且可以爲將來開闢一條更加光明的道路。這都要全靠新的領袖，尤其主教團體方面。但是衆人都知道這些修道院不能再供給這樣的領袖了。有幾個修道院還是存在，可是大半都被革命的潮流沖破了。況且這些舊的僧院中的主教已經失掉信用。所以唯一正當的和安全的方法似乎只有從白衣教士中選擇主教並且使他們

都由人民自己選舉出來。我們已經看到這班改良派的領袖在他們取得教會的行政權以後，曾經採取過這種舉動，如今大會就核准了這種習慣並且放在教會法典裏面，差不多也沒有人反對這種規定。

關於這種計劃方面，大會又准許鰥獨的或是離婚的祭司可以再娶。

採取新的（格列高里的 Gregorian）日曆的決議案是一種延遲的改良事業。但是這種改良引起人民極大的反對，尤其在農民方面。因為他們都拿舊的教會日曆來規定各個時節的工作。

末了，這個大會說明寺院中的聖骨能夠敬拜到什麼程度，並且這些修道院在何種情勢底下纔能繼續存在，這一切的計劃幾乎都一致通過的，所以可以證明這些守舊派歷來反對這些改良事業的阻力已經完全沒有了。

但是這個大會不敢再進一步的發起關於教會的禮節或是道理方面的改良。關於這樣的一切提議都交給委員會審查，並且建議各處教會再加以研究與討論。爲

了預備教會中的新領袖與教士起見，這個大會建議在教會的可能範圍內把舊時的神學院從新開設起來，並且使牠們的教育計劃都適應於教會中新的需要與問題。

在五月八日那天，大會在未散會以前選出十八個委員組成「最高教會行政委員會」以管理教會，直到下屆的全體大會。在這個行政委員會中三派的代表都按照牠們的勢力分配的。活教會派得到十個位置，舊使徒派（Old Apostolic）取得六個位置，其餘兩個位置是屬於重生合一派（Union of Regeneration）。一九二三年的大會是俄羅斯教會歷史中最值得紀念的，牠的決議案影響于教會的統一並且使牠分派。這種分裂景象起初似乎是一種大的禍患，但到後來却可以證明對於教會是很有利益的。

這種與革命政府講和並且承認社會革命的正義的決議也得到了有利的影響。現在正宗派教會不再被人稱為政府的仇敵。凡是有意識的教士，無論他是屬於那一派的，沒有一個願意回復到一九二三年大會以前的戰爭狀態，這種教會的統一

確是做了和平的代價；但是在大會以前，這種統一完全因着犧牲了教會的活動力而維持的，這種白衣的成婚的主教是由人民自己從賢能牧師中選舉出來的，現在却已表顯他的價值，並且使教會得到一種新的領袖。一九二三年的大會當然免不了人家的批評；因為牠對於廢棄舊領袖方面有一種粗莽的態度，在審判失敗的教長方面缺少一種法定的手續，並且大概因為牠對於從前的領袖都沒有表示同情心與禮貌。這也許都是對的，然而我們不能否認這個大會是合法的，並且牠的決議無論好壞，都和教會以前任何大會中的決議案有同樣法律的價值，所以祇能在下屆的大會中取消，決不能憑一個人或一羣人的意志而就作廢的。在這一點上，前任教長就弄錯了；因為他要禁止大會的決議案，却不把他的案件訴諸新的大會。

大會的這些決議案後來發生很有趣的事情，未了就使教會裏發生一種破裂。教長替康的許多朋友與顧問覺得大會對待他很不公道，因為他對於國家中共產黨領袖所取的仇視態度大多數的教徒都是有分的，所以他實在好像教會中一個吃苦

的殉道者。這種感覺在莫斯科地方的教會最為強烈，因為管理這些教會的人民大概都受過革命的苦楚，所以他們自己不能和他們的失敗與恥辱調和起來。這班人民恨改良派的領袖做了他們的奸細，並且罵他們為異端者與多數派的經紀人。

這些人同時也明白他們既然失敗了，那就不得不和勝利的仇敵講和。這或者就是他們歡迎教長的恢復自由行動的理由，甚至拿他忽然的悔過書來作代價，也所不恥的。這種悔過書也許是教會從前的顧問與侍從者建議于他的。

前任教長的悔過書，無論他的動舉怎樣，總是要使全世界與教會中改良派的領袖都發生一種驚訝。這封悔過書的內容就是說：

『爲了上訴于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的最高法庭，我認爲下面所說的話是出于我做牧師的天良：

『我因爲生長於一個帝制的社會中，並且在我被拘禁以前一直受著反蘇維埃者的影響，所以我對子蘇維埃的權力確抱一種仇視的態度。這種仇視態度有時要

從消極方面變成積極的行動，如同關於一九一八年布勒斯特（Brzesk）的議和，同年對於政府的咒詛，與最後在一九二二年反對移取教會珍物的命令的各種佈告書。我的一切反蘇維埃的行動，除了幾種很小的過失以外，都可總括在最高法院的控告辭裏。因為我承認法庭按照刑法的條文治我反革命罪的判決是很對的，所以我要悔改我這些反抗政府命令的過犯，並且要請求最高法院解除我的隔離，就是使我恢復自由。

『同時我也要對於最高法院表明我從今以後決不再做蘇維埃權力的仇敵。我要永遠的和確定的拒絕國外與國內的帝制派白軍的反革命。』

（簽名）教長替康（發西理貝拉芬）（Vassily Belavin）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六日。』

這些改良運動的領袖希望替康在政府面前悔過以後，對於教會也要表示一種同樣的歉意，因為教會爲了他政治上的過失受了極大的損失。有不少的人跟從他

那些恰正在政府面前承罪的佈告書已經喪失了他們的生命與自由。然而他總不願意這樣做。在他被釋放的那一天（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有幾個報館的代表去訪問他。他對他們說：『這個大會已經定我反革命的罪，但是牠決不能如此做的。只有蘇維埃政府能够審問我反革命的罪，並且牠將要審判我了。』

『除此以外，依照使徒的教規，若使要審問一個主教，必須要差三個主教去召他三次。只有經過三次拒絕到庭以後，法庭纔有權把牠缺席判決。這個大會從沒有通知我要討論我的活動。』

他這種不肯順服大會的統治權，或是甚至不願意按照教會的法典上訴他的案情，當然要使教會分裂了。莫斯科地方的教會開始附從牠們前任的教長。教會中舊時的反動份子又開始在他四週圍聚集攏來，發起一種誹謗的運動，以反對改良派的領袖與一九二三年的大會。從前改良派對待這許多舊主教的專斷態度現在都被用來反對他們了。

教會中的改良派在採行新曆方面的努力很惹起鄉村教徒的反抗。替康派也很能利用農民方面反對新曆的時機。前任的教長雖然歡迎教會日曆的改良，並且大會的改良計劃中只有這一種是他所認可的；可是他即刻對於這個問題改變了他的態度，就此宣佈教會的舊曆仍然有效，以博得農民的贊助。

在這兩派當中就發生了一種激烈的爭論。替康派稱他們自己為舊教民並且斥責任何改良事工為異端與投機。這些改良派迫不得已，只好讓步，尤其在改曆問題方面。現在這個問題是留給各地方的教會自己去決定究竟採用舊曆或是新曆，所以這些改良派的城市教會大概趨向新的日曆，同時鄉村的教會堅持舊的日曆。

復次，改良運動中的各種派別也要使普通教徒的心中覺得混亂，有些人以為『活的教會』『舊的使徒，』與『重生』的黨派是各不相同的教派。這些團體中間所有互相反對的主見更加引起糾紛。至于替康派的宣傳，更使人莫名其妙了。

改良派中間的異見就使老主教安多寧離開他在最高教會行政委員會裏的主席

地位，並且把這班跟從他的人組成一個自主的教會。

這班改良派決定召敖得薩地方的總主教攸多琴（Eudokim）——他從前曾經做過北美東正教會大主教——來補充主席的空缺。這位主教雖是一個僧侶出身，却算是一個改進黨，並且也是老主教中最先加入活的教會運動的一個人。他能允許來做教會的領袖，但有三個條件，就是：（1）各種教會的黨派必須解散牠們的團體，放棄牠們的名義；（2）這個最高教會行政委員會應當改稱為聖議會；（3）最好多封修道士為主教，以抵制替康派的宣傳。在一九二三年八月初頭全體大會的會員開了一次聯席的會議。他們大家聚集攏來，討論教會的局勢。活的教會派的領袖克拉斯尼次基反對取消他的組織。但是他的團體中大多數的人都不贊助他。吠登斯基，他在大會後佔居了主教的地位，因此拋棄了他以前許多激烈的思想，現在却贊成解散他的團體。這個聯席會議經過幾天熱烈的討論以後，就決定贊成總主教攸多琴的計劃。他宣佈一切教會的團體與黨派都應當解散，把

最高教會行政委員會改稱爲『正宗派俄羅斯教會的聖議會，』選舉總主教彼多琴爲議長，並且決定召集有幾個未曾回到替康的大本營裏去的老主教加入聖議會。這種溫和派勝利的結果使克拉斯尼次基和他少數的活的教會派退出聖議會，並且從此保守一種獨立的地位，以反對聖議會。

這種聯席會議可說是對於急進的一九二三年的大會反動的起點。教會的心裏總不贊成任何的革新事業，並且爲了要調解這些情感，這種保守主義却在聖議會的改良派與替康的中間發生了一種奇特的對敵。那時有一種特別的獎金是贈給年紀最長的主教的，並且這個聖議會誇稱牠裏面有一個年代最久的老主教。

這個聖議會發表了一篇告全體正宗派教徒書。在這種佈告書裏面批評前任教長的分派行動並且請求和平與統一：

『爲了顧及你所受的痛苦並且要謀教會的和平與統一起見，你的最老的主教與牧師要在這個重要的時期擔負著神聖的工作，使上帝的教會脫離擾亂的深坑與

人類的私慾。我們宣佈從今以後，教會行政方面的最高機關不是最高教會行政委員會，却是正宗派俄羅斯教會的聖議會。我們宣佈在教會中不應當有各種名目不同的團體，黨派與組織，但只有獨一的改組的神聖大會與使徒的正宗派教會。我們與東方最神聖的教長團結一體，他們的代表已經正式來拜會過聖議會的議長。這不是因為他們爲了前任會長釋放後而來謁見的。我們將在一種與最神聖的東方教長的友誼結合中引導我們神聖的東正教。我們所站的地位是要承認教會生活中必須的改良事業，並且種種爲我們從前最好的最老的主教，教授，與神學家在大會預備會議中所指出的，以及一九一七年與一九二三年的大會中所創立的改良事業。我們已經很嚴格的，堅決的，和穩固的保守並且將要畢生保守正宗派信仰的道理上的純潔。」

他們希望這種舊名目（聖議會），舊人物，與舊思想的表彰可以使民衆附從聖議會；因此可以強迫這些替康派來向牠求和。但是這種事情並不發生。那些歡

喜陳舊與頑固的人在替康的教派裏面可以完全滿足了他們的願望；所以結果就是教會在攸多琴領導底下的時期並不達到牠所期望的統一景象，却反使許多進步派與改良派分離與失望。

第八章 東正教會在統一方面的奮鬥

時間會醫治各樣東西。牠也會醫治俄羅斯教會內的分裂情形。因為這種分裂的真正原因終究不是在宗教方面或是道理方面；牠們却是屬於政治方面與社會方面的。這種奮鬥的性質大概與俄國革命的全部進程是相同的。這是帝制思想與共和思想中間的一種衝突。這種爭鬥的一方面是殘餘的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他方面就是農民與無產階級的專政。當社會革命把舊時的封建制度與資產階級的勢力掃蕩以後，這些失敗的領袖就藏匿在教會裏，以十字架作他們的護身符。所以要攻擊他們的壁壘必須要向教會與宗教進攻。但這是革命政府所不願爲的。這種態

度不是因為懼怕資本主義世界方面的批評。政府很知道牠這樣的方法使牠的階級仇敵不能快意，因為世界上的資產階級如果要想再作一次武力的干涉，牠就可找到機會並且製造許多殘暴的新聞，如同婦女的公有與宗教的逼迫等等，辯護牠的干涉政策。

革命政府很留心牠和教會裏的反革命爭鬥，因為牠不願意觸犯大多數的農民與城市中的無產階級——雖然經過了極端的反宗教宣傳，他們還是要依附教會。那時政府也覺得教會中反革命的精神祇能用教會裏面的革命份子來驅除的。爲了這個緣故，牠就給教會中改良的團體一種自由行動，並且同時在前任的教長釋放以後，就阻止他組織一個教會的中央政府。這些多數派當然看教會中的半無政府狀態與內部意見的分歧是阻止教會活動並使牠失却能力的最安全方法。那些有知識的教徒很明瞭這點；因爲他們批評的觀念總不會被階級的仇恨與成見所蒙蔽，並且他們也把教會的利益放在他們的政治和社會的志向上面。

前任的教長也知道這事，尤其在他的憤怒平息以後，他對於教會的分裂情形就看得很清楚了。他想找一條出路。他就請求政府的當局准許他召集一個大會，把教會中仍舊承認他爲領袖的那部份教徒組成一個政府。但是他很明白，若使他不和教會中著名反對革命很厲害的份子斷絕關係，並且使他左右的人都能爲政府所信託；那末政府決不會准許他組織一個中央的教會行政部，又召集一個大會來使他做一個合法的教會元首。有人建議他一個實際的解決辦法，就是他最好和活的教會團體的遺留者聯合起來，並且使克拉斯尼次基做牠行政部的副部長。

關於這件事情的公文有克拉斯尼次基所寫的一封信與教長的答覆。克拉斯尼次基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所寫的信中說：

「……………隨信附上一篇宣言是對正宗派白衣教士與平信徒團體——活的教會——裏面的會友而發的。我請求聖上接受我那些願意看我榜樣的弟兄們加入我們所慶祝的法定會議，又祝福我們爲重建教會和平的勞力以及爲下屆全體大會在聖

上所組織的教會行政部方面籌備，並且用你大牧師的愛心來包容我以前在教會改良運動時期中所犯的過失。」

教長接到了這封信，就寫了下面的決議說：「爲了教會的和平與幸福並且與教長的慈愛可以合一起見，我允許接受第一等長老六世克拉斯尼次基加入大會。我建議于聖議會討論能否包容他在現今正要組織的最高教會參事會的會員中。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過了幾天，這個決議案就被教長的議會中四個職員簽名贊同。

於是一個臨時的教會行政部確被組織起來，以籌備召集全體大會。這個行政部自稱爲「最高教會參事會」，是由十二個人組織而成的。其中有六個位置給活的教會的會友，並以克拉斯尼次基爲領袖，其餘六個位置由教長自己並由他委派五人担任。他們也組織一個上議院或稱爲「主教議會」，是由教長召集並以教長爲主席的。

這個最高教會參事會開了幾次會議，以討論召集大會的計劃。但是教會中的反動份子與教長以前的顧問方面所有的壓力非常強大。替康後來覺得仍舊和活的教會聯合下去，他就不能再得到教會中以前和他共患難的那部份人的贊助。若使這些守舊派拋棄他以後，那末他知道活的教會中的人也要這樣做的；因為他們並不是真心的歸附他，不過要利用他個人的名義來號召罷了。

但是這種全部的實事可以表明教長的威信是為教會中有力的守舊派用不自然的態度來維持的，因為這些守舊派要想各種方法來阻止革命的份子加入他們的大本營。替康似乎覺得他自己沒有能力，所以他的品性又要變動的。他就此宣佈和活的教會團體共同組織教會行政部的努力已經失敗。於是克拉斯尼次基和他的輔助者就都退出。各派中間的爭鬥又繼續發生了。

照實際上的結果看來，這種事情好像一個水泡。但在原則上說來，牠可表明一種很重要的事實，就是說有幾個替康派的領袖從前聲稱活的教會的異端乃是牠

們分裂的眞原因實在是沒有根據的。教長在接受受活的教會中的人加入他的團體的時候，並沒有要求他們懺悔，也沒有舉行正式的禮節。如果他認他們爲異端者，那就必經過懺悔的儀式了。

這些對敵的聖議會領袖起初對於這種事件好像有些驚慌的樣子，現在看見牠已經失敗，心裏非常快樂，並且要想利用這個時機，爲他們自己謀利益。他們解釋這種混合行政的組織是可以表示替康派與活的會教派方面的弱點，並且宣稱只有他們是合法的教會，能够握住教會政治的中心地位，所以全體的教會可以向著這種自然的中心點聯合起來。

在一九二四年的夏天所召集的全體大會預備會議中，有一部份的代表要想從新和教長談判，但也沒有結果。這個會議通過了一個議案說：『繼續與替康主義奮鬥，正如同勢不兩立的樣子，因爲與替康主義各種的妥協從政治與教制上的見解看來，同是很危險的。』這條決議案並不使這些統一的朋友們有所不安；但是

他們也知道教長一直不願意或是不能夠妥協，那是沒法可想的。

替康忽然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七日去世了。他的死，除了那些親近他的人以外都覺得出乎意料之外的。他的葬禮可以表示牠很得民心的，因為那時有好幾萬的人都跑到頓斯考修道院去送他的葬。

一個人自然要發生疑問說：「他有什麼功勞能使他這樣得民心呢？這不是靠他的口才，因為他從來沒有向公眾演說過，並且也沒有講過道。他可以稱爲『靜默的教長』，因為他只有在禮拜的時候宣讀些公禱文中的字句罷了。這不是靠他筆頭上的力量，因為他沒有留下一本書，也沒有寫過一篇文，除了有幾篇對於教會的佈告書雖然署了他的名字，但是大概是他的顧問寫的。他不是一個強有力的領袖或是一個殉教的烈士。在危急的時候，他的主張常常動搖不定，並且很容易爲他四周圍的人所影響。這一點他自己在他的悔過書中也說起過，大概是沒有疑問的。照我看來，有兩樣事情能使這位教長爲大眾所歡迎：在他的小團體中這是

因爲他的快樂與慈愛。我曾經熟識一個祭司。他在替康做雅洛斯拉甫大主教的時候充當了好幾年的頭等秘書。這位祭司告訴我，替康歡喜和他的祭司與主教陶情作樂，並且對於每個人都很仁慈的。他不歡喜閱讀長篇的報告與公文，並且他在辦公室中所批准的公文，大半都沒有讀過的。他在教會中很受同輩的主教與有勢力的教民所歡迎，因爲他是一個良善附衆的人。他從來不反對上級的主教並且是教政機關一種順服的工具。這就使他爲教長的候選員；雖然各人舉他的時候，都知道他是三個候選員中最軟弱的。

關於他自身的團體方面已經說了許多話，但是這班羣衆爲什麼要歡迎他呢？這當然是因爲一種通常的方法也可使一個凡庸的人變成一個豪傑。請思量年復一年的在好幾萬的教堂裏每次做禮拜的時候，他的名字和銜頭總要在最嚴肅的禱告中提起的！請設想他靜悄悄出來的時候，背後跟了一羣的主教與教士，身上穿了一件好像拜占庭皇帝模樣的長袍，頭上戴了一個特別的帽子——這種服裝除了他

自己以外別的侍從者都不能穿的。然後請記着好幾千人民從前都屬于上等階級，現在已經在革命中喪失了他們各樣的東西，只剩下一種狂妄的希望，就是要想全能的上帝用一種奇事來把可惡的多數派都趕走；於是教長，好像古昔的時候，從新可以使他們得到舊有的特權。末了，請思念有好幾百萬的人從前都希望經過革命以後就可得到一種千福年，現在却弄得生活艱難得很。他們在地上的灰心與失望就很容易產生神秘的希望，並且要看神秘的人。至于近年來的教長又不斷的暗示他們好像就是這樣一個神秘的人。

替康葬在頓斯考修道院中祭台的下面，實在可以表明俄羅斯教會中一個很短促而極悲慘的時期，他對於教會將來的管理問題留下一個遺囑。這個遺囑是由他最親密的同伴，就是克虜替次克（Krupnik）（莫斯科）地方的總主教彼得所代寫的。牠裏面說：

『若使我死了，我教長的權利與職務，在一個合法的新教長沒有選出以前，

可以臨時移交最尊敬的總主教息立爾（Cyril）。萬一他因故不能到任，那末教長的職權可以轉給最尊敬的總主教阿加蘇格爾。若使他又不能接任，那末教長的權利與職務可以移交最尊敬的克虜替次克的總主教彼得。

爲了要把我這個吩咐曉諭俄羅斯教會中一切的大牧師，教士與信徒們起見，我認爲我應當負責說明這個吩咐是要代替我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裏口頭上所說的吩咐。

「莫斯科與全俄的教長替康。」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于莫斯科頓斯考修道院。」

這個「遺囑」是不合憲法的，因爲一九一七年的大會已經規定，「若使教長死了，……他在聖議會與高級參事會中的位置應當由聖議會中年歲最高的主教代替，但是教長所兼任教區主教的職權，應移交柯郎那（Kolonna）與摩塞斯

克（Mozhaisk）的主教。』況且古代教會的法典也明明白白的禁止用遺囑來把主教的代理權轉給任何別的主教。

替康所以要採行這種教會的憲法上所未規定的事情的緣故，大概是因爲那時的聖議會與高級參事會在實際上都沒有存在。因爲他是自動的代理教會，所以他想他總有權委任他的繼任者。在舉行他的教禮的時候，有三十七個到場的主教都願意服從前任教長的「遺囑」。因爲遺囑裏所提起的三個總主教只有克虜替次克的彼得能夠到任，所以他就被認爲教長寶座的守護者，可以統治教會，或者更加確切的說來，他是繼續代理教長，因爲在教長生病的當兒或是以前的時候，他已經做了教會真正的執政者。

這位彼得坡力安斯基（Peter Polyansky）在革命時期（一九一九年）是做祭司的。他從前與俄皇的朝廷很接近的。他有好幾年功夫充當大公爵夫人依利沙伯的秘書。她是皇后的姊妹，也是被刺的大公爵塞澤阿斯的寡婦。至於這位大公

爵是俄皇的一個叔叔，也是莫斯科地方人民所痛恨的省長。這位大公爵夫人依利沙伯在莫斯科創設一個名叫「馬大馬利亞會」的婦女慈善會。她自己就是裏面的神母。那時彼得得充任馬大馬利亞會與聖議會兩方面的職員，並且也在教長替康底下的議會兼了一個職司。他被封了牧職以後，升任得很快。他在一九二〇年受封爲主教，並且代理教長在莫斯科教區中的主教職務。他後來就得了克虜替次克的總主教銜頭。他在這個地位上對於教會的行政方面與教長的人格方面發生了極大的影響。這就可說明爲什麼像他這樣的一個年輕主教能被破格的選爲繼任替康的候補員了，並且在教長死後，他就實際上做了教會的狄克推多。

恰正在替康死後一星期中總主教彼得又把教長在臨死的那一天（四月七日）所寫的一個遺囑公佈出來。這個「遺囑」好像一種宣言，乃要表示教長方面對於蘇維埃政府的忠實，並且熱烈的請求他的信從者拋棄他們反革命的希望。他根據于政教分離的法令稱贊政府對於宗教的容忍以後，就接着說：「在現在的時候，

信徒可以開始明白基督教的見解，就是說國家的命運是由上主決定的——並且要接受一切能表示上帝旨意的事情。祇要不違反我們的信仰與教會，不改變教會中任何的東西，總之一句話，祇要在我們的道理方面與我們內部的關係方面沒有什麼讓步；那末我們必須盡忠于蘇維埃的權力與蘇聯的事工，以謀大眾的利益。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政策適應于政府的新組織，並且要責罰與蘇維埃政府的仇敵發生任何的關係以及任何公開的或是秘密的反叛牠的行動。」然後他請求忠實的信徒和他一同爲工人與農民禱告，並且要請求各鄉區中不准有任何反政府的行動，也「不要希望帝制的恢復，却要自信蘇維埃的權力實在是人民的權力，所以是堅固的，不會動搖的，」等等。

這種「遺囑」同時也要對於政府宣佈教會中新元首的政策，並且要確定牠執行前教長「遺囑」的意思。有許多人疑惑這個「遺囑」是總主教彼得自己寫就了請替康在臨終前簽字的。他們的理由以爲這可使彼得更容易對付教會與政府方面

的問題。因為照教長一月裏的遺囑看來，彼得不過是教長職位的守護者，直等到將來的全體大會按照憲法選出一個新教長爲止。

在聖議會裏的改良派很歡迎這種「遺囑」，因為牠替他們在一九二三年的大會裏所做的各樣事情辯正；如同對於新的社會秩序表示忠實，而對於教會中的領袖所做的反革命運動定了罪。這個「遺囑」也要恫嚇那些主教，如果他們不服從教長的勸告並且拋棄他們反革命的活動，那末就被斥革。簡單說來，這些改良派以爲他們在一九二三年的地位完全得勝，因為現在的教長已經把牠完全批准了。他們自然的結論就是；如果他們對於在一九二三年中使教會分裂的大問題現在既沒有多大的異見，那末爲什麼還要繼續分派呢？爲什麼不再召集一個大會來解決這些還未解決的異點呢？

這個聖議會就發起召集第三次全體大會，以重建教會的統一；但是牠對於這種行動非常小心。牠向這些替康派的領袖建議，他們可以組織一個聯合的委員會

來發佈這種通告書。他們開了幾次會議，但兩方面總不能互相諒解。替康派的領袖要求在這種教會的聯合政府裏得到首位。聖議會的代表對於這點不能同意，但是他們很願意服從大會多數的意思。

於是聖議會把召集選舉會的通告書單獨發出了。這種通告書規定正宗派教會的各部份都有同等的權利與代表的數目。莫斯科的總主教彼得也發出一種反對的佈告，以抵制這種選舉會，並且要求聖議會與其他一切改良派的團體都無條件的順服他做教長守護者的勢力範圍。

雖然如此，選舉會仍然舉行的。有一萬七千的教區都來參加選舉，可以代表幾百萬的信徒，一萬七千個祭司，和二百個主教。在十月一日有三百三十四個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地方。從俄羅斯本部來的有七十八個主教，一百零五個祭司，與一百三十一個平信徒。有七個友誼代表——三個主教，三個祭司，與一個平信徒——是從白俄羅斯的教會裏派來的。有十三個友誼代表——九個主教，三個祭司

與一個平信徒——是從烏克蘭教會派來的。還有十個來賓也有建議權。

君士坦丁堡的全權教長由他在莫斯科地方的使節代表到會。還有一個友誼的代表是從羅馬天主教派來的。他是一個法國的耶穌會教士，名叫得比匿（*Monsieur D'Herbigny*）。他從國外來赴會，很使大會希奇。這可表明羅馬對於俄羅斯教會的活動是非常注意的。

講到大會中代表的志趣與同情，大多數的人是站在聖議會的立場上的。但是其中有四十二個代表組成的少數團體却是替康派的同情者，或是至少在各派中間議和的時候不肯多讓些步的人。

俄羅斯大部份的人當然要求教會的統一。這班民衆不明白各派中間的爭點，所以他們囑咐這些赴會的代表應當以統一爲主旨。然而在大會開第一次會議的時候已經看出統一是不可能的。大會派去謁見總主教彼得的代表團却是失望而歸。這個總主教拒絕到大會裏來，並且用下面的理由來說明他所取的態度：（1）這

些改良派在教長退位的時候，篡奪了教會的政權；（2）安多寧主教既在退職期內，當然無權出來組織教會的行政部；（3）教會的最高行政部在一九二二年非法辭退了幾個主教；（4）在一九二三年的大會以前，這些改良派所採行的主教成婚的規律是非法的；（5）一九二三年的大會無權廢黜替康教長的職位，並且剝奪他一切的權利；（6）繆獨的祭司的再婚是非法的；（7）一九二三年的大會曲解教會的規律；（8）在活的教會的刊物中宣傳杜撰的教義。

改良派對於這種聲明的答復，就是：他們並不說自己是絕對無誤的；有時迫於情勢，他們也要犯些過失的，但是雙方對敵的團體都是免不了錯誤的；大會就是召集來矯正這些錯誤，並且爲了教會的利益起見，他們要服從多數的決議案；末了，他們也願意把他們的案情交給全體會議公判，並且接受牠的決議。他們雖然願意向對方盡量讓步，可是他們決不肯屈服于總主教彼得在教政方面的專斷。他們更進一步的說明彼得所提出的理由不過是一種面子上推托的話。他這種真正

固執的理由是因爲他與國外的帝制運動有關，並且他希望如果有顛覆蘇維埃制度的機會，就要利用教會來達到政治的目的。這個議會宣稱已經在公文上得到替廉教會與帝制派聯絡的證據。

除了這個統一問題以外，大會的工作也要根據真正的德謨克拉西原理來改良教會的組織。教會的領袖，主教，與祭司都是由他們自己的團體中選出來的。至于教會的行政機關只保留核准的權柄。大會又從新批准一九二三年的大會中大受攻擊的改良事業，就是准許成婚的人做主教與鐮獨的祭司可以再婚。

大會爲教會預備新領袖的教育工作很受人稱許，並且也批准了一封佈告書，請求民衆對於這種工作更加大量的贊助。

大會最有趣的努力就是要從新與別的東方正宗派教會發生關係。這一種邀請東方的教會到莫斯科來舉行全體會議的提案很受會中熱烈的贊助。若使這個會議能夠實現，那末俄羅斯地方的正宗派教會就強固得多了。

總主教彼得對於大會的抵制與他通常在教會的行政方面所取專斷的態度很爲許多主張統一與和平的朋友們所反對。至于這班人仍然是教會中的替康派。自從一九二五年的大會以後，在教會中發生了一種分化與積合的作用。祇要這種新社會秩序更加堅固起來，那末替康教會的大部份與改良派的聖議會教會遲早要重復聯合起來的。這種聖議會的教會也想變成新蘇維埃的教會。但是好像在法國地方在大革命以後幾乎有一百五十年的光景，現在仍舊還有天主教的保皇黨；所以在蘇聯地方，正宗派教會中的一小部份將要在羅曼諾夫的王朝已經在歷史上完全消滅以後，仍舊世代傾向於保皇黨。

現在替康的教會在管理上沒有法統的領袖，就增加了牠分崩的現象。在一九二五年的大會以後，有人即刻證實過世的教長與總主教彼得在批准大公爵息立爾——沙皇的堂兄——繼嗣王位的方面確是有分。所以結果就把彼得放逐到托波兒斯克（Тобольск）地方的修道院中。

彼得在離職的時候委任下諾弗哥羅（Nizhny Novgorod）地方的大主教塞澤阿斯爲他的接替者；但是這個主教又把他的職務轉給別人，所以在實際上沒有主管的人，徒然加添此糾紛罷了。有些主教不贊成這位總主教並且特別反對他政治上的活動，就把他廢黜，自己宣佈獨立，又另外組織一個行政機關。摩塞斯克的主教波里斯（Boris）就是其中的領袖。但是他並不見得受大眾的歡迎。

在舊的替康教會裏，這些有思想的人很覺得這種不自然的情勢；所以漸漸的傾向到改良的聖議會方面。因此牠的勢力和名聲就繼續的擴大了。

在一九一七年的秋季，這個聖議會要想召集一個大會來，好像一九二五年那樣的；醫治一九二三年的分裂。牠的發起者爲了要給這個大會更大的道德威權起見，就特別設法邀請東方教會的全權教長到會，以希望許多人可以因此參加這個大會。

現在俄羅斯正宗派教會的情形是如此的。牠在過去的十多年中雖然經過了革

命大大的打擊，但是仍舊可以生存，並且牠的活動力能使牠的仇敵與朋友一樣的驚奇。牠如今正在爲統一而奮鬥，並且從情勢的發展方面看來，這種奮鬥確乎能夠成功的。

第九章 東正教改良的趨向

遠在革命把俄國的局勢顛倒並且勉強正宗派教會走向正義的難路上之前，教會自身方面改良的呼聲已經很高了。比方教長泥昆在十六世紀中的改良事業，從近代西方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大重要的；因爲牠們大概都關於儀式方面的。但是牠們使俄國全體人民的宗教生活上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從泥昆以後，教士正式的教育方才開端，並且大主教關於倫理方面的教訓纔能普及民衆。那些反對泥昆的非正宗派不得不依靠平信徒的講道，以宣傳嚴格的清淨教徒的道德。最初傳道的教派，如同飲乳會教徒（Molokans）在十七世紀

中上了俄國的宗教舞台以後，就開始侵入正宗派教會的道路，因此這種根深蒂固的教會又被推入改良主義的運動中。

在拿破崙得勝以後，民族主義的復興就產生了一班親斯拉夫派的哲學家，他們就是杜思拖夫斯基，托爾斯泰與索羅維夫的先導者。他們對於教會中固定的教義攻擊得非常厲害，並且安排下後來種種知識上的攻擊就是關於教會的受制于國家，教會的偏向神秘主義而排斥社會計劃，以及全部與美國所謂「基要主義」相同的觀念學。

然而一九〇五年的不成熟而普遍的革命，最先使教會進入整批改良的道路。發起一種基督教社會主義勞動運動的嘗試，彼得堡委員會的活動（這個委員會由三十五個祭司組合而成，其目的要使教會接近一般人民的需要，）以及最後安多寧主教的革命態度，因為他做了彼得堡的主教却拒絕為「專制皇帝」禱告——這些事情都可表明已經有一種急進的普遍運動要想把教會接近地上的事情。這些勇

敢的，冒險的自由主義者當然沒有一個能享長的壽命。這種黑色的反動就把他們壓倒，正如同牠遏制各種別的革命的活動一樣，直等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發生以後，教會的自由派纔敢再舉起他們流血的頭來。到了一九二二年教長的政治也崩潰了。這些自由派就得到一個機會來處理教會改良的中心問題。

這些熱情的教會改良家已經年歲很高又被萬民尊敬，現在都聚集攏來，在一九二二年八月開了一個會議，決意要把正宗派主義中主要的罪惡完全打倒。他們所謂的罪惡大概就是：教會的受制于國家，修道院中主教的專權，主教對教士的壓制，一般信徒的缺乏自表思想，以及末了最有害的思想，就是一千年來從衰敗的拜占庭遺傳下來的禁慾主義的人生觀。

他們稱他們自己的工作爲『活的教會』。擬就了一個計劃，請求全國人民的贊助。但是他們後來發現——正像起初這些進步派所曾經發現過的一樣——改良派在算學上的原理乃是除法不是加法。

但是我們應該記得他們的工作不是簡單的，也非通過幾條議案就能解決的。他們要剷除俄羅斯人民的根本生活。蘇維埃政府所公佈的政教分離的法令當然停止了一種很大的罪惡。但是仍然還留下這種很精細的與周密的事情，就是要使教會的心理從一千年來陳舊的修道院的人生哲學裏解放出來。這就需要一種眼光遠大的努力進行的傳道工作，並且要使一班信徒都受教育與社會化。

這些自由派在八月會議裏第一種的行動是要取消托爾斯泰的開除教籍案，因為他被從前沙皇的聖議會定了異端的罪；然後他們再草就了一種大綱，包括信條上的，倫理上的，儀式上的，法典上的與行政上的種種改良事業。其結果就是：

信條上的改良

(1) 從新建立原始基督徒在傳道方面的教訓，但注重發展救主基督人性的道理，反對煩瑣哲學派對於基督教曲解的道理。

(2) 發展基督教對於上帝的教訓，就是看上帝為真理與慈愛的泉源，反對

舊時希伯來對於上帝的觀念，就是看上帝如同一個憤怒的報復者與罪人的判斷者一樣。

(3) 發展關於世界起源的教訓，就是看世界是出于上帝創造的旨意與自然界生產的能力。

(4) 發展關於人的教訓，就是看人如同萬物之靈與創造能力中最高等的智慧動作。

(5) 發展得救的教訓，就是看得救是上帝藉着在十字架上的愛心重建人的嗣子地位。

(6) 看基督教會如同一種神人的結合，以實現上帝的真理於地上。

(7) 看永生如同一個人的人格在道德的完全上所有一種有機體的發展與最高點。

倫理上的改良

(1) 發展道德上關於拯救世界上人類勞苦生活的普通環境的教訓。

(2) 反對修道院中用否認世界與輕視人性自然的需求來拯救個人的教訓，因為這種教訓要使道德衰敗，人類滅絕。

(3) 使家庭成聖，變成一種社交與道德的保障。女子在道德上與社會上和男子完全平等。

(4) 看工作如同豐富生命的一種快樂的表示與社會興盛的一種確實保證。

(5) 看一切勞動者在利用世界上財源的同等機會如同政府的一種基礎。

(6) 用道德的與物質的力量來贊助國家為不幸的殘疾者，鰥夫，寡婦，和孤兒謀幸福與改良的計劃。

(7) 用社會革命的正義與全世界勞動者的組合來保護一切工人與那些被剝奪者的權利。

在儀式上的改良方面，這些會議建議將公禱書中與禮拜儀式裏各種不合基督

教的來源以代表異教徒的儀式與迷信的遺留東西一概排斥。牠也提倡平信徒可以充分的參加教會的禮拜與教訓方面，並且使講道爲禮拜儀式中必要部份，因此趕走了煩瑣哲學，再回復到單純的傳道工作。

關於教會的法典問題，這些改良計劃是要把教會歷史上所有的法典完全經過修正，並且把一切無用的或是帶着基督教偏狹的國家主義觀念的條文都要排斥。

末了，這種計劃對於團體的生活要求一種完全的改良：使平信徒在教會的工作裏有一種密切的合作與參加，並且有權選舉他們的牧師；共同捐助教會，組織一個總財政部；提倡慈善事業；重組女執事的工作；使青年人受宗教教育；使賢能的平信徒有充分加入牧師的活動；又剪除天主教的專制主義，因爲這是與早先基督徒的行爲是相反的。

這種改良雖然是很激烈，但仍舊完全屬於宗派的。關於教會的根本道理並沒有什麼接觸。我們看出他們要使早年的教會全體大會中基要的議案在精神上復興

起來，並且使牠們在近代的世界得到生命和意義。活的教會明明白白的不是一種新的教派，却是一種漸進的教士與信徒的團體，並主張以傳道為根據的改良事業。

這樣的一種計劃當然不能滿足進步派中間一切思想不同的份子。革命的老主教安多寧首先脫離活的教會，另外組織一個團體，稱為「教會重生合一會。」他以為活的教會對於掃蕩修道院的主教制度所抱的態度完全太消極，並且對於攻擊教會中硬固的儀式與習慣也不大厲害。所以他就坐下寫了一篇憤怒的獨立宣言，把他自己稱為「卑微的安多寧，莫斯科與全俄的總主教。」他責罵舊的替康教會是「硬固的，麻木的，反社會的，教士把持的與反革命的。」他說：「活的教會是一種強暴的教皇的掠奪物」，所以他就把牠吐棄了。「離開了民衆和沒有民衆的重生是不可設想的，也是不道德的。」因為這個主教靈魂不能在任何現存的組織裏找到平安，所以他自己就組織了一個團體。這種教會從來沒有得到大多數

人的信從，自從安多寧在一九二七年一月裏去世以後，牠的前途是有疑問的。

那時對於這些反抗者也發生一種反抗的運動。這種運動爲吠登斯基祭司（現在已做了總主教）所領導，其中大部份的人都是鄉區中的祭司，雖然吠登斯基自己却是一個城市中的知識階級。他們的團體稱爲『舊使徒教會合一會』，其目的是要把古代使徒教會生活上的原理實現於現在的時代。牠看一種原始的共產主義實在是優美的生活。牠一時做了活的教會的勁敵，因爲牠這種計劃很可以感動農民的。

在改良派中這三種互相反對的團體與其他不大重要的運動，（如同國家主義的烏克蘭教會運動）常常互相爭鬥，使全部的改良工作受着極大的損害。自從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以後，許多有組織的與散見的改良運動漸漸的消滅了。但是這種重要的事實還是存在，就是在全俄的宗教區域內關於信條上儀式上，祭司的迷信與規律上都發生了一種很大的靜默的，漸進的，崩潰的景象。現在俄國的正宗派

教會是沒有什麼主教的領袖。我會經和許多鄉村的祭司談話。他們甚至連他們教區內主教的名字也不知道，並且自從革命以後，他們在工作方面沒有受着什麼人的監督。這些祭司只好單獨的生活，也不與外界接觸，於是全體的教友也開始表示他們自己的意見，所以這些祭司就不得不在護道與說教方面作一種研究。

在現在的時候，俄國正宗派教會裏面有很多平信徒的活動與演講的工作，爲歷史上從來所未有。這種熱烈的，無產階級的，無神主義的革命不但已經似非實是的使教會脫離俄皇與教長的專制，而且爲普通人民開了一條潛在宗教勢力的道路。現在蘇俄地方從舊時代傳下來的一切制度當中最自由的東西要算是敬拜的權利。別的各种機關都要受審定的。戲院，影戲場，報館，甚至音樂會與公眾通俗的演講也要受檢定的。但是講經台的自由是很穩定的。這些祭司藉着政府的命令可以不必積極的參加國家中政治的與公共的生活。他們就能執行以前宣傳社會正義的教師與先知的職務，並且他們可以在各處地方竭力的進行他們的工作。比方

總主教伏登斯基到各處教區中去在大衆面前作種種激烈的演講，又向這班無神主義派挑戰，預備作一種公開的辯論。教會裏也有一種機關報，名叫「聖議會」的使者，」銷路是很廣的。還有許多神學院（牠們很受美國布未克主教，哈特曼博士與納爾遜主教（Bishop John Nelson）等人的贊助）就造出許多改良派的傳道者在社會上實行改進的計劃。縱使反對改良派最厲害的人，也認爲這些學校是教會的希望，並且也有能力來阻止教會退步到宗教的野蠻主義方面，因爲教會自從泥昆的時候已經脫出了這種主義。這些舊教會的學生與那些改良派的學生同爲這些學校所歡迎的。有許多人相信在他們裏面有一種機會可以希望各種教派與正宗派教會從新團結起來。

俄國在這些日子，人民的生活常和教會發生粗暴的衝突，幾乎在一夜當中宗教的世界如同在修道院以外的境界裏一樣的把「舊的秩序改爲新的了。」無論教會要不要改良，但是改良的勢力已經使教會內外受着夾攻了。

第十章 非正教宗派及其分裂的情形

俄羅斯充滿了非正宗的教派。縱使美國宗教的派別有一千零一種之多，但是要和一個國度裏面約計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的人民不肯選擇正宗派教會的敬拜方法比較起來是不能相匹了。在沙皇底下教會與政府，爲了自衛起見，就用聯合手段來竭力壓制分派主義。因爲俄國的分派主義，與美國的不同，是常常含有革命性的，並且牠爲了屢次不能有組織與訓練一個傳道團的機會就被壓迫下去了。大革命臨到以後，政府准許這些非正宗教派與正宗教會有同等的權利；這些非正宗派教徒就不必作殉教的呼聲，並且有許多分派主義的榮耀也失去了。但是神祕主義，宗教的狂熱——常常純粹屬於性慾方面的——與奇怪的禁慾主義如果一直能夠繼續侵略人的本性，那末這些教派也能夠繼續存在下去的。在鄉僻的地方與城市的小巷裏面，常有許多男女老小都在滾地哀哭，大聲呼號，混雜一處，放縱

情慾。這種情形發生於現在社會主義化的俄羅斯，正如同牠們發生在資本主義化的美國的田納西（Tennessee）山中與勞斯安極立司（Los Angeles）的住宅裏一樣。

在十六世紀以前，俄國地方的非正宗派教徒還是很少。那時所有的非正宗派教徒，比方像這些猶太教徒，不是從正宗派教會裏面發生出來的，但是有一種獨立的來源。他們是從那種受過基督教思想影響的猶太教徒傳下來的。他們還保持許多猶太人的風俗，尤其遵守安息日方面。這種教派一直到現在還是存在。牠也分爲兩派：就是所謂『舊以色列派』與『新以色列派』。有好幾千的『新以色列派』的教徒爲了在大戰開始以前要逃避俄國政府的逼迫起見，都遷移到美國與烏拉圭（Uruguay）地方去居住。

教長泥昆在十六世紀中葉所鼓動的大分裂就使俄國從此發生了分派主義的風潮。泥昆本是一個風雅飽學之士。他增加了和改正了許多教會的禮節。這些『舊

信徒派』反對他比現在英國的批評家反對聖公會新近修正的公禱書還要厲害。他們反對的理由，在我們看來，常常是很可笑的。

這個祭司背着禱告文說：『哦，上帝賜憐憫給我們。』這句正確的禱文當然是『上帝賜憐憫給我們。』立刻就犯過失了！於是就起了一種分裂。舊的禮文中把『耶穌』這個名字拼爲（*Issus*）。泥昆的信從者堅持說正確的希臘文却是（*Issus*）。這又起了一種分裂。這些『舊的禮制派』用兩個手指來劃十字。但是泥昆主張要用三個手指，以表明三位一體的意思。這些枝節的問題徒然增加了許多的教派，對於上帝的榮耀簡直沒有關係的。

但是他們除了這些儀式上的無理取鬧以外，顯然還有思想上真正的衝突。這些『舊信徒派』看泥昆的改良事業是要使教會羅馬化的一種嘗試。一班民衆正在反抗政府與貴族的壓力，因為政府與貴族都要想管理教會。在這班『舊信徒派』看來，泥昆就是反基督者的化身。一六六六年在莫斯科舉行的全體會議，把『舊

信徒派』逐出教會以後，那些得默示的人看見六六六的數目就以爲能表明反基督者得勝與世界末日的記號。泥昆的信徒幫同警察方面所施慘酷的逼迫手段，加添了分派主義者的熱心。雖有幾千人被殺，但是存留者的精神還沒有打破。他們還要繼續下去，很強固的信仰他們的象徵主義與禮拜儀式。

神秘主義的傳佈也有一種經濟的背景，農民的土地與自由既被剝奪殆盡，那末他們除了宗教以外沒有地方可以表示他們的悲哀。無怪他們希望一個彌賽亞臨到，以解放他們的羈絆。十七世紀中反叛的農民領袖，如同斯騰加拉辛（Stenka Rasin）與波加拆夫（Pogachev）和他們哥薩克的附從者都是「舊信徒派」，並且他們的受人歡迎大半是由于他們所負擔的神秘使命。

當彼得大帝使教會很牢固的受制于國家的時候，他便分派的理由更多一層。他被人家看爲姦淫者的兒子，反基督者泥昆的私生子，所以和他的工作發生關係便是一種極大的罪惡。沒有一個真的「舊信徒」允許他自己算在戶籍的名冊中。

凡是色彩濃厚的「舊信徒」不可攜帶蓋了反基督者印章的護照。他和他的家庭不願意納稅或是順服政府的命令，却寧願逃避到曠野地方或是讓人家殘忍的處死。所以有了各種黑色的反動，就引起了一種奇怪的運動，傾向于宗教的，社會的，政治的過激主義，進入了哲學的無政府的邊界。我們不妨說這些都是俄國革命運動的起點，並且經過了幾世紀的奮鬥，纔把那種可恨的反基督者的政府——獨裁政府——打倒。

只有一個主教，就是柯朗那的保羅，與「舊信徒派」一同逐出教會。這位神聖的出教者死在監禁之中，所以沒有機會封立一個繼任者，以接替正宗派使徒的傳統。這樁不幸的事情使「舊信徒派」失去了一個主教，因此就沒有祭司來爲他們施行聖餐。那末怎麼辦呢？有些「舊信徒派」以爲基督教沒有祭司是不行的。他們就建議說爲了要繼續舊信仰起見，他們可以邀請國家教會裏的祭司。他們辯明說「國家教會雖然跟從泥昆的異端，可是牠沒有喪失牠使徒的能力，與傳統，

以及用接手禮來封立主教與祭司的權柄。他們的接手禮是有效的；所以我們若要得到一個教士，祇要請國家教會的祭司到我們教會裏來舉行古的禮節就是了。」這班更加激烈的人却抱不同的見解。他們辯駁說，『不是這樣的；泥昆派中的人既然拋棄了古代的經典，斥革了古代的遺傳，那就失去了他們使徒傳統的一切權利。這種國家的教士團體已經不成爲一種教會，却變成撒但的會堂了。凡要和這些地獄裏的教士聯絡就是罪惡；凡被這些叛教的主教按了手就是污穢。這些東方的教長核准了俄羅斯主教反對古禮的呪詛，那末他們就變成有份于異端的人。主教的團體幾已傾覆，那末東正教已經滅亡了。所以使徒的傳統與合法的祭司也都沒有了。』

爲了這個問題，這些『舊信徒派』就分裂了。有一派因爲贊助主教政治就稱爲『有祭司派』（Popovtsy）其他一派叫做『無祭司派』（Bespopovtsy）。這些有祭司派決定要想各種方法從國家的教會取得祭司。他們用了納賄的方法或

是收留逃難的祭司就能夠得到祭司來繼續施行教會的禮拜與聖禮，直等到前世紀的中葉他們纔得到一個獨立的祭司團體。這班無知的「舊信徒派」總想近東的正宗派教會還是忠心于「舊信仰」，所以他們到塞爾維亞與希臘的主教中尋找一位主教，後來費掉許多力量，才找到一個從前在波斯尼亞（Bosnia）做過主教的希臘人來服務。他的名字叫做安布洛茲（Ambrose）。他的主教職務是因故被君士坦丁堡的教長斥革的。他們在俄國邊界上貝羅克立尼察（Bielo-Krinitza）地方建設一個很華麗的修道院。這個地方就變成他們主教的坐鎮地，也是他們教會行政的中心點。這樣，舊信徒中的「有祭司派」能夠維持牠自己，並且不致離開牠的遺傳與信仰。這些「舊信徒派」遵守清淨教徒的道德，很是興旺，並且建設許多設備豐富的修道院，學校，與孤兒院。他們自從這世紀開始以來特別活動。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以後，舊時禁止他們建造教堂，發印刊物，並且公開宣傳他們思想的條例也廢黜了，所以他們就大大的興旺起來了。這班「舊信徒派」的力量

大半是因爲他們的工作，與國家的教會不同，幾乎完全由平信徒從中担負的。他們的祭司祇不過施行聖禮和舉行教規上平信徒所不能主領的儀式。他們是很有錢的，尤其是莫斯科地方的舊信徒，所以能夠使他們的子弟受着一種很好的教育。在這世紀的初年，有一班青年的『舊信徒派』能夠把古代宗教的虔信與近代自由思想和高尚的文化調和起來。有些在俄羅斯藝術方面最尊貴的創造；如同莫斯科藝術戲院就是這些有知識的『舊信徒派』出資設立的。在政治方面與社會改良方面。他們大概和自由派聯絡，並且有不少的人是在革命中很出力的。

關於有祭司的『舊信徒派』方面還有一種『信仰合一運動。』這種運動可以當做舊信徒派與正宗派教會當中一種連鎖。

在一八〇〇年，正當亞歷山大一世的時候，有一羣莫斯科的『舊信徒』請求國家教會准許他們在莫斯科地方組織教會，並由國家供給他們一個主教與祭司。他們願意接受這些祭司，也不咒詛他們是泥昆的異端，祇要他們能按照舊的規矩

主領禮拜的儀式。

政府對於這種妥協的條件認為是一種分散「舊信徒派」勢力的良機，所以牠贊同這種調和，就供給牠們祭司，但並不履行供給牠們一個特別主教的條件。這種條件在一百多年以後，纔被一九一八年的大會實行出來。

在莫斯科以外的舊信徒很少有人自願的加入信仰合一的教會。所以政府要想強迫舊信徒加入這種新教會。在尼古拉一世的時候，他很殘酷的逼迫這些「舊信徒派」。凡是「舊信徒派」的教士中拒絕加入信仰合一教會的人就被放逐，並且他們的教會移交國家教會的祭司，這些祭司就照舊的規矩執行信仰合一教會的祭司的職務。這使「舊信徒派」受着一種極大的打擊；然而有許多人不肯屈服，並且在祕密的地方用逃難的祭司來繼續他們宗教的儀式。

這種「無祭司派」離開了他們的母教會很遠，並且分成了許多的教派。有幾派是趨向於很激烈的方面。他們的口號就是「逃避這個世界，不可和反基督者妥

協。」他們既然拋棄了祭司的制度，就在長老中間舉出平信徒的領袖來按照教會的遺傳所准許的主領教會禮拜的儀式。這種儀式包括讀經，講道，與施洗。在男信徒執行這些職務是希臘正宗派教會所認可的。這種「無祭司派」更進一步的准許婦女也能主領禮拜的儀式。洗禮大概是當做一種聖禮，不過關於施洗的方法却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主張照希臘正宗派教會的形式，因為他們沒有這種奉獻權的。別的人要把成人在夜間浸入一種急流的海水裏面。還有別的人要用他們自己的手來為他們自己施洗。其餘的聖禮不是被他們完全拋棄，就是被他們用心靈來解釋。所以有些教派中的人要在一個長老面前向着一種聖像認罪。這個長老就算是他的一個顧問，並且要說這樣的話：「願你的罪孽都被赦免。」

這種放棄祭司與聖禮的主張就引起各種激烈的思想，尤其是關於婚姻方面。有些人完全拋棄婚姻，主張絕對的獨身主義。別的人准許納妾制度為一種保護肉體軟弱方法。還有別的人爭辯說，婚姻不是一種神聖的禮節，却是一種綿延種族

的通俗的結合。這種結合要得到父母的允許與祝福纔能擴張，並且要由男女雙方嚴肅的立誓，纔能成聖。

『舊信徒派』對於平信徒所規定的婚姻律並不引起像許多批評者所猜疑的不道德行爲。他們缺少法律上的拘束來使婚姻不能解散；但是在這些『舊信徒派』中間大半還保存家長制度的生活，所以這種風俗就可代替法律上的裁判。那些主張絕對獨身的人常常要反覆到放縱情慾，並且又轉變到狂妄禁慾主義，末了就成一種激烈的教派，稱爲『閹人派』。這些無祭司派教徒很反對現存的制度與政府。從他們中間發生了許多運動，『要逃避這個世界與反基督者的統治。』這種極端派是爲一個名叫『狄奧多西』（Theodosius）的所領導（一七〇六年）。他宣召人家說：『逃避到曠野以救你自己。若使你被官廳捉住了，就當把你自己燒死或餓死。這樣，你將得到殉道者的冠冕。』這種用自殺與『火的洗禮』來得到拯救的意思深入大多數極端份子的心裏。他們從字面上解釋聖經上所載『天國是

努力進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的話（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節。）這些狂熱的信徒爲了救他們的兒女脫離可咒詛的反基督者的王權，就把他們殺死；並且全家與全村情願把他們自己作爲獻給上帝的一種火祭。他們把他們自己關在積穀倉與房屋裏面，然後放起火來，並且互相看守，不使一個人逃出這種試驗。別的人逃到曠野地方去情願凍餓而死。有人估計死在這種情形底下的男人婦女與孩子大約二萬人。還有好幾千人都死在他們正式的仇敵手裏。

這些「舊信徒」大半都在北部的俄羅斯人中間找到他們的信從者，因爲那邊的人所有柔弱的天性最容易接受一種需求極大犧牲的宗教。這些「舊信徒」因想逃避他們的逼迫者就漸漸向北方走去，後來就散居在上伏爾加與烏拉爾（Ural）的森林地，以及沿着白海岸邊的地方。別的人又遷移到西南地方，接近波蘭的邊界。有些人越過邊界，進入東普魯士地方，他們在那裏一直到現在還實行共產的團體生活。這些更加好動的人一直向東走到西伯利亞。他們在哥薩克人與高加索

人中間也得到許多信從者。他們無論到什麼曠野地方去居定了以後，就組織有多少共產性的村莊，並且他們藉着勞苦的工作與合作的方法就很快的興旺起來了。他們這種開闢與殖民的工作非常有成績，並且俄國的北方與西伯利亞的一片大地所以能夠成爲俄羅斯化大半都是他們的功勞，因爲以前只有莫些芬蘭民族與韃靼民族散居在裏邊。

喀德鄰二世 (Catherine II) —— 她的主張宗教自由很足以自傲的——對待這些「舊信徒」是很和氣的，並准許他們在莫斯科地方也可建築他們的居留地。那些富足的「舊信徒」就在莫斯科的近處建設一個很莊嚴的公墓；因爲他們很特別的要把他們的死者葬在一塊專爲此用的地方，以符合他們的信條。他們在公墓的牆垣裏面造了許多禮拜堂，那些居留地就是在禮拜堂的四周。這些忠實的「舊信徒」都聚集在那裏，一直到現在還做了他們運動的主要中心點。這種有祭司派有一個「羅哥日斯基」 (Rogozhsky) —— 含有「草蓆」意) 公墓。那種無祭司

派有一個『普理奧勃拉仁斯基』（Preobrazhensky）——含有『變像』意）公墓，這兩個公墓都與莫斯科地方相近的。

大約在一七七〇年的時候，有一個名叫彼菲滅（Euphinius）的起來反對莫斯科地方居留者的妥協。他斥責城中的生活如同近代的巴比倫一樣，並且這些忠實的信徒要拋棄各種地產，因為他看產業能使人民趨向於停留生活的主要的結合。他宣佈說：『土地從前，現在，將來都當屬於上帝的；人應當公有牠，但不能佔有牠。』

彼菲滅的信徒用了『離開你的父母，背起你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口號，以煽惑這些忠實的舊信徒逃出鄉鎮去實行遊牧的生活。他們就被人家稱爲『奔跑派』（Begung）或是『遊行派』（Straniki）。他們的講道當然與俄國農民間共產主義與無政府思想的傳佈大有關係的。凡是要加入真信徒的團體做一個『遊行派』的人應當在入會的時候受一種『遊行派的洗禮。』這種洗禮是在夜間鄉僻的

地方舉行的。他就撕破了他的護照，另外接受一張紙條，上面畫了一個十字架並且寫了幾句話，好像說：「這是在耶路撒冷批准的眞護照。」這種「遊行派」帶着一隻木碗與調羹以及一張小的聖像。他們大概是抱獨身主義的。但是萬一「肉體軟弱，」也容許私下的兩性關係。他們以爲這種關係比婚姻好得多，因爲一個成婚的人永遠把他投入罪惡中了。

當這個教派傳開以後，牠的信從者似乎都不能走這條路；因爲牠們到處地方不得不有朋友來供給他們的膳宿，所以他們就發起了一種附屬的教派，稱爲「居家派」(Residents)。他們的職務就是要接待這些「遊行派」並且保護他們不被警察捉住，因爲那時政府下了一種很嚴厲的命令要捉拿這些「神聖的遊蕩者」和那些幫助他們的人。這種「居家派」是被看爲這派中的預備信徒。若是他們不拋棄他們的家庭實行遊蕩的生活，就不能算爲完全的信徒。所以他們常常到了年紀老了或是覺得行將就木的時候，才實行他們遊蕩的生活。政府要想用極嚴厲的

手段來撲滅這種教派。但是這種『遊行派』愈受逼迫，信從的人愈多，如同在尼古拉一世專制的時候確有這種情形。這是人民對於現存社會制度中農奴制度，長期兵役，與專制政治所起的必然反抗。這些『遊行派』教徒都是粗獷的革命者。他們所有反基督者的哲理與共產主義的思想能使政府與教會的權威慢慢的在暗中失去。

除了這種激烈的『遊行派』以外，在舊信徒的運動中還發生許多別的教派與團體。所以有一種『張口派』（Gapers）是相信上帝不能不把他獨生子的血肉賜給這些忠實的信徒。他們在『神聖的星期四』那天舉行禮拜的時候，大家都站立著，張開了口，等待天使來把聖餐給他們吃，以滿足他們靈心上的飢餓。

這種『靜默派』（Molchaniiki）要人立誓保守靜默，否則就要實行一種與『遊行派』相同的生活，大概不過是這派的一種旁支罷了。有許多人被官廳捉住了，無論用什麼嚴重的刑罰，總不能免強他們說話。

這種『非禱告派』（Nyemoliaki）是一種神祕的教派，帶着一種否認合理的結論的精神，他們拒絕他們各種外表面的禮拜儀式，並且對於聖經作一種哲理上的與理性上的解釋。他們看各種東西都是屬心靈的，並且相信他們已經住在一個聖靈的時期，所以祇能藉着聖靈來敬拜上帝以明白聖經。

這種『否認派』（Denyers）是和『非禱告派』相似的。他們相信地上既然爲反基督者所統治，那末一切神聖的東西已經遷移到天上，所以只能用直接與救主相通的方法來拜神。

與『舊信徒派』中間所發生出來的各種神祕的教派很接近的還有一種流傳很廣的，可是來源不同的精神主義的教派，就是所謂『鞭撻派』（Blest）或是叫做『基督派』。他們的名字到了十六世紀的末葉纔始聽見。他們與這些『舊信徒派』不同，從起初的時候就很激烈的反對教會中的儀式。他們一切的教訓和歷史的基督教的道理沒有多大相同的地方。有些研究這種教派的學者相信牠有許多觀

念與古代的真基督徒派哲學 (Gnosticism) 相同的。

『鞭撻派』之所以得名，乃是因為他們在聚會的時候常要把他們自己鞭打到一種瘋狂的地步。他們歡喜稱他們自己爲『上帝的子民』與『基督的團契。』這些『鞭撻派』沒有經典，好使他們的靈感和默示不至受任何拘束。他們說：『我們必須學讀的生命冊是寫在我們自己的心裏。』照他們的遺傳講來，真的信仰乃是由上帝自己在彼得大帝時候從天上帶下來的。那時，上帝降臨在佛拉德米爾 (Vladimir) 地方的一個高山上，得了人形。上帝變成肉身以後，他的名字就叫『但以禮菲利坡飛赤』 (Daniel Philippovitch) 他曾經說道：『我是先知人所稱道的上帝，第二次到世界上來拯救人類，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上帝。』

相傳菲利坡飛赤是軍隊中的一個兵士。他後來隱居到曠野地方，就宣佈他自己已『萬軍之主。』他在一百歲的時候生了一個兒子，就是基督，然後再升到天上去。這個兒子名叫『伊凡蘇斯羅夫』 (Ivan Suslav)，是那立士金 (Na-

(Eshkin) 家裏的農奴，後來就變成這個教派中主要的先知。他揀選了十二個使徒，又發佈了十二條誡命，據說是『萬軍之主』——就是但以理菲利坡飛赤——傳給他的。照這種『鞭撻派』的遺傳來伊凡蘇斯羅夫——就是第一個基督——受鞭打逼迫，並且兩次釘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每次復活起來，住在世上，直等到他升到天上與他的父親從新結合。這種『鞭撻派』相信每個男人或女子都可希望成神或是變成一個基督，或是變成一個聖母。一種聖潔生活的結果可以使人成神，並且這個教派已經產生了許多基督。這種『鞭撻派』的誡命已經造成一種禁慾的法典，就是禁止飲酒，赴宴，結婚與性交。他們也禁止偷竊與起誓。

這種教派的主要禮節是種種祕密的儀式，連帶許多發狂出神的舉動。他們在夜間穿了白的衣服聚集在祕密地方。凡是參加的人先打成一個圓圈，就開始隨唱隨轉慢慢的增加他們旋轉的速度，直等到他們都變成癡狂和疲乏的樣子。這些發狂的男女所有種種發顫，呼號與哭泣行動都當做聖靈降臨的表示，這些夜間舉行

的狂情的舊會，有時不免要發生淫亂的舉動。官僚方面多半爲了這種猜疑，所以遏止他們。

這些「鞭撻派」迷惑的運動，引誘人的能力很大，所以他們能夠深入男女修道院裏面，就是在上等社會的客廳中與朝廷上都有他們的蹤跡。平民中間無聲氣的正宗派教義與上流人物中的不活動的懷疑主義，能使上下等人一樣的容易接受這種教派中的禮節。

這種「跳躍派」(Skakuny)與「鞭撻派」是相彷彿的。他們最初發現于彼得格勒。他們的來源是因爲受着外國的影響。他們起初傳佈在芬蘭的耶穌教徒裏面。後來就傳到俄國的人民中間。這些「跳躍派」用歌唱與跳躍的方法來達到他們狂熱出神的態度。他們也被人家當作淫亂之徒。他們的習俗要叫成雙作對的男女到秘密會中去，等到他們達到狂熱的情景，就到暗室中去慶祝基督的愛。政府曾經查得這些教徒傾向于禁慾主義與縱慾主義的都有。這種禁慾的團體不過是朋

友會 (Quakers) 的一種支派。據他們的見證說，他們的禮拜儀式包括『唱詩，讀經，友愛的請安，以表示某信徒的慈善心；其次為那些被聖靈感動而起立的傳道者在會中虔信的講解；末了，他們都按照講道者的話所引起的情感或是跪在地上，震動身體做禱告，或是痛哭流涕而哀求』。別的團體大半是年輕的人。他們很少神祕方面的氣味，不過要拿宗教的集會來掩飾他們淫亂的舉動。這些教派都祕密的組織會所。這些『鞭撻派』的會所就是稱爲『船』(Korables)。每一只『船』是由一個男先知或是女先知所主領。至于全部的運動是由一個『基督』管理的。

近來從『鞭撻派』中發生出一種支派，名叫『喧嚷派』(Sholopats)。他們大約在一八五〇年中發現的。他們是講共產主義的所以把各種東西都歸公有。這些『憤怒派』(Phassuny)也和這種『鞭撻派』有關的。但是他外表面仍然與國家的教會聯合的。在他們中間也有許多趨向相同的別支派。

反對『鞭撻派』與『跳躍派』的縱慾主義的就是這種把自己去勢而成爲閹人的禁慾派。這派的信徒被人稱爲『閹人派』(Skoptsy)，可是這派的信徒却歡喜稱他們自己爲『白鴿教徒』。他們大概發現于一七七〇年。這派的創立者是彼得格勒『鞭撻派』中的一個教友。他的名字叫『塞利發諾夫』(Selivanoff)，是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他自稱『萬主之主與萬王之王』。他來要聚集一般忠實的信徒，並且藉着這些信徒的能力與他們的指導可以在俄羅斯建設彌賽亞的國度。塞利發諾夫又加添他的尊號，稱爲『俄羅斯的皇帝』，因爲他自以爲是彼得三世的轉世化身，要來恢復喀德隣二世篡奪去的王位。這種『閹人派』的根本道理是根據于字面上解釋的幾段經文。他們的信仰與行爲的根據就是在馬太福音十九章十二節裏所說的話：『因爲有生來是閹人，也有被人閹的，並有爲天國的緣故自閹的。這話纔能領受，就可以領受。』

他們以爲人類最初的父母所有肉體的結合就是這種原來的罪惡。他們宣傳並

且實行自關的方法。他們信用一種割勢的辦法來得到完全的聖潔，並且變成天使的樣子。他們不怕阻礙，很熱心的收受教徒。這種「閩人派」與俄國其他大多數的教派同是相信千福年的。他們相信基督將要臨到。他們信徒的數目如果達到了十四萬四千，那末「白鴿信徒」就可以統治一切了。他們很熱心的要完成這個數目，並且犧牲一切財物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他們因為警察的巡視，所以從事秘密組織。他們也像這種「鞭撻派」一樣的稱他們的會所爲「船」。他們在彼得格勒地方的會所有一個「基督」主持，稱爲「皇家的船」。他們也像「鞭撻派」那樣的穿了白的衣服並且用旋轉的跳舞方法來得到他們狂喜的情景。他們也收留女人，和男人站在同等的地位，並且女信徒的數目也是很多，其中有幾個女人得了「聖母」的銜頭。他們的自關方法就是把乳房割去，好使她們不配哺育嬰孩。這種流血的入教式是在夜間穩藏的地方舉行的。當他們狂熱的情緒達到最高度的時候，就把入教的男女動手開割。這班「閩

人派』大概是很富足的，並且在商業方面也能互相幫助。

他們在外表面似乎也遵守社會的秩序。他們在服從教規立意犧牲之前，他們仍照常結婚並且也生育子女。他們在鬧過以後，當然很容易從他們嬌嫩的臉兒與柔細的聲音上看得出來的。他們也知道賄賂警察以逃避法網。他們要用強暴的方法報復那些敢洩漏他們祕密的人。現今在他們中間也發生一種運動，主張拋棄生理上的閹割，却用心靈來解釋聖經。這種運動也許可以把這些『閹人派』教徒變為一個自願獨身者的團體，並廢止他們野蠻的習慣。

在十七世紀中產生了許多的宗教運動，所以也引起許多的教派。至于他們的教義與朋友會的道理沒有多大差別的。俄國的『心靈奮鬥派』(Dukhobory)大概是從『鞭撻派』運動裏面變化出來的一種教派。托爾斯泰知道了他們所傳天國在人心中的道理與共主義的原則，就覺得很有趣味，並且從他們裏面找到了他所信仰的真宗教。這些『心靈奮鬥派』相信上帝與人不能分開的，並且離開了人，

他就不能存在。記憶，理性，與意志就是神聖的三位一體。他們否認超自然的生
活，並且要建設他們的天堂在地上，他們敬拜人裏面的上帝，所以他們的禮拜儀
式包括尊敬的鞠躬與互相請安。他們在早先的歷史中也有他們的『聖母，』就是
他們現在的領袖還享受『鞭撻派』中『基督』的尊號。他們廢棄聖經的權威並且
相信人心中的活書。他們是素食主義者，和平主義者，並且大半是共產主義者。
因為他們反抗政府，所以他們已經受着了極大的壓迫。他們中間一大半的人得了
托爾斯泰的助力就遷移到加拿大地方。他們在那邊的生活很是興旺，並且仍舊維
持他們共產主義的秩序。勝利的『俄國革命』已經引起他們極大的希望，可以在
『俄國過好的日子。他們中間有些人現在很願意回到他們舊時的家裏來幫助俄國建
設共產主義的社會秩序。

正當革命把牠粗糙的手忽然插入正宗派教會有序的事情中的時候，牠也撲
朔迷離的攻入這許多教派的暗中運動。在這些教派裏面的青年人與老年人中間也

常要發生衝突。這種「舊信徒派」當中前進的青年人要和正宗派裏面的改良派聯絡。同時這些年老的人好像要和替康派的反動份子攜手。他們無論怎樣衝突，可是那些澈底研究近代俄羅斯的學者決不會忽略這些教派對於俄羅斯人民的生活方面所發生的極大影響。

第十一章 多數派中間的浸禮會教徒

有人想一個安息復臨會教徒（Seventh Day Adventist）要向第一次無產階級國家的公民宣講道理，未免帶些譏諷的意思吧。但是他現在確是和浸禮會教徒（Baptist），飲乳會教徒與監理會教徒（Methodist）同在俄國，而且這些傳道者的活動使蘇俄的官員與正宗派教會都受着不少的煩慮。其實俄羅斯國內的福音宣傳運動發展得非常迅速，所以已經變成人民宗教生活裏的一種重要的因素了。

人民的愚昧無知與聖經的稀少昂貴常使宣傳福音方面得着很少的機會。但是在十九世紀的初年，俄國的聖議會在亞歷山大一世保護之下將白話的俄文聖經刊行以後，福音的宣傳運動幾乎變成了一種民衆運動。這些福音宣傳者和前面所講的各種神祕的或是合理的教派在來源上與精神上都是不同的。

最早在俄國宣傳福音的教派，就是所謂『飲乳會』，因為他們在禁食的日子都要飲牛乳的。不過這種習慣是爲正宗派教會所禁止的。

有些參觀過『飲乳會』的朋友會教徒說起俄國的福音宣傳者的信仰有許多地方和朋友會的教徒相似的。

飲乳會教徒宣稱他們心靈上的祖宗就是塞麥諾夫 (Semenov) ——他是俄國傳道派的第一位殉教者，在十六世紀中被殺于坦波夫 (Tambov) 地方的——與莫斯科的特維稜鐵諾夫博士 (Tverentinov) ——他在依利薩伯的朝代已經受着西方耶穌教義的影響了。這位博士的聖經摘錄可以當作一本宗教的教科書。飲乳

會的組織事工是由西門烏克蘭 (Simon Ukleyn) 做成的。他本是一個農民，很反對正宗派的教儀，並且叫他的信從者『實行精神的生活』而養成『精神的基督徒』。烏克蘭斥責一切的聖禮和任何的儀式。他承認聖經是神祕希望的泉源並且看他的是寓意的，不可照字面解釋的。烏克蘭得到了幾千的信徒。亞歷山大一世對於他的教訓取容忍的態度，又因這班飲乳會教徒的請求就准許他們居留在伏爾加和托麟 (Taurien) 一帶遼僻的地方。後來這些飲乳會教徒從新遇着了逼迫，其中有許多人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直到如今他們的子孫仍然在那裏集團而居。他們中間有些人也遷移到美國去居住。他們這種非戰的宗教觀念使美國在世界大戰時得到幾個最著名的公平的非戰主義者。

在俄國地方浸禮會運動的發長大半是坐收這些飲乳會教徒的漁利。牠和德國虔誠教徒的殖民，按時讀經派教徒 (Stundists) 與德國浸禮會教徒一同在十八世紀中起來的。有能力的，有組織的，有熱忱的浸禮會宣教師當然能夠把隨隨便便

的飲乳會教徒所舉辦的宗教事業從他們手中奪了過來。結果，你難得看見一個飲乳會的談道所隔壁是沒有浸禮會的禮拜堂的。

一九〇五年與一九一七年革命的結果使這個限制宣傳福音的條例一概廢除。於是福音的宣傳者就向正宗派教會的本身進攻，很使牠吃驚。正宗派中間的分裂與共產黨的反宗教宣傳却把他們在宣教學業方面的障礙物都掃清了。

反宗教的宣講員進入一處地方，總容易找到許多的聽衆。當他們離開以後，村莊上的祭司不常要被驅逐出境，正宗派的教堂也被改爲一種俱樂部。但是遲早有一個遊行的宣教師——浸禮會的或是飲乳會的或是有同樣信仰的——到來宣傳他得救的道理與『真正的福音』，那麼過了幾個星期以後，這個村上的人——照共產黨看來，他們似乎都是可靠的無神派——却會高聲歌唱斯拉夫文的通俗讚美詩了。

這些神聖的遊行者在攫取正宗派的地位方面很有效力，所以東正教會的聖議

會在一九二五年召集一個特別會議，以討論這種危險的景況。這個會議對於福音宣傳者的成功舉出了許多理由，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為東正教會的分散。牠設立了一個國內宣教部要更加詳密的注意此事，並且研究福音宣傳者的方法。在正宗派的會議中曾經講起民衆接受傳道者的教訓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就是說這些浸禮教會徒，安息復臨會教徒等等都利用那些和共產主義思想很接近的社會上與政治上的口號，至于他們這些口號從前是被禁止的，現在却被新政府所容納了。」

近來福音的宣傳運動進行得很勝利，在正宗派教會或蘇維埃政府方面都不加以反對。牠也許可以繼續發展，使正宗派教會大受損失；但決不會永遠如此的，牠必須向前訓練這班正在起來的新青年。傳道運動中的領袖對於這一點都是承認的，可是他們對於這步工作一直還沒有多大的準備呢！

現今在各種教派的內部方面已經顯呈着層疊的樣子，而且新的支派也繼續不斷的產生出來。所以福音的宣傳運動也分別爲『蘇聯浸禮教會』與『傳道教徒合

一會。』這種合一會的領袖爲普洛卡諾夫 (I. S. Prokhanov)。他本是一個飲乳會教徒，後來纔加入浸禮會的。這些傳道派教徒在教義上，和浸禮會教徒相差很少的，可是他們也許爲了個人的私見就不肯接受浸禮會的名字並且要反對牠的組織。這個合一會的教徒數目可說是最多的，或僅比號稱有二百萬教徒的飲乳會略差一步。

在近幾年當中安息復臨會也發達得很快。牠大概從浸禮會教徒與合一會教徒當中所吸收得去的教友比從正宗派教會裏還要多些。

同時，這些竭力趨向於神祕方面，如同實行『說別國方言』和希望『末日快到』的教派，也發達起來了。牠們中間有所謂『五旬節派』，『上帝子民派』，『靈禱派』 (Molevans) 等等。

這些監理會教徒也有他們的信從者。他們起源於外國，又是發生於本國的。在本國方面的教徒是從飲乳會而來的。他們像監理會那樣的接受嬰孩洗禮並且注

重自覺的得救經驗與力求基督徒的完全人格。

福音的宣傳運動在牠一世紀半的歷史中已經穩定的發展開去，得勝了最害的逼迫行動和別的一種阻礙。凡在人民的手中有了一部聖經的地方，這種運動就能顯起了。在這方面，蘇俄的聖經會對於這種運動已能有極大的貢獻。

俄羅斯的東正教會與羅馬的天主教會不同，牠從來不反對聖經的分裂，尤其是新約聖經，而且聖議會的印書局已經出版了幾百萬冊聖經都已售去了。蘇維埃政府對於別種出版物審查得很嚴緊，可是已經准許聖經出版與分銷。現在新出版一種聖經是借助於美國聖經會的。

蘇維埃政府對於分派運動所取的政策大體是贊成他們的，並且他們的成功大半也就在此。這個理由是很清楚的。這些異派教徒在舊政府底下是受了極殘酷的壓迫。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被監禁或是和那些現在執掌政權的革命者一同流逐到荒僻的地方。在充軍的時候，這班共產主義者對於這些宗教革命者的精神也能領

略欣賞，所以在舊政府崩潰和共產黨得勢以後，他們對於這些異派教徒自然要深表同情了。

況且有幾種教派頗饒共產主義的風味，所以政府也因此贊成牠們。蘇維埃的司法部曾經發表一篇宣言說：「這些教派很容易適應蘇維埃政府普通公民的法律與規則並且可以在蘇維埃的組織內結合成功一種有機體的農業細胞，——雖然牠們爲歷史的情境所驅使，還採取共產主義的宗教形式。蘇維埃的當局對於這些組織所有最重要的事工乃是視察這些共產主義的組織在發展和保障方面是否得到科學和高等技藝的助力，並且能否繼續牠們所採行的工農業團體的共產主義的習慣和方法。牠們達到了一種高尚的形式，就會變成勞働階級對於信仰共產主義的可能與利益方面的實際模範。」

蘇維埃政府承認這些宗教的共產主義派是富有經驗的共產主義者，並且要想利用他們做人民的榜樣。牠當然希望教育會慢慢的分散他們宗教的信仰而使他們

變成良善的馬克思主義者。

政府在應付這些教派的時候，感覺得一個困難問題，就是關於牠們對於在紅軍裏受軍事訓練與充當兵役的態度。在舊政府底下，這種非戰主義的教派是素來被輕視的並且常常要受着橫暴的壓迫。蘇維埃政府在國內戰爭的時候，也碰到了這班良心上反對戰爭的人。牠對於這個問題所規定的法律是很確切的。照原則上說來，一切國民都要盡當兵的義務，但是經過人民法庭的議決，也得豁免的。這種法律的內容如下：

「那些因為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參與軍事服役的人們，人民法庭中有了決議以後，就可代以醫院的服務，最好在傳染病的醫院裏或是由應募人自己擇定別種相當有用的工作。

「因為人民法庭有時要遇到那些來請求免除兵役的宗教信徒非但正式屬於這些准許積極參戰的機關，並且他們自己也參與過去與現在的帝國主義的戰爭，那

末必須通用下面這幾條原則：

「(1) 按照一九一九年四月一日的法令，他們必須經過專家的檢驗。這就是說經驗的人（並且宗教的團體）必須為專家個人所知道或須詳細調查這樣人的生活與事業，因為這種法令是要考慮這樣的人在過去生活中的事蹟以及他們在沙皇時代為宗教信仰自由的戰爭。

「(2) 人民法庭有權召集專家來詢問，或是把這案件移交相當的莫斯科人民裁判所。

「(3) 這種案件必須在最近的會議中決定的。

「(4) 人民法庭也許判決否認專家的意見為滿意而拒絕這種請求。如果法庭依照請求人或是他的證人所提出的證據看來，認為他這種歸附一個教派或是一種非戰的信條沒有充足的理由；那麼就可顯出他要利用這條法令來逃避蘇維埃共和國內人民當兵的義務。」

法庭在審理這些案件的時候，對於這些良心上反對戰爭者所屬的教派應有相當的注意，並且只有那些在世界大戰以前就加入這種主張無抵抗主義的教派才得豁免當兵的義務。因此，有許多的浸禮會教徒的請求已被拒絕，因為浸禮教會並不勸告牠的教友拒絕在世界大戰中的服務；所以他們應當沒有遲疑的在紅軍中服務。近年以來，政府對於這班良心上反對戰爭者的態度漸漸的減少溫和的性質。有些教派中的信徒以前是可以免除兵役的，可是現在已被強迫在軍隊中服務，不過他們是不帶兵器的。政府恐怕贊成了某種宗教的團體，就會鼓勵別種在遺傳上沒有非戰思想的教派。

在有些教派與政府的中間，對於土地問題也發生了衝突。在一世紀以前，這些教派中的信徒居留荒僻無人的地方，土地當然是很多的；所以他們所開墾的田地比普通俄國農民所分得的大了許多。如今土地既然覺得缺乏，政府就不得不把舊時異派教徒所有的土地減少。於是他們就覺得很不滿意，並且有許多人要想

遷移到別處地方去了。

在有些地方，教授青年人宗教的問題也是異派教徒與政府中間一種衝突的原因。法律禁止人民在家庭以外，對於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施行一種有組織的宗教教育。有些教派中的信徒對於這種限制是反對的。但是照大禮而論，這個問題可以拿地方上的情形互相調解的，並且也只好因時制宜的。

現今在俄國地方福音的宣傳者所要爭論的中心問題正和世界上各處地方一樣的是要把舊時的宗教適應于新機器的工作。他們除了暫時在情感上所得的成功以外，沒有教育的組織來訓練出一種領袖和這班蘇維埃靈敏的宣傳者相競爭。我們應該記得現在蘇俄地方每個十二歲的小學生都被教以進化科學中最進步的學說。這樣的教訓自然是猛力的反對各種教派中神學家的陳腐學說。這些福音宣傳者的神學校對於這種危險還是忽略。他們沒有人能夠把西門單純的福音書當中的教訓和一個機器時代的唯物主義作適當的調和。若使未來的宣傳福音的基督徒要想繼

續興旺；那末他們必須解答這個難題。他們所要經過的這種思想上的整理工作，似乎比他們在美國地方基要主義者的同道們還要痛苦呢！

第十二章 知識階級在宗教上的慘劇

俄國知識階級的宗教史實在是一幕悲劇。從第一步看來，舊時代的教會因為牠和反動的帝王主義有不正當的結合，所以要用嚴厲的手段來對付知識階級，却不想容納他們到教會裏來。這些知識階級中的人是不息的在追求上帝與一種更和諧的更佳美的生活方法。這班教士階級很少懂得有知識的青年所有不斷的心靈上的欲望，又不和他們表同情。牠採取一種壓制自由思想與自由討論的政策。因此就把一切富有宗教性的知識界中的人都從教會中排擠出去了。

這種排斥的原因大半是由于教會受了政府的姦污。現在教會已經脫離了三百多年來政府的羈絆。所以這班知識階級和教會中間復歸和好的主要障礙物已經除

去，至少那些對於社會革命與共產黨專政不表同情的人與那些沒有傳染唯理主義的懷疑和近代主義的神學的人總可從新加入教會。但是在那些仍然醉心於近代主義的思想的人看來，教會中陳舊不變的遺傳與道理是最厲害的障礙物。這些教條並不會被完全拋棄，而且一個人所希望的乃是把牠們從新估定價值，末了又可把教會的新生活給牠們遮蓋起來。

在富有宗教情感的知識階級中，有許多人深深的覺得他們和教會間的隔離。他們說，教會對於近代並沒有什麼教訓，並且牠已經被牠的舊遺傳與舊道理所窒死了！他們對於這種情景很是悲傷，並且想各種方法以改良教會的內部，但是效果很少。

他們所出的怨言，簡單的說來，就是：教會有一種禁慾主義的人生觀；牠看輕肉體如同原來的罪惡並且與心靈的人是相對的。牠把人分成兩段，而且教人爲了拯救靈魂的緣故就把肉體犧牲。照這種學說看來，「犯罪」的意思就是把身

體放縱於無限制的肉慾生活中，「救靈魂」的意思就是要看輕世界，克制身體。這兩種方法都是有害於身體的。

若有人好像一個西方的基督徒那樣的說起一個「基督徒運動家」，在一個虔信的東正教徒看來似乎是已經褻瀆了聖靈。俄國所謂虔誠的意思就是十字架，痛苦，節制肉慾，與死亡。在東正教會裏有一個能幹的當代護道者說：

「禁慾主義是歷史的基督教的根基。這是牠主要的特點；這也是牠真理的柱石；並且在俄國地方這種主義是特別注重的。……在禁慾主義裏就把肉體浸入基督的神秘中，一個基督徒的眞生命就在這種美麗的痛苦裏面；除了這樣的生活方法以外，他並不要求任何別的生活，因為他的天國不屬於這個世界的。死與俄國人的靈魂是不能分開的。……基督教，尤其是當代的基督教，是完全建築在這種死的意義上。苦使沒有死那就沒有基督教。教會不能接受知識階級中的人並且和他門聯合起來，因為這樣就必斷送了永久的遺傳，又投順了『這個世界的王』。這

段關於教會所處地位的坦白言論就揭開了俄國知識階級宗教上所演慘劇的幕。

俄國的宗教思想家不能接受教會遺傳的禁慾主義，但是渴慕一種有豐盛生命的宗教，一種快樂和諧的宗教，和一種身心合一的宗教。他們很失望的和教會爭論，因為牠至多願意忽略了肉體並大量的饒恕牠，但是總不能把牠成聖，又不能把牠和心靈調和起來。這些有知識的人還有一種憂慮，就是說教會使那些要想把基督的國度建設在地上的社會改良家失望。俄羅斯的教會看這個世界如同已經毫無希望的喪失了。牠的教訓是要勸人逃避世界，拯救一個人的靈魂，預備天上的國度。爲了這個緣故，牠看世界上的學問藝術科學是反基督的，所以就將知識階級與基督教會中間的缺陷愈弄愈深了。

這種離異的起點可以追溯到以前俄國建設大學的時候，尤其是在莫斯科大學裏面親熱的友誼團體中，這些學生與教授聚集擁來討論他們心中所認爲難以解決的心靈的與社會的大問題。『什麼是人生的意義和目的？這是有思想的俄國人

中間的大問題。凡是關於有神論與無神論，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問題都以此爲中心的。俄國的革命運動，尤其是在前世紀一直到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都和知識階級的心靈運動有密切關係的。在他們看來，這是那些煩擾他們心靈的理想主義的衝動的一條出路。這班大學裏青年的男女要尋找一種服務，犧牲，與自表的地方。俄國接連的革命運動有些地方和美國宗教的復興運動是相彷彿的。有些青年的男女常常從富貴的家庭中出來，拋棄家庭的關係與社會的特權，要到民間去工作，受盡國家與教會的逼迫，並且他們所要服務的愚昧迷信的農民，對他們還要忘恩負義哩。

這些革命復興運動常被俄國的貴族政府的暴力所征服，直等到後來牠被世界的戰爭與大革命所破壞。

這些革命者每次失敗以後，精神上就覺得殆喪失望，並且表示出各種宗教上與道德上的敗壞。這些更加趨向於神秘方面的人就流入極端的宗教個人主義與神

秘主義。別的人就藏匿到馬克思的曆史定命論的哲學裏去。還有些人就變成犬儒學派，輕視世界與他們自己心靈的意識。這些殆蕩的時期也可表明道德的衰落與社會的分崩。

自從日俄戰爭的潰裂而接着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失敗以後，斯羅斯的知識階級在道德上的衰落已經達到極點。這班俄國的青年既然覺得他們自己沒有能力達到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自由，就起來反抗道德的法則。這種反叛的哲學是由阿爾戚巴塞夫 (Artsybasher) 的動情的小說『沙寧』 (Sanine) (一九〇七年出版) 裏給他們的。阿爾戚巴塞夫藉著沙寧譏笑人們為政治權力而奮鬥，却鼓吹從放縱情慾中得到個人的快樂。他以為一個人不必有什麼人生觀，或是依照任何的主義，或是請求上帝，或是有什麼良心上的痛悔。醉酒與姦淫沒有什麼可恥的，並且世界上也沒有罪惡這樣東西，貪飲醇酒與愛好女色都是男子自然的慾望。凡是自然的東西都不能算錯的。他以為基督教要教人必須違背他自然的天然而生活着，所以

「基督教在歷史中佔據了一種可惡的勢力，並且耶穌基督的名字將來也要壓迫人，如同一種可咒咀的東西」，這種不道德的無政府主義即刻爲這班有知識的青年人所實行。有些青年的男女被邀入這種放縱情慾的社團，所以國會中的議長稱這種狀況爲「沙甯的道德」。但是政府並不遏制這種情形，因爲沙甯在政治上是沒有危險的。在這些試驗的年代中，只有很少的人仍然保持他們的信仰，並且這幾個忠實的信徒就變成一種新宗教革命的復興運動的領袖。至于這種復興運動在每個新的世代中是要重複表現出來的。

這就是俄國知識階級的宗教慘劇的背景。宗教，政治，與道德的革命在這種運動裏可說是意義相同的，或是至少是不能分離的。這些創造的宗教衝動積成革命的風潮與反抗不公道和壓迫的勢力，並且有時就發展到一種很大的羣衆運動。這種知識階級一朝失敗，就變成自我的分析，自我的否認和失望，或是傾向於一種希望將來得到一位救主以改善世界。

俄國的教會或是袖手旁觀，或是公然反對這些接連在知識界青年人中間所有心靈上覺悟的運動。這些青年都變成將來新俄羅斯的領袖，所以後來在革命成功的時候，無怪這班革命的領袖對於教會表示很少的同情。當教會被國家姦淫的時代，只有很少的祭司發出他們的呼聲來警告教會，並且他們立刻爲全能的教長政治所平息。所以教會對於時代的心靈要求還是充耳不聞。

在少數教會的先知人中我們祇要提出教父格列高里佩特洛夫（Gregory Petrovich）。他是一個非常的人並且有先見之明。他做祭司是出于自己的主張，並非屬於教士的階級——俄國地方的祭司大概是從這種階級裏招募來的。他的教區在彼得格勒的工廠區域內，他受了貧苦教友的感動，就開始宣傳一種社會的福音。一般普通的人民和有些知識階級中的人都聚集攏來，要聽他講道。他是胆大有力的演說家和著作家。他的宗教論文與週報流傳得很廣。在俄皇朝廷中有幾個大臣對他很發生興趣，所以召他來做皇家中的師傅。他用盡心力，要說服那些掌權的

人也必須經過完全的改良，但是他在他們中間找不到一種反應的動作。

於是他就轉向民衆，但是教會中的教長已決定要禁止他聲張。他就被人家控告他講異端與背叛教會而受審問。他知道從這種教士的法庭中總得不到什麼公道，就寫一封公開的信給他的大主教。這封信是一種奇特的公文，並且把他所膽大宣傳的道理作一種簡單的敘述。他這一種道理到今日還沒有失掉牠的意義。他在信裏把俄國的希臘正宗派教會和牠的母教會——就是君士坦丁地方被土耳其人所毀壞的聖索非亞禮拜堂——相比擬。他說：『這座著名的上帝知慧的殿已經沉入地中，上面堆積許多垃圾，四圍築了許多圍牆和架子，以致一個人很難看出這種建築物的原意。俄羅斯的教會也有同樣的情形。這些基礎，牆垣，耶穌基督的原理與他的福音仍然是在那裏，但是牠們沉入地中，爲各種架子與堆積的東西所圍住——所以一個人要經過許多困難，纔能得着活的基督』。然後他很勇敢的斥教會爲國家所姦淫，因爲沙皇已經封他自己爲管理教會的主，甚至於要做一個

「上主」。

「我們傳了一千九百年的道，如今還只有個人的基督徒，分離的各人，但沒有基督教；國家中沒有基督教的法制，我們的風俗和道德已都不是基督教的了；現在實在沒有基督教的政府。如有人說起基督教的世界，這未免是奇談了。各種民族的相互關係完全和福音的精神相反背的；這些最信奉基督教的國家養了幾百萬屠殺民衆的人，有時殺戮牠們鄰舍，有時殘殺牠們自己的國民。」

「爲了辨護這些殘暴的屠殺，牠們就把這班受蒙蔽的民衆的心靈都挖去了。這些同樣的屠殺就造成一種科學。牠們就是軍事藝術——殺人藝術——的目標。這些基督教人民中間的關係和古代異教徒的關係有什麼區別呢？……」

「這班統治的教士階級，用了牠冷酷的，無心肝的出筋出骨的指頭已經窺察了俄羅斯的教會，殺滅了牠創造的精神，束縛了福音的本身，並且把教會賣給了政府。政府人員中種種暴虐惡行與背信的事情沒有一件不被統治教會的教士加以

掩飾，祝福，親手的蓋印。若使教會對於統治者與人民，對於革命者與反動者，或是對於全國的人民講解真正基督教的教訓；那末牠這種呼喊的聲音將有何等樣的能力！這樣的話會變成永久的福音真理的聲音，能夠打動全國人民的良心的。牠們會超過革命的雷震聲與殺人的呼喊聲，如同禮拜堂的鐘聲能夠遮蓋風潮的呼嘯聲。……

『在教會裏，真理的創造力已經枯乾虧損了。教會中的思想，因為離開了生命，就被人斥責牠專在世界上抽象的教條與神學的討論中轉來轉去，……上帝是不拿生命的本身來解釋的。一種特殊的實際的無神主義已被創造出來了。當然在言語與思想中上帝的存在是被他們承認的，但是生命的活動不像這樣進行上去，似乎上帝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名詞，有了聲音而沒有意義的』……

這封信當然加添聖議會的情怒，於是牠就把教父佩特洛夫定了放逐的罪，如今改良的正宗派教會却認佩特洛夫是牠的一個前驅者與殉道者。

俄國知識階級的宗教慘劇已經爲牠最有名的文學家與哲學家所了解，如同哥兒，杜思拖夫斯基，托爾斯泰，索羅維夫，麥立希考夫斯基，柏狄夫，羅薩諾夫（Rosnov）布羅克（Alexander Block）以及許多別的人都有深切的宗教信仰。他們的文學作品是敘述他們在精神上的奮鬥和努力尋找上帝的故事，並可表示人生的意義與目的。他們有時被稱爲『上帝的奮鬥者與上帝的尋找者』。幾乎各人都藉着基督與上帝和好。他們稱頌基督爲世界唯一的希望。但是只有少數的人與曆史的教會復歸和好。大多數的人都希望在世界大破壞以後建設一種社會的神權政治，或是希望建設一種普及的基督教文明的精神教會。

在這羣上帝的尋找者裏面，杜思拖夫斯基當然是最活現的代表人物。他從客西馬尼的道路上尋着了上帝。他因爲加入了自由思想的文人所組織的祕蜜團體就被定爲死罪。他確實經過了死的痛苦，因爲他只在執行死罪的幾分鐘以前纔被改判充軍到西伯利亞去，他知道怎樣欣賞受苦的宗教，基督的死的神秘，以及爲天

國的緣故釘死了自己，他懂得俄羅斯宗教的這方面，所以他很愛護牠的。但是他也知道別的一方面。俄國人在要求生命的豐富與享樂方面的奮鬥，他又了解的。他自己在生活上經過可怕的肉體與靈心的戰爭。他也明白俄國學者在知識上的困難——他們在知識上的願望與情感上的要求。他的長篇小說中的英雄都是上帝的尋找者與上帝的奮鬥者，牠們可以說明他的心思，同時把俄羅斯民族中各種教宗上與知識上的人物介紹給我們。

在魔鬼（Demon）這部小說中的啓立羅夫（Kirilov）是反抗教會與現存制度的，但是他並不是反宗教的，而且也不是一個瀆神者。有人問他禱告的事，他就回答說：『我崇拜各樣東西。你看見那隻蜘蛛在牆上爬嗎？我看着他，並且爲牠能爬行而感謝牠』。他的宗教是好像一種人神同體說——就是人的神化——與豐富的生命。疾病與死亡是一種恥辱，所以應該極力反抗的。他情願自殺，不願意受制于這種恥辱。啓立羅夫不是俄國人中間一個想像的或是孤獨的人物。我們

承認他的幾種品性是俄國的新基督徒如同麥立希考夫斯基，伯狄夫，與羅薩諾夫中間也是有的。

在杜思拖夫斯基看來，宗教是一種人生的需要。牠是一種超自然的權力，能給人生一種意義——不管有矛盾，痛苦，與死亡。杜思拖夫斯基不信託理知，他信託感情，並且沒有一個人能夠像他那樣的明瞭人類心靈中的祕密。

在他所做的卡拉馬左夫的兄弟們 (Brothers Karamazov) 裏他描寫他民族的主要特性。伊凡卡拉馬左夫是一個唯理主義者。他用理性來推想出宗教與道德，並且把這種神化的人變成一個人化的神。杜思拖夫斯基表明這種純粹的理知主義如何全變成他民族中的無道德主義。伊凡很歡喜把他無神主義的思想教導他的僕人斯麥狄科夫 (Smerdyakov)。他這種無神的思想到了後來就引導他的僕人犯罪。斯麥狄科夫跟着他主人的推想說：『既然上帝是沒有的，永生也是沒有的；那末近代的人就配佔據他的位置。……若使這事與他有利益的，就可草率的越過』

以前奴隸的道德的範圍，因為上帝那裏是沒有法律的。上帝在那裏，他就佔有了這個地方。所以我在那裏，我就是第一。……一切事情都可行的，那就是人生的究竟」。於是他因為他的老主人妨害了他的利益，就把他隨便殺死了。

杜思拖夫斯基堅決的相信俄國的人民沒有上帝是不能生存的，並且理知，罪惡，過犯都不能破除他們宗教的情緒。他小說中這些信仰無神主義的人物常常是不快樂的。他們生活的結果是自殺或發瘋，或是悔改，與上帝復歸和好。

卡拉馬左夫的一個兄弟名叫「德密特利」（Dmitry）的是一個放縱情慾的人。他犯了弑父的罪——雖然是出于無知的，他被上了手繯，充軍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他就喊着說：「呀，是的，我們將要受了鎖鏈的捆绑，得不到自由；但在我們極大的困苦中將要從新復活，得着快樂，一個人沒有快樂是不能生存的。上帝必定是有的，因為他能賜給快樂，這是他的大權。……沒有上帝我怎能往那邊去死在地下呢？……若使上帝在地上被趕走了，我們將要在地下遇見他，一個

西伯利亞的罪犯沒有上帝就不能生存，那末那些沒有犯罪的人更加需要上帝了。我們這班從地下糞土出來的人要向快樂的上帝歌唱一種悲慘的詩歌。上帝與他的快樂萬歲！我要愛他」。

杜思拖夫斯基理想中的基督徒已經在他這篇獸子 (Idiot) 的小說中描寫出來了。這種人物並不是虛構的，却好像杜思拖夫斯基那樣的瘋顛的人。他的品性是良善的，也是美麗與聖潔的化身。一個母親看見她嬰孩第一次的笑容，心裏何等快樂，所以上帝每次從天上的光明中看見一個罪人舉頭向他熱心禱告的時候，也覺得非常快樂。這樣的口氣是他獸子裏的轉點。那些來和他開玩笑並且要愚弄他的人，在離開的時候總帶着一種禱告的態度。他的簡單生活毫無驕傲；欺詐，報復或是好勝的心，乃是美德與禱告的一種希奇的綜合。後來有一個人名叫「阿羅沙」(Aloesha) 的，是卡拉馬左夫最小的兄弟，和「獸子」的人品是一樣美麗的，而且他的身體是很強健，並沒有癩痢的毛病。他很歡喜做一種與精神的教會

和好的連鎖，因為他要想做一個修道士，但是末了，他決定回到世界上來，因為他愛好生命。杜思拖夫斯基深深的覺得教會裏面的腐敗，然而他也確實知道急需牠做一種富有心靈的人的結合，也是一種使國家從分崩中拯救出來的方法。教會與普通的人在杜思拖夫斯基看來幾乎有同一意義的。他稱他們為上帝的担当者。他相信他們裏面有上帝的國度，並且能夠保守着一種毫無疑惑的上帝觀念。

杜思拖夫斯基很厭惡信條獨斷主義與教士階級主義。他皈依基督並非因為任何的無上命令，或是思想系統中的必要原理。在他看來，基督是生命的賜與者，罪惡的解放者，與教會——一種精神的國度——的創立者。他在寫給朋友的一封信裏說：「若使有人向我證明基督是在真理之外，如果真理似乎在基督以外，我總情願和基督同行作伴，不歡喜和真理站在一起」。

現在杜思拖夫斯基做了舊俄羅斯知識階級中遺留者的領袖。這些殘餘的知識分子或被放逐到世界各處地方，並且覺得他們是在担負他們的階級在歷史上所犯

的罪惡，或是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底下剝奪了他們以前的種種特權。他們中間有許多已經接受社會革命，並且要尋找一種機會為勞苦的人民犧牲服務。他們並不爲了失去他們的財產與特權而悲傷，並且好像他們的先導杜思拖夫斯基那樣的從痛苦中與上帝和人類復歸和好。有許多人也已經回到教會裏去，所以現在在教會與非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中間的仇恨已經取消了。

這種知識階級的宗教上的慘劇——杜思拖夫斯基與托爾斯泰在他們自己的生活中所經驗的並在他們偉大的小說中所表示的——在這世紀的初年成功了一種公開的宗教運動。就是牠的批評家所謂『新基督教運動』。牠有兩種特殊的趨向：（1）個人主義的，極端就成爲宗教的無政府主義；（2）社會的，未了就發展到宗教的社會主義。

麥立希考夫斯基，柏狄夫和羅薩諾夫個人主義派最著名的代表。布爾加科夫（Bulgakov），布羅克與盧那查爾斯基（Lunacharsky）可算是宗教的社會主義

派。

麥立希考夫斯基是近世俄國知識階級中的一個表率。他是一個詩家，也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憎惡近世的工業，科學，與藝術的功利主義，正如同他嫌棄社會民主運動的普通和平凡，教會的禁慾主義和精神頹唐，以及知識界中道德的和宗教的虛無主義一樣。他對於近世文明在精神上與文化上的破產完全失望，所以就跳入未知的世界變成一個熱心的上帝尋找者和一種新宗教哲學的創立者。

他敘述他心靈上破產的故事說：「我們已經到了歷史大道的終點，再要上去是不可能的了；但我們知道在歷史的末端，宗教就開始了。在危乎殆哉的時候，我們自然要想到生翼高飛和超出歷史的方法——就是宗教」。他覺得他的尋求上帝與宗教還是利己主義的一部份，就是要救他自己從一種失望的生活與永遠的淪亡中出來的最高的欲望。他知道這事，並且熱心的禱告上帝賜給他一種愛全人類的心。他在這種爲新生活而竭力奮鬥的時期中寫了許多的詩歌，都是從心坎中發

出來的禱告。我們不妨引一節如下：

『我因為平生沒有愛過一個人，所以非常驚恐：

我的心可以從此滅絕嗎？

上帝呵，賜我能力，以愛我的弟兄！

他在努力奮鬥與脫離他精神黑暗的時候，就來敲教會的門。在一九〇二年，他發起組織一個宗教哲學會。他邀集他的同志與教會和好，並且來研究道理。但是這些努力終歸失敗。他說教會不了解他們並且也沒有給他們一種特殊的教訓。教會中的教士與這班渴慕上帝的知識分子相遇見的時候，他們所講的話都是各各不通的。麥立希考夫斯基說：『教會仍然用舊時的眼光來看他們如同世俗的人，又不過是他們所必須勸化的不信奉宗教者。但是我們——至少在我們當中有幾個人——所有的信仰未必比這些修道士與祭司要薄弱。在我們看來，信仰是一種奇事，在他們看來，幾乎是一種煩惱；在我們看來，是一種深切的神祕主義，在他

們看來，是一種實踐的標準；在我們看來，是一種神聖的宴會，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平常的日子；在我們看來，是一種不敢穿的聖衣，在他們看來，是一種平日的舊袍。聖經中的說話，在我們看來如同聖山上的雷聲，在他們看來，至多好像強記的教義問答。其中所有的意義也好像計算木板或是以鎚擊木塊的聲音。我們要求基督的面孔好像光明燦爛的充滿權力的太陽，他們祇要一張面目模糊的陳舊玷污的聖像。……他們不能明白我們並不要教會饒恕犯罪的血肉，却是要教會祝福一個人的身體，並且使牠成聖」。所以歷史的教會在麥立希考夫斯基的知識分子中看來，已經證明是一種失望。牠和真正的生命並不發生切實的關係，並且四周似乎都被中國古代的城牆所圍着。牠的虛偽的禁慾主義，看性慾最好是一種必需的罪惡，並非是上帝的一種啓示。這種思想最被知識階級所拒絕的。他們從經驗中知道這種主義似乎要使道德發生一種墮落的影響。所以麥立希考夫斯基構成了他自己的宗教學說。他覺得需要一種學說。這種需要在我們慣于不抱獨斷的宗

教觀念的人看來，似乎是希奇的；但是麥立希考夫斯基是俄國一個有知識的人，所以他沒有一種明白解釋的原理作引導，他是不能行事的。他稱他的學說是一把拿寶石做邊的刀。

現在俄羅斯的基督教在他看來好像基督的墳墓。他稱牠爲一種不結果子的宗教。他嫌棄禁慾主義，因爲他相信這種主義和基督教的教訓不相符合的。基督的復活不但是精神的，而且是肉體的。所以基督教最後的神祕不是要把肉體與靈魂分開，却是要把肉體和心靈結合成功神聖的和諧。麥立希考夫斯基曾經辨論說：『若使肉體是絕對的污濁，爲上帝與純潔的心靈所拒絕的；那末爲什麼基督要道成肉身呢？爲什麼要肉體復活呢？爲什麼要拿身體與血當作聖餐呢？……這種變成肉身而往在我們中間的道就是上帝本體的一種啓示，就是上帝在世界上化成肉身而變成世界裏面的一部份』。他相信這種肉與靈的衝突以及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衝突能夠藉着基督教三位一體的觀念來解決的。照他看來，三位一體適合。

于三種國度，就是父的國度，子的國度（新約），與聖靈的國度——聖靈能把三個國度合而為一。在父的國度裏真理是表示上帝的權能，在子的國度裏真理是表示愛，在未來的聖靈國度裏愛是表示自由。他相信這種三位一體的學說能夠解決肉與靈，天與地，世界與上帝的不易相信的玄學上二元論。藉着三位一體在玄學上的解釋，這些相反的東西就變成一體了。麥立希考夫斯基希望達到一種神祕的教會。這種教會是在基督再來的時候從四處聚集擁來的，外表面也許好像是無政府主義的，骨子裏好像是社會主義的。但是綜合起來，就是要把個人無限制的自由用無限制的愛心來結合成功一個團體。麥立希考夫斯基藉着這種信條希望給知識階級一種玄學上適應宗教行動與社會表示的假設。

當麥立希考夫斯基走到這種荆棘的路上去尋找上帝的時候，他相信那裏存在了兩種真理：就是關於天的基督教真理與關於地的異教徒真理。他想將來理想的宗教要把這兩種真理聯合起來。但是他進行不久，就覺得這種聯合基督與反基督

的希望是一句褻瀆的妄言。他說：『我學得天與地的兩種真理已經在上帝的獨生子基督耶穌裏又爲普及教會所見証的同一基督裏面合而爲一；只是在他裏面非但有完全的，而且也有永遠發長的真理；除了他以外，沒有別的真理。』……他相信他的許多作品似乎是各各不同的，但是只有一個線索，一個目的，並且要獻給那些俄國人——『他們能夠明白基督教非但是一種過去的東西，並且存在現于在與將來的東西；基督不但是過去與現在的真理，而且是一種無限生長的真理；除了在基督的名下，俄國的解放與全世界的解放是不能實現的』。

伯狄夫也是近代俄羅斯的新基督徒當中的一個領袖。他好像麥立希考夫斯基那樣的轉向宗教，因爲他在近世文明的旋渦中不能夠看出人生的意義來。在這世紀的初年知識界中所注重的科學和唯物主義不能夠滿足他敏銳的和自覺的心靈在宗教上欲望。他自認說：『我需要宗教，因爲我要永遠的活着，我要在平常的生活中保持我的人格。我要把自己和不受拘束的世界聯合一致，却不願爲命運所制

定』。

他對於歷史的基督教和麥立希考夫斯基一樣的失望，因為牠這種禁慾的人生觀已經破壞了肉體與靈魂，個人與社會的和諧。他的希望集中在基督的再來。他以為這種現象是神祕的，所以和米立希考夫斯基的思想不同。他相信基督的精神為建設肉體與靈魂，個人與社會中間的和諧。牠也要解放人心中的創造衝動。這些衝動如今還是為一種虛偽的社會主義，唯物論，與錯誤的社會秩序所束縛。他主張社會要民主化，個人要貴族化。他說：『我相信一種心靈的貴族政治可以存在於民主的社會裏面，並且牠和政治的與社會的標準思想化是少有相同的。這種貴族政治能夠超過階級與團體的道德，並且使人有一種求進步的新衝動。沒有了這一種階級，社會就不活動，並且為流氓所統治』。

但是人的心思受了哲學的，教會的，與道德的遺傳的束縛；那末就沒有心靈上的貴族政治。他辨論說，倫理的理想必定要脫離社會的制裁。心靈上與倫理上

進步的第一種條件就是對於屬靈的人有一種深切的尊敬。這就是自由。普通日常的道德必須爲一種新的宗教重生所克服。這種重生在本性上是高出各種道德的法典的。

這種新的宗教意識一樣的爲耶穌的十字架與奧林帕斯山（Olympus）所吸引。他說：『我們非但爲釘死在十字架上受苦的上帝所引領，並且也爲牧羊神，快樂神，愛美神所感動』。這種新的宗教意識要想把奧林帕斯山與十字架綜合起來。他要求生命的充實。他要把受苦的宗教與快樂美麗的宗教合而爲一。

柏狄夫希望這種綜合能夠實現在彌賽亞的教會裏。這種教會是一種以基督爲元首的神權政治。他總括說：『我們要尋找一個教會，能夠包含豐富的生命，以及一切已經證明在歷史上有真正價值的世界經驗。在這種教會牆壁的外面沒有別的東西。在教會裏面是我們一切的價值，就是從世界上痛苦中所得到的一切；我們一切的愛，一切의思想和詩意，與一切以前爲歷史教會所擯除的創造力。我們

一切的偉人，我們一切高尚的志向與見解都是我們以前一切超絕的思想。

在柏狄夫裏面我們得到一個俄國人在宗教慘劇上的化身。至于他深切的願望是要使肉慾與他生活中所賦有的精神衝動調和起來。

一個人在分析俄羅斯新基督教運動中個人主義的趨向也必須提及羅薩諾夫。他在許多地方是俄國近代宗教思想界中最富有創造的精神。他好像麥立希考夫斯基與柏狄夫一樣的要努力尋找一種解決肉身與靈魂或是個人與社會衝突的方法。但是他們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反對獨斷的教條主義。他說：「爲什麼要把福音中希奇的說話變成信條中腐敗的字句，信條是死的東西。基督教在教父建設信條的時期已經失去了牠的單純，美觀，情感與吸引的能力」。……

羅薩諾夫好像麥立希考夫斯基與柏狄夫那樣的反抗教會的禁慾主義。在他看來，凡是屬於人的東西與一切生命的泉源都是神聖的。在他看來，宗教是神與人快樂的結合。他嘗性慾是最大的或是唯一存在的奇事。這是一種偉大的神祕。然

而他宣稱「歷史的基督教是失去性慾的」。在基督裏面，世界受了痛苦。基督教把著名的毒藥注射到肉體的快樂生活裏。

羅薩諾夫相信要解決俄國人宗教上的慘劇是在性的神化。他說：「在性以外沒有生命」。在表面上看來，羅薩諾夫是一個唯物主義者與縱慾主義者。但是他的唯物主義是不同的，乃是神祕的。在他的心目中肉體幾乎是變成精神的了。他感動人家的能力就是在這一點。羅薩諾夫雖然被官僚化的教士認為新其督徒中最激烈的異端者。然而他自己不管人家苛刻的批評，很願意和教士接近。在他所做的寂寞（Loneliness）這本書裏面說：「教會是地球上唯一含有詩意的與高深思想的東西。我的上帝呀，我怎能在這十一年中繼續的攻擊牠呢。……在教會裏我們都是兄弟，這是何等美麗呀！」

羅薩諾夫在革命的試驗時期中所感覺到的已經變成他的階級中遺留者的普通現象。他們已經回到教會裏以消磨他們的晚年，並且老死在牠裏面。這是慘劇當

中的一方面。

我上面所提起的在革命以前俄國宗教思想的領袖，無論他們的思想離開正宗派的教義這麼遠，但對於宗教與生命都表示一種肯定的樂觀的見解，並且希望藉着基督所啓示的神聖能力，使社會改造一新。還有別的思想家雖是抱悲觀主義與否定主義的，可是爲了他們不可救治的宗教性就給他們否定的精神一種宗教的解釋，使他們自己從不可避免的失望中拯救出來。

宗教的虛無主義者明斯基 (N. M. Minsky) 的思想是很有趣味的。他是最初反抗當時知識階級所信從的枯燥的唯物主義哲學。他所信仰的真理，就是說：「若使人生是有意義的，那末牠不能在平日生活的利益中求得的，却要從自己內心更深切的和神祕的部份裏尋找的，因爲在自己外面是找不到人生的意義的。明斯基的哲學思想不是一種純粹論理學的結果。他能表現一個富有情感的人在精神上所受深切的痛苦，以及無法得勝死亡的失望。他拋棄了他當時的功利主義與

唯物主義，他就退回到他自己的本身方面，並且變成了一個以自己為中心的悲觀主義者。他除了自己不快樂的「我」以外，不承認有什麼真實的東西。他對於一切現存的價值都下一種消極的批評。他拒絕藝術，博愛，犧牲，近世的科學，總之，一切善惡的的價值。但是他碰到了死的現象就不能拒絕。他說：「死非但是殘酷的，而且是不公道的和報復的」。在他這種訴苦，失望，與否認的精神中就握住了上帝的觀念，造成了一種特別的宗教哲學，使他相信這是能夠保障他內心的自由與平安。他稱他的哲學為「彌翁主義」(Meonism)。Meon是一個希臘名詞，是柏拉圖用以表明不存在的東西。爲了使學者了解他的學說起見，我不妨把彌翁的神話約略說一說。在太初是沒有世界，又沒有存在的東西。那時只有一個神稱爲「彌翁」，就是一切人物，知識，與美麗的原素。一切人物的形式原來都在他裏面，但是當彌翁只在他自己裏面存在的時候，一切東西都不能得到有意識的存在。於是他因爲孤寂，就決定犧牲他自己，完全否認了自己，以造成這個世

界。他說：『讓那些產生一種與我自己相反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既沒有偉大，又沒有聖善，但只有較大與較小的，更好與更壞的東西。——不平等的，却可互相比較的；不同的，却可互相轉變的；爭鬥的，却可互相負責的。我要把我自己退讓到許多人的中間，使他們得着自由，理性，生存的快樂，與犧牲的恩典。我要生死在許多人裏面，變成他們不利的愛心與熱情的目標』。所以彌翁犧牲他自己，創造出一種多元主義的宇宙，無始無終，有了統一的熱情，却不能達到唯一的目的。

因此，彌翁不過是對於以前的一種回憶。他不再存在了，因為若是他存在，宇宙就不能存在。明斯基把彌翁這種回憶看爲他的上帝。他要崇拜他，仰慕他；但是常常覺得不存在的他總不能達到的。因為這種理想是不能達到的，所以是可愛的與聖潔的。這種崇拜彌翁的幻想宗教並不爲哲學家所重視，但牠可以表明在俄國知識階級中虛無主義派裏面也有深切的渴慕宗教的平安者。

這些新基督教的哲學家在知識界中佔居很大的勢力，直等到革命把他們的夢想完全推翻。在他們看來，布爾什維克似乎是反基督者的化身。他們的美術人生觀不能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粗暴方法調和起來。他們就遷移到西歐去，從此斷絕了他們對於新時代中無產階級裏知識分子的直接影響。現代的人對於他們的名字恐怕也難以知道了。

在事實上說來，一個人在蘇俄地方不能再看見一種知識階級。這種階級已經被革命所打破，並且一大部份的人都逃到西部歐洲與美國去了。他們在那邊的生活好像從本地方移去的一種植物。牠不能吸收本國人民的快樂與苦痛，也不能使這些人民得到牠工作的結果。知識階級所遭受的這種流落異邦的苦痛實在是牠慘劇的極點。這種放逐要到什麼時候呢？十年已經過去了。一種新的時代已經長成了。牠有新的思想與新的希望。這些舊時的知識分子遲早要回來的，或是至少他們的文學作品能夠達到這種新青年的手裏。但是這班青年能了解他們與欣賞他們

嗎？誰能知道呢？

第十三章 結論——宗教的存在與否

現在有兩種勢力正在向蘇聯的人民競爭精神上的統治。牠們就是宗教的——尤其是基督教的——人生觀和馬克思唯物的人生觀。

在蘇聯的人民所要發展的新文化中宗教究竟有沒有存在的地位？這個問題現在最能引起我們各人的興趣的。在歷史階段中有什麼勢力能夠決定蘇俄心靈上的將來呢？

第一，人們可以確切的說復古是不可能的，正如同美國不能捨棄汽車或鐵道再回復到馬車一樣。俄羅斯革命無論受人家怎樣的批評，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牠已經把舊時的東西永遠掃除了，並且從這種革命的混亂狀態中演化出一種新式的文明。

布爾什維克主義和牠的無產階級專政當然是一種專制主義，或許比舊時的政府還要殘忍呢。但是沙皇的專制主義阻塞了進步和民治的門戶，而無產階級的專政却為真正的民治的進步開了一條大道。

在俄國地方，這些在創造新文明方面活動的勢力是顯而易見的。只要牠接連碰着干涉主義者新戰爭的危險也許會變成武力主義與分部政治的禍根。

俄國一切的社會學派普通都相信牠會發生一種新式的文明。斯拉夫的哲學家與醉心歐化的學者都有這樣的預言。這些思想家在最近的一世紀中希望舊歐洲崩潰以後就興起一種新文明，傳播到全世界，以刷新舊的社會秩序。大約在八十年之前有一個聰明的斯拉夫派哲學家——就是王子鄂多夫斯基（Prince Odoevsk）——寫了這段預言說：『西部歐洲呈現一種奇怪的悲慘景象。竟見與意見衝突；權力與權力相爭；王位與王位篡奪。科學，藝術與宗教——社會生活中的三種動力——已經失掉牠們的勢力。我們大膽的說，在許多人看來現在似乎是奇怪的，

但是只要過了幾年，就能明白西部歐洲是走上了敗壞的大道；我們俄國人適得其反，却很年輕而新鮮，並且沒有參與歐洲的罪惡。我們要完成一種大的使命——我們的名字已經刻在凱旋碑上了；在動搖的歐洲敗壞的時候，科學，藝術與宗教的勝利是在等候着我們了。這樣的話令人想到斯賓格勒近來的一種預言。他相信西歐的人民已經消磨他們精神的活動力。這種親斯拉夫派當農民的鄉議會，教會和沙皇慈善的貴族政治是那些能夠演化出一種神權的共產主義式文明的勢力。這班親西歐派拒絕了教會和貴族政治，却完全要靠這種受過西歐科學與文化洗禮的鄉議會。並且希望牠變成將來建設一種新的共產主義式文明的胚胎。

同時赫爾層 (Alexander Herzen) 也很徹透的說明這些親西歐派的地位。他說：「俄羅斯是何等的僥倖，因為農民的鄉議會還沒有消滅，個人的財產也沒有分散鄉議會的財產；俄羅斯的人民是何等的僥倖，因為他們沒有碰着西歐文明的一切政治運動。至于西歐的文明毫無疑義的要使鄉議會暗中受損害，並且現在

已經在社會主義的歷程中達到了自滅的時期。從事實上說來，如果社會主義不能把衰敗的社會重建起來，並且不能完成牠在西歐的使命，那麼俄羅斯將要完成牠了。……在俄羅斯地方沒有固定硬化的東西；各樣事情都是在一種尚未成形的預備時期，所以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能夠變成我們人民的思想。在西歐地方社會主義好像是混亂的和恐怖的幻想。在我們看來，牠似乎是我們人民將來發展的一種先見。俄羅斯民族的生活法則和西方的科學將要綜合起來，變成我們的勢力，我們的將來，我們的特權⁴。

這一種共產主義共和國的觀念保存了俄羅斯革命運動中默示的希望；至于專制主義的羈絆也反鞏固了這種信仰，使牠快快實現。列寧和跟從他的革命者都承受了這些遺傳的思想。他們雖然在社會的哲學思想方面都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可是他們相信俄羅斯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的時代，就能跳過牠，直接把社會主義的秩序建設在古代鄉議會的基礎上。他們辨論說，俄羅斯的統治階級是很小的，中

產階級——資本主義的後盾——幾乎是沒有的；所以縱使一種少數的，却是富有革命性和階級意識的，並且有好領袖與組織的無產階級，也很容易克服專制主義與資產階級，並且藉着一種暫時的專政就能依照社會主義的原理改組政府與社會的秩序和建設一種共產主義式的文明。

列寧受着了這些信仰的感動，就在專制主義崩潰以後的時期中握了政權。如今他的信從者要奮力的維持他們的權力，並且要用一種強固的狄克推多制度取得時機來建設新的社會秩序，造成一種共產主義式文明的基礎。他們能夠成功嗎？什麼勢力能夠幫助他們實現這些希望呢？這些問題是我現在所要嘗試回答的。

我所說的『文明』就是社會方面那種有組織的努力，也就是要想依據確定的思想把剩餘的經濟來源與人類的力量變成社會的與文化的價值。文明是要為社會進化所管理與引導的。這是要照偉大的思想家所定的圖案織成社會的形式。有人或許疑問文明究竟能不能照預定的模型製造出來。我相信祇要這種模型與人民固

有的社會勢力與文化思想並不反對，那末一定能夠的。所以德意志依照俾斯麥所預計的模型很容轉變為一種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文明。牠的成功是因為德國的人民有一種好戰的性情與國家的思想。這種情形在日本更為確實。日本不到兩個時代已經把牠半野蠻的民族轉變成功一種近世帝國主義的國家。社會進化是和生物進化不同的。前者的進步大半要依靠經濟的剩餘，組織的效能，與聰明的領袖。講到生物的進化全在乎極遲緩的生物學的歷程。這種歷程是不大容易拿人為的方法來促進的。

在我們研究俄羅斯各種教派的時候，曾經表明在這三世紀中共產主義的思想已經傳佈在農民中間，好像一種宗教的道理。一個人不妨說農民中最優秀的份子都是共產主義者，至少是含有宗教意味的。革命的無產階級與有些知識分子雖然在他們的策略與組織方面是各不相同的，可是也確實向前看共產主義如同文明的理想形式。我們祇須提出幾個人的名字，如同赫爾層，巴枯寧（Bakunin）拆泥

瑟夫斯基 (Tchernishevsky)，托爾斯泰，拉甫洛夫，(Layrov)，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列寧與許多別的人。這些思想家與領袖對於怎樣達到目的方面的意見是大不相同的，但是他們對於目的本身方面的意見是從來不分歧的。巴枯寧是一個贊成流血鼓動的直接行動主義者。托爾斯泰是登山寶訓的實踐家。他們的意見大相差別，但是他們倆都為同一目的而奮鬥。所以我們無論轉向到普通人民所有暗晦的宗教的共產主義理想，或是向着城市的無產階級，或是看到革命的知識階級，我們到處可以遇見這種同樣要創造共產主義式的志願與希望。所以若使俄羅斯在從新建設共產主義方面失敗了，那末牠總不是因為缺少共產主義的理想。

列寧和他的信從者都是依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所以他們最先注意改造俄羅斯為一種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他們最後的目的好像他們無政府主義的親屬克魯泡特金那樣要解放一個人的個性，並且要在心靈與知能方面准許有一種很

大的異化作用。但是他們希望藉着經濟的平等可以得到休戚相關的團結，所以他們最初的努力是要打倒資本階級並且廢止私有的工業與物產（土地包括在內）。他們在使生產，運輸，與分配的社會化方面已經有一部份的成功。從這樣急進的改變中即刻發生的結果當然是生產方面的退落。這種情形又經過內戰，封鎖，與飢荒的破壞工作就更變壞了。其結果大概使生活程度降低而簡單。從前有一個到俄國來遊歷的美國人詢問蘇維埃政府的委員，城市中的窮民住在什麼地方。這個委員很驕傲的回答說，在他們中間是沒有窮人的。若使他說在他們中間沒有富人並且幾乎一切的俄國人都是同樣的窮，那末這句話恐怕更加切實些。幸喜這種經濟程度的簡單化現在已經變成一種社會的習慣，就是在俄國的知識階級中間也是如此。這種愛好奢侈和生活程度很高的資產階級與俄國貴族差不多已經消滅了。新經濟政策的危險——就是要復興資產階級的生活形式——並不見得什麼厲害。有幾個住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很舒服的外國人也不能引起人家的注意。所以社會

的模仿性是趨向于簡單生活的習慣。蘇維埃共和國的領袖所得的酬報並沒有比一個精練的工人所得的要高，而且他們又恐怕受他們無產階級同志的批評，當然要表示簡單的樣式，擯除公開的糜費。所以這種使西方世界敗壞的大問題在蘇聯地方一直還沒有存在。蘇維埃政府確是要盡力照着近世節省勞工的方法以改組牠的工業和增加生產的效能。然而牠這樣做乃是因為要減少作工的時間，以脫離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這種標準化與簡單化的經濟制度顯而易見的要產生一種極大的剩餘，非但在物品方面，並且在知識的與心靈的能力方面。這些能力可以轉變為真正文化的價值。這種能夠深切的鼓動民衆情感的革命已經把許多遺傳的思想掃除，並且差不多已經使這種青年人變成一張文化的空白紙，幾乎任憑這種多才的年輕的勇敢的國家用牠覺悟的創造衝動來寫些隨便什麼東西在上面，無論新舊都是可以的。

共產主義的經濟秩序自然對於文化生活的發展是很適宜的。在西方科學上，

藝術上，教育上，甚至哲學上有極大天才的人是容易變成商業化的。例如，在美國地方，這種多才的油畫家會即刻爲了商業的緣故而降低了他的藝術，或是變成一個通俗雜誌的插畫家或是做了一個廣告的畫師；因爲「這是有金錢關係的」，並且各人都需要全錢來迎合時代的風氣與嗜好。畫家愈能降低他的藝術以適應羣衆邪僻的風味，那麼他愈能得到金錢。戲劇·音樂，教育，文學，發明，甚至哲學都有同樣的情形——牠們都必須想法得到「最好的銷路」，那就大概要降低程度以推廣營業，使企業家獲着極大的利益。

在蘇聯的情形是相反的。文化界中功利的動機已經大大的減弱。戲院已經變成真正藝術的保護者，淫蕩的跳舞與奇觀的電影都被禁止。那邊現在所有的影片大半用作教育與宣傳的方法。

在這種文明裏有沒有宗教的地位，尤其是基督教有沒有一種尊敬的地位？

這種共產黨員確切的說「否」！他相信將來是屬於唯物主義的哲學。照這種

哲學看來，一切的東西，無論是看得見的或是看不見的，實體的或是精神的（人也包括在內）都是宇宙間的能力或是物質的一種表現。人不能夠和他所居住的行星分離。他必須決定他自己的命運。他不能夠希望從鬼神方面得到任何的助力。他就是他自己的上帝，也是自然界的主人或奴隸。他沒有別種未來的生命，所以他必須在這個世界上充分的發展這種生命。他的方法就是科學與合作的勞力。他的目的就是美與善的生命。那時沒有富人的剝奪，也沒有特權的階級；但是一切民族都爲了公共的利益互相同居合作。他相信宗教是一種反動的現象。這種現象是人從古昔不能反抗自然而生活在恐怖與幻想的時代遺傳下來的。從歷史上看來，宗教已經變成一種侵略別種階級與壓迫窮人的主要工具。沙皇的統治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共產黨員是一個戰鬥的唯物主義者與無神主義者。他非但要求他黨裏的黨員承認無神主義，而且也很熱心的向非黨員宣傳他的無神主義與唯物主義的哲學，

還要打算教育青年的計劃，以預備將來的新時代都相信一種唯物主義的人生觀。

共產黨已經發起組織一種特殊的宣傳團體，稱爲「無神派聯合會」(The Union of the Godless)。牠接受非黨員並且要用那些和宗教團體很相似的方法來積極進行反宗教的宣傳。他們的工作也借助於文字，特別研究班，規定的演講會與討論會等等。這個聯合會祇要得到一羣信從的人，就到處組織牠的支會，並且最注意于工人與農民。牠也有特別的部份專門在非基督從的宗教與異教徒中間工作。

這種無神派的聯合會得到共產黨充分的助力，其實不過是牠的一種宣傳機關罷了。這個聯合會發行了一種週報，一種圖畫雙週刊，一種月刊，以指導和幫助無神主義的教師與鼓動者的工作。

牠的工作已經成功了嗎？無神主義在民衆與共產黨的黨員裏面很通俗的嗎？照無神主義運動的領袖所講的話看來，他們的宣傳工作遇着很大的困難，一方面

因爲黨員的不偏態度（他們想加入了無神主義派而不表示依附任何的教派就算盡了他們的本分），另一方面因爲民衆的反對。所以在烏克蘭地方共產黨覺得無神派聯合會的繼續存在，於政治上有所不利，所以就把它停閉，另外用更加間接的方法來進行他們的宣傳運動。

這種對於宗教所有粗暴的譏笑，如同無神派報紙裏的諷刺畫，少共的聖誕節狂歡會，以及常常對於教會所有不正當的攻擊大概發生一種相反的結果。有許多旁觀的分子本來是取冷淡態度的，現在却站在宗教這邊了，這一切情形很快的爲共產黨所見到，所以在第十三次大會中（一九二五年）牠就決定一種關於宗教宣傳的新政策。這種決議案的大綱如下：

「我們必須確切的停止用行政方法來戰勝宗教成見各種努力，如同封閉禮拜堂，回教寺，猶太會堂與祈禱所。在鄉村裏的反宗教宣傳必須拿唯物主義來單單解釋農民所熟悉的情形。說明風雹，兩水，旱荒的來源，害虫的發生，泥土的

性質與肥料的作用等等是反宗教宣傳最好的方法。這種宣傳的中心機關應當設在學校與閱覽室裏面，並且要受黨的指導。

「我們必須特別留心信徒的宗教情感不致受着損害。要得勝這些情感祇得經過長時期堅忍的教育工作。這樣的注意在東方的共和國與省區中尤為需要。」

「我們必須特別切近地注意異派的教徒。在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已經在沙皇治下受過極慘酷的逼迫並且從事大的活動。我們必須用圓通的手段來引導他們加入蘇維埃的活動，因為在這些異派教徒當中也有許多經濟文化的分子。爲了異教徒既然如此衆多，那麼這種工作是有極大的重要。這個問題必須酌量地方的情形而解決的」。

這種決議案的結果就使反宗教宣傳的性質大大的改變了。鄙俗的譏笑漸漸的減少了。關於自然和人類歷史的解釋雖是偏面的，但更爲真切了。現在反宗教的報紙正在刊行那些關於通俗科學，人種學，宗教歷史學與聖經批評學的文章。其

中有許多文章能夠爲任何宗教的信仰者所歡迎，只要他的神學思想不過分近於基要主義派就是了。這種宣傳會激動人的思想，並要喚起守舊的神學家重新整理他們的思想。這樣的宣傳對於真正精神的宗教也明明沒有危險的，却反變成了牠一個間接的聯盟者。

這個問題是常常被人們提起的，就是說：共產主義的本身會不會變成一種宗教？有一個時期似乎牠已經上了這條達到那個地步的軌道。盧那查爾斯基在革命以前曾經寫了二冊書，名爲『宗教與社會主義』。他在這種書裏面主張說：「馬克思主義好像是一種新的深切的批評的和純粹的哲學，同時也是一種綜合的宗教制度」。他又說道：「社會主義者若爲了這種世界的宗教染了反動的污點，就對於宗教取漠視或是反對的態度，那是沒有理由的。從清潔的口中說出來的話是清潔的，若使社會民主主義說，「是的，我是一種新的強大的宗教勢力，並且在我裏面所懷着的宗教將要吸收和替代其他一切的宗教，因此就把宗教抬舉到一種更

高的權力」，那麼牠一定會得勝的」。

著名的小說家與革命以前的布爾什維克黨員高爾基在他的著作中常有同樣的精神。至于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也覺得宗教的需要，並且想給社會主義運動一種有組織的宗教的表示。這種思想的趨向是爲列寧所極力反對的。他覺得任何宗教的說法會減少階級鬥爭與分散真正革命戰爭的注意力。他說：「無產階級是我們反資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革命的領袖。牠的黨定然要做精神上的領袖以反抗中古主義一切殘餘的東西——包括舊式的宗教——並且要想各種方法——依據一種改良家或是完全新的原則——以刷新或是改造牠」。

在他死了以後，有人要想從他的人格方面發明出一種教派來。所以在各個機關或是俱樂部裏設立了一處所謂『小的紅室』，裏面陳設一個列寧的石石膏像，在像的座子下面鋪了紅旗，並且在牆上掛滿他的遺訓。在這個大領袖的聖所裏，機關中的人員都聚集攏來，研究他的著作和討論他們的問題。

在鄉村與工廠的區域中也有人提倡紅色的洗禮，紅色的婚禮與紅色的葬禮。這些事情完全都要用特殊的共產主義的禮節表示出來的。特羅次基很贊助這些努力，並且承認這種戲劇化的家庭風俗乃是一般人的單調生活中所必需的。他說：「這種需求有一種外面表示的情感是最有力的並且是最合法的。……創造一種革命的社會禮節……以代替教會的儀式非但在社會與國家的慶祝典禮中是可能的，而且在家庭的事務裏也是可能的」。

這種確信共產主義者的宣傳熱忱也和一種宗教運動有些相同的。他們在無神主義方面的宣傳也和宗教的宣教師有同樣的精神。有人講起這位著作家柏林斯基 (Belinsky) 乃是革命的知識運動的祖宗，並且有一個基督徒的心腸，却有一種異教徒的頭腦。有一次他和屠格涅夫 (Turgeneff) 討論幾個哲學問題的時候，因為討論得很熱烈，就把午餐的時間也忘記了。那時屠格涅夫提醒他用餐的時間，柏林斯基就喊着說：「呀，我們還沒有決定上帝的存在，你就要用餐嗎？」柏林

斯基本稱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然而他是俄羅斯最富有心靈的子孫中的一個。

在這一方面，一個人也許可以稱共產主義運動是含有宗教性的。但是因為共產黨竭力的反對這樣的尊稱，並且禁止黨內各種提倡組織宗教的嘗試，所以稱牠爲宗教是沒有用處的。共產黨自身統治了一個很大的國家，並且牠的能力已經爲管理的責任所吸收，所以宗教的心理很難普及於黨員中間的。共產黨如果繼續得勢，那末牠漸漸的要變成一種招募與訓練政府中管理人員的中心，所以這些有宗教心理的人就要離開牠，去尋求別的組織，以表示他們對於宗教積極的或是消極的情感。

那末，在蘇聯地方宗教的將來是什麼呢？牠要照大多數共產黨的領袖所想的那樣終歸消滅呢，還是要從我們研究俄國民衆的宗教心理方面所得的可以斷定俄羅斯的人民正在開始一種宗教的創造時期，並且在這個時期裏無神派的宣傳無論怎樣壓迫，他們還能夠表示他們固有的宗教衝動呢？要做一個先知是一種危險的

事，但是即使在一個不經意的觀察者看來，這種民族中既然在文學方面產生了一個托賓斯泰和杜斯拖夫斯基，在哲學方面產生了一個索羅維夫和斯科甫拉德（Scovrade）在音樂方面產生了一個察科夫斯基（Tchaikovsky）與立姆斯基考薩科夫（Rimsky-Korsakov），在油畫方面產生了一個普利諾夫（Polenov）與發斯尼礎夫（Vasil'ev）——總之，一種在文化中富有高深的宗教產物的民族會即刻失掉牠的心靈，去投降一種異族的表面的好戰的唯物主義的人生觀——那是不可思議的。

如今在近世科學的假設與殘餘的煩瑣神學中間發生一種很厲害的衝突。後者當然會順服近世的科學，並且在蘇聯地方那些信仰一種不妥協的基要派主義神學的教派與教會必須要經過一種痛苦的從新整理的歷程。

幸喜這種注重美的禮節中神秘表像的東正教會不會受着理性主義與科學批評多大的損失，因為這些東西不能攻擊宗教情緒的真正泉源。在另一方面看來，東

正教會大概在教育 and 社會服務的活動裏而終不會變成一種重要的因素，因為教育已經被政府和共產黨當做一種必須熱心防護的專利權。這些異派教徒大概在道德的控制方面與經濟的和社會的合作方面——出于宗教情感的激動——也有很大的貢獻。他們和這班「舊信徒」是鄉村中最富足的與組織最好的部份，因此他們在建設蘇維埃共和國的道德原質方面也要發生影響的。所以一種清淨的宣傳福音的教派和東正教會中一種神秘的美的宗教儀式將要和無產階級革命的理想主義一同繼續的存在下去。

共產黨的唯物人生觀究竟會不會克服人民宗教的情緒與儀式，在最後分析起來，那是在乎人的本性問題。如果宗教的情緒是人性中一種真正的，整個的，基本的部份並且不能為共產黨員努力發展的科學，藝術，和社會事業所替代，又若使宗教是一種普遍敬拜和神（已知的或未知的）契合的精神，那麼在蘇聯地方將來一定有宗教。倘然在宇宙間是沒有活的神並且宗教不過是一種自欺，那麼這種欺

騙將要受着唯物主義極厲害的批評。但若無神主義是一種錯誤，那麼共產黨的哲學將要經過一種變態作用或是自身要形成一種宗教，或是要把牠的範圍縮小到政治與經濟的功能，很像世界上別的政治組織一樣。無論將來的結果怎樣，凡是愛好真理的人祇有歡迎蘇聯對於社會革命的大試驗，因為牠要在革命批評的火焰中大膽的疑問和復試各樣的價值，其中最精細的價值就是宗教。

附錄

(一) 蘇俄非基督教的與異國人的宗教

本書的目的是在討論這些與俄羅斯人民多少有直接關係的宗教狀況。我們若使要敘述現在住在蘇聯地方各種民族的宗教生活以及別國人的宗教。那是不能可能的。並且是越出了本書的範圍。除了基督教的宗教以外，那邊大約還有三百萬的猶太教徒與一千五百萬的回教徒，韃靼人，和別種土耳其的民族——如同阿耳

側巴章人 (Artsersbadjans) 烏斯佩克人 (Usbeks)，以及許多所謂異邦人的宗教。在蘇聯的法律方面一切宗教都受同樣的待遇。但是回教徒得到一種特別的利益，因為蘇維埃政府對於他們有一種特別的規定，就是准許他們的兒童在十四歲以上就可開始在特殊的宗教學校裏受宗教教育。其他一切的教徒，無論是基督徒，猶太教徒，與異教徒祇准對於十八歲以上的兒童施行有系統的宗教教育。至于政府准許回教徒對於十四歲以上的兒童可以施行宗教教育的緣故，也是因為回教徒的子女必須學習阿刺伯文，才能明白可蘭經，所以需要一種較長的時期以研究他們的宗教。

在異國的基督徒當中路德會教徒與天主教徒是應當特別提出討論的。

在舊俄羅斯帝國時代，已經有許多路德會的教徒，尤其是在沿波羅的海的省分，芬蘭與伏爾加沿岸的德國殖民地方面。在這些人當中只有伏爾加沿岸的德國人現在還算在蘇聯的國界裏面，另外還有些散居在各處的德國人與斯干的那維亞

人 (Scandinavian) 的小團也是路德會的信徒。路德會在法律上的地位和蘇聯地方一切別的宗教是一樣的。但是因為在他們中間有些富庶的德國人已經去世，所以有許多路德會的教堂尤其在大的城市裏面，難以維持下去。

羅馬的天主教會當沙皇時代，在波蘭人中間是最有勢力的。自從波蘭獨立以後，牠就在蘇聯的範圍以外了。然而在邊界地方，尤其在白俄與烏克蘭裏面，還有少數信仰羅馬天主教的波蘭人的團體，並且在較大城市中，尤其在列寧格勒與莫斯科地方，也還有許多天主教的教區，不過牠們裏面的信徒差不多都是波蘭人與別的外國人，所以不能算為俄羅斯人民宗教生活裏的一種因素。在天主教的宣教士方面，雖然努力的勸化希臘正宗派教徒可是他們在俄羅斯人中間一點沒有成功。他們祇能在加拉西亞人 (Galicians) 中間得到些信徒，因為那邊的天主教宣教士受了波蘭政府的保護，並且後來奧地利亞政府和希臘正宗派教徒妥協，准許他們可以維持他們舊的儀式，所以他們對於加拉西亞人允許承認羅馬教皇的權

威也就滿意了。在加拉西亞這個教會是稱爲「統一的教會」，但是牠從來不能傳播到俄羅斯帝國境內烏克蘭人的中間。

在羅馬天主教會與俄羅斯正宗派教會中間常常發生一種極大的仇恨。這種理由一部份是因爲對於波蘭政治上的仇恨，一部份是因爲種族上與心靈上的種種關係——拉丁的文字與儀式不合俄羅斯人民的心理與口味，因爲他們的文化和拜占庭式的基督教一同發展出來的。在沙皇治下，羅馬教會只被容納爲一種外國的宗教，但不許天主教在俄羅斯人中間——尤其在普通的人民中間——宣傳教義。這些耶穌會的教士在俄羅斯貴族中間所做的勸化工作也有幾分的成效；例如，在王子加利親（Galitzin）馬戲諾夫（Martynov），與加加麟（Gagarin）的家屬中有些人歸依了天主教，所以沙皇就下令把他們一概驅逐到國外去。

十月革命給羅馬教會同等的權利，但也要求羅馬的教皇承認蘇維埃政府對於教會所公佈的法令。羅馬教會的領袖起初爲了便利起見就允許服從蘇維埃政府的

法律；但是後來他們在大主教謝普拉克（Chepiak）領導之下，就改變了他們的態度，並且在政府沒收教產作為賑飢款項的時候，天主教皇就和蘇維埃政府公然發生衝突。其結果布德基維赤（Budkevich）就被槍決，謝普拉克和他的十二個祭司也受拘禁。自從那時以後，情勢又變好了。在監獄中謝普拉克和他的祭司或被開釋或與波蘭的政治犯交換。現在的天主教會已經完全服從蘇維埃政府的法律了。牠的教堂都已公開並且可以舉行禮拜儀式；但是牠在蘇聯地方還沒有委派主教，所以那邊主教的職務不時由波蘭下來的主教執行的。

（二）編者的附註

在這書寫成以後，全俄正宗派教會的代理教長塞耳給（Sergei）發表了一篇宣言，是由他的議會中六個會員副署的，其中有幾段話如下：

『我們教會中的工作人員並不和蘇維埃政府的仇敵結合，也不和無意識的隱

謀的武器同工，但是我們要和我們的民衆與我們的政府一同工作。……

「現在在蘇聯境內的正宗派教會非但在教會的法典上而且在政府的法令上都是完全合法的。……」

「我們必須表明我們非但在言語上而且在行爲上能夠做蘇聯真正的公民，並且能夠像非教徒那樣的盡忠于蘇維埃政府。……」

「蘇聯每次所受的打擊，無論是戰爭，抵制，或是任何的災難，或是好像華沙地方的秘密暗殺事件都能感動我們，好像一種對於我們的打擊。……」

「我們要求一切在國外的祭司應當用書面證明他們在外邊所做的一切工作是完全順服蘇維埃政府的。那些不肯證明或是違背他們宣言的人，都要從教士團體中開除出去」。

以上的宣言是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簽定的，並且在八月十九日的新聞報上發表過的。牠可以顯然的表明俄羅斯正宗派教會的中央行政部對於蘇維埃政

府有任何正式的反對從此停止了。

哲羅姆大衛斯

(三) 譯者的補白

本書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出版的。牠裏面所講的當然是限於那年以前的事。那麼，在最近的三年中，蘇俄統治下的宗教又遭着什麼命運呢？我想這是讀者們都歡喜知道的，所以我就不妨把我近來在英文雜誌與報章上所讀到的幾篇關於蘇俄宗教的論文或通信節譯幾段出來，以補本書的不足：

(1) 辰伯林的『俄國人在心靈上的奮鬥』

「……在一九二八年一種更活動的反宗教政策的氣象便開始發現了。……」

「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中間的冬天，這些浸禮會教徒受着了幾次的打

擊。……在一九二九年的春天，莫斯科的浸禮會神學院只好暫時停止活動。雖然在我寫這文的時候我還不知道牠究竟有沒有確定永遠的停閉。

『在一九二九年四月的下旬，蘇聯政府公佈了一道新的法令，以限制宗教團體的活動。其中有兩三條的規定可以阻礙異派教徒兩種主要的活動：就是從中央機關遣派教士出去傳道；和擴充教會在教育，娛樂，和慈善方面的事業。這種法令的第十九項規定說：『教中的牧師，傳道者，使者等等活動的區域是限于他們服務的宗教機關與禮拜堂的所在地』，這當然要限制遊行的傳道者與宣教師。

『法令中的第十七項又要禁止宗教的團體：（甲）創立互助會，合作社，生產團，以及普通利用他們所有的財產來達到宗教以外的目的；（乙）供給教友物質上的需要；（丙）組織特別的兒童會，青年會，婦女會，和祈禱會，以及普通的聖經研究班，文字宣傳部，平民習藝所，宗教教育會，旅行團，幼稚園，圖書館，閱覽室，休養院和藥房。……在禮拜堂裏也只准保留宗教儀式上所必需的

書籍』。……

『這種封閉教會而通常改爲俱樂部，學校，或別種公衆場所的趨勢更加擴大了。在一九二七年中有十七所禮拜堂，三十四所修道院，十四所猶太會堂和九所回回教堂都被封閉；在一九二八年中的數目增高到三百五十九所禮拜堂，四十八所修道院，五十九所猶太會堂和三十八所回回教堂。然而這些被封閉的教堂和別種禮拜堂還算少數，因爲現今在蘇聯地方估計一共尚有五萬活動的教堂呢。……

『浸禮會的領袖宣稱在俄國的浸禮會教徒中百分之九十五是農民，其他大半是工人，尤其在頓尼次（Donets）一帶地方的礦工中特別進步。……

浸禮會的教徒承認有二十萬教友和一百萬的慕道友（連教友的家屬也計算在內）。他們在烏克蘭的鄉村中最有勢力。他們的月刊就是叫做『浸禮會教徒』（Baptist），最初可發行七千份，現在已減少到四千份。有一個時候他們被准許刊印二萬五千本聖經，後來這個數目却也減少到二千五百本了。……

『蘇維埃政府雖然對於任何宗教都不表示特殊的好感，可是正宗派教會中的聖議會（活教會派的中央行政機關）能享受兩種特殊的權利是爲守舊的替康派所未有的。這兩種權利，就是：（甲）開設兩個神學院，一個在列寧格勒，還有一個在莫斯科；（乙）發行一種刊物名爲『聖議會的使者』（*Messenger of the Most Holy Synod*）專載神學上的文章與攻擊替康派和異派教徒的言論』。……

『但是，宗教既是一種成熟的個人信仰，那麼牠經過了試驗和官廳反對的時期，大概不致變弱，反能強固起來。俄國哲學家索羅維夫說他的國人是一種「尋找上帝的民族」。若使在那些脫離了共產黨所允許的「人世天堂」的人們中間舊宗教的趨勢——神祕主義的和理性主義的——將要強固起來並且新的宗教也會發生出來，那麼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William H. Chamberlin（見一九二九年九月份的大西洋月刊 *Atlantic Monthly*）

(2) 斐尼斯的「蘇俄政教衝突的歷史」

「……歐美各國所說的蘇俄迫害宗教的情形，有多少是根據事實的呢？照基督教與猶太教領袖所宣佈的罪狀看來，似乎是很確切詳細的。其中述及殺害，監禁，放逐，沒收教產，取消教區，以及在蘇維埃政府保護底下種種褻瀆教會的宣傳運動。但在另一方面，却有人辯駁說，這些罪狀不能斷定俄國是否認宗教自由的。在二月十四日與十八日，俄羅斯教會的首領塞澤阿斯總主教和聖議會的會員都鄭重否認共產黨有迫害教會組織或教友個人的行動。至於處罰祭司教友，以及封閉教堂和沒收教產的特殊情形，也都依據國家法律與人民利益而施行的。美國猶太人農村居留地駐俄辦事處主任羅森博士 (Dr. J. A. Rosen) 也公佈一文，同樣否認俄國猶太教徒有被迫害的情形，並且舉出許多證據，以說明蘇維埃政府對於他所代表的運動，曾慨然予以經濟上與道德上的助力。還有歐美各種激烈的

工人雜誌照常把這些事情完全當做俄國的資本家敵人所捏造的反宣傳。二月二十六日，在紐約太陽日報上曾經登載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里可夫（Alexis Rykov）一篇替蘇維埃政策辯護的談話說：『蘇聯地方教會的數目確已減少了許多。但這是因為各種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緣故』。在另一方面，里可夫又說，每次處罰祭司的事件都是由于反革命活動的結果，而教堂的被封也出于本地人民的請求或因為教會經濟的缺乏。蘇聯對於一切的宗教信仰都准許有完全的自由權。……

「無神派同盟可以代表黨的口氣談論一切宗教的政策。當上月各國反俄潮流很高的時候，這個團體却大膽的向全世界宣言，要在五年之內，把俄國境內的宗教完全消滅，誇稱牠在過去一年中所有的成績。照牠的統計，俄國一共有五萬教堂，在一九二九年當中已封閉了一千三百七十所，但在以前的十年中只共封閉了二千所。至于在去年被封的的教堂中有一千一百一十九個基督教堂，一百二十六個猶太會堂，一百二十四個回教堂，還有一個佛教禮拜寺。大多數的教堂都改為

教育的機關與兒童教養院；其他也有變成電力廠，工廠，醫院，會食堂以及積穀倉。教堂裏的大鐘已被鎔化爲工廠的材料，聖骨就當衆焚毀，而金銀寶石都被一律充公。……

「在過去幾個月中，蘇俄政府對於祭司的刑罰更加嚴厲了，並且反對教會的舉動更加公開了。有許多祭司已被槍斃了；整批的男女修道士已被放逐了；還有很多教徒的財產也被沒收了。實在講來，這些事情並非是宗教政策的一種方式，却是五年經濟計劃（尤其在農業方面）的結果。……這種運動不但可以消滅農村中的教會，並且也可以打破全體的祭司階級。……在城市中，這種五年計劃也使教會受着間接的影響。所謂「不斷工作的星期制」可使安息日變爲不休息的日子。在星期日既有七分之一的工人必須做工，那麼就使教會的禮拜儀式大受影響。規定四天通俗的例假以替代教會全年的節期又同樣可以減少民衆對於教會的助力。無神主義派所有不斷的反教行動或許是因爲他們要擁護這種經濟計劃的緣故。

所以我們不妨可以說，在蘇俄地方沒有一個人是爲了宗教信仰而受迫害的。其實，蘇俄本沒有直接否認人民信教自由的法令。然而蘇俄全部的政策却使宗教的團體沒有活動的可能，並且牠們要供給人民的需要，就非犯法不可。這種形勢當然因爲政府厲行五年計劃的方法而更爲緊張。在上月世界各國反俄怒潮最激烈的時候，有許多教會已經爲了不贊成五年計劃而被封閉，還有許多宗教的領袖也爲了批評這種計劃而被拘審。我們還須等待着那些共產黨員敢冒不韙去破壞自己的人民與世界普通人類最深切的道德情緒是否已在他們自身面前築起了一塊牢不可破的障壁——就是心理上的反感』。——Edgar S. Furniss（見一九三〇年四月份的現代史事月刊（Current History））

（3）杜威的「蘇俄政教衝突的解釋」

「……蘇俄已經從兩方面猛烈的攻擊宗教。一方面牠相信共產社會的創立自

然會排斥人民對於宗教理論上與儀式上的興趣。……他方面列寧也確切無疑的覺得要達到他的目的，現存的教會乃是他所建設的新社會制度的對敵。……這兩方面的思想與行動的結果就使共產主義自身變成了一種對敵，並且是不能忍容對敵的宗教；所以在共產黨員看來，任何制度的教會要有權管理牠信徒的社會活動就是建設了一種對敵反抗的政治團體。共產主義的宗教性質與教會的政治經濟性質實在是這次激烈反教運動的原因。……

「凡是到過俄國觀光的人都承認這種反宗教的宣傳運動已經在青年界中奏了奇特的成功。……但有一樁事情是值得我們更加注意的。蘇俄當局會測驗小學校裏學生的信仰。這種統計的結果很使他們驚訝，因為百分之五十的小學生仍然相信上帝的存在。這是兩年以前的事，並使他們對於剷除學校中此種信仰方面要加倍的努力。……」

「……俄國政府對於教會嚴格的宗教活動和牠社會的組織與宗旨的界線劃分

他們是爲了教
會的財和特權而
鬥爭，並不是爲
了教文呀

得很清楚。這種分別乃是整個蘇維埃制度在實施上必然的結果。所以攻擊蘇維埃政府的反對教會的社會活動，祇能促進牠堅信個人的宗教乃是藉着政治，教育與經濟的活動，以掩護牠顛覆他們所建設的新社會的陰謀」。——John Dewey
(見全上月刊)

(4) 窩爾士的「蘇俄仇教運動的一瞥」

「……俄國自從革命以來，百分之五十的天主教教士已經因爲槍殺，餓死，放逐，拘禁而不知去向了。他們殉道的經過是一種久長而又光榮的歷史。……」

「如今蘇維埃直接攻擊宗教的方法已經擴大到全俄民衆了。牠又創設和資助一個猛烈的『無神派同盟會』。該會共有二十五萬精密的宣傳員。他們的行動是受民衆訓練部的指導，爲紅軍槍砲所保護，有無所不在的政治偵探使者，又爲地方蘇維埃及工會所獎勵，所以他們正可以熱烈的污辱國家的靈魂，尤其是對於

小孩子方面。在最近幾年中，差不多有二千萬份的『無神者』雜誌——裏面都是些不堪形容的褻瀆言論——已分發到各個家庭幼稚園；還有二百萬冊足以毒害人民的及宗教書籍也傳佈到全國了。一萬多反宗教的俱樂部，在警察保護之下，可以到處宣傳殘暴主義。有許多特別惡劣的影片在幾千神聖的場所放映，因為這些地方現在都被沒收而改為俱樂部，博物院或戲院了。有九個大學完全把牠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攻擊上帝方面，並且在各個城市與鄉村中的教員也爲了怕黨裏刑罰的苦痛，只好勉強和這種可惡的運動合作。

『一九二八年的聖誕節，在彼得格勒一處地方已有了七百次反宗教的示威運動，而蘇維埃政府的教育部長盧那查爾斯基也用國家無線電台廣播他反對上帝存在的演說。去年的聖誕節又重演同樣的巴戲，而在今年的復活節恐怕還要發生嘲

笑宗教的舉動哩！……——Edmond A. Walsh（見全上月刊）

(5) 凱洛克的『蘇俄反教運動的辯訴』

『……據二月十六日紐約泰晤士報所載猶太通信社的一篇論文說，關於規定宗教團體的根本法律已完全爲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公佈的命令所改變了。其實，教會的法定地位自從一九一八年一月的法令公佈以後，從未改變過。……一九二九年四月的法令所有唯一的重要改變乃是規定宗教的團體只限於做純粹宗教的事工。

『蘇聯對於有組織的宗教所定的嚴厲限制，從歷史的背景上看來，是顯而易見的。共產黨對於有組織的宗教是明白反對的。在另一方面看來，蘇維埃政府處理教會問題的手段總算保守得很，尤其在俄皇末年的教會景象可以顯出非宗教的反動是必然的結果。……』

『教會可以舉行禮拜儀式，並無政府干涉。雖有少數的教堂爲地方當局所封

閉或移作公用，但是這些教堂差不多都已失却宗教功用了。宗教的信徒並不爲宗教信仰而被捕，而教士也從未爲了宗教活動而被殺。這種荒謬的消息，就是說只有相信無神主義的蘇俄國民纔能得到麵包喫的話，當然是毫無根據的」。……

——Harold Kellock（見全上月刊）

（6）基因的「無神國的建設」

「……最近有一種莫斯科報紙很坦白的批評國外教士的反俄運動說，『我們是在建設一個無神的國家』。

『蘇聯的副主席斯密道維赤（Peter Smidovitch）對於聯合通信社記者差不多也作了同樣的談話。

記者問：『你們所要達到完全社會化的目的是否也要完全消滅宗教？』

『斯密道維赤回答說：『我們希望如此的，但不願用武力促其進步。我們相

信文化發達以後，宗教自會滅亡的」。

「斯密道維亦是中央執行委員會宗教管理組主任。所以他對於教會事業所發表的言論可以當作最後的權威。

「他又說道：『有許多地方，確有頭腦過火的人常要對於教徒施行非法的野蠻舉動，但在莫斯科的領袖，頭腦冷靜，很明白歷史上的教訓，也知道武力適足以阻礙並非促進反宗教的運動。』

「我們常常駁斥各地封閉祈禱所的決議。政府是要保障宗教活動的必要條件。祈禱所的附近若無別的禮拜堂可以供給信徒的需要，決不會封閉的。況且這些信徒在法律上也完全有請願中央政府之權」。——Ed L. Keen（見一九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的上海大美晚報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7) 帕特蒙的「蘇俄反教運動的實況」

『……蘇俄反宗教的戰線確使教會產業與宗教組織受着極大的損失，但我們也不可承認牠的好影響。宗教上的分派都無形消滅了。教會的細胞組織已澈底澄清，好像原始的基督教一樣了。』

『在蘇聯境內，有許多地方的宗教儀式是秘密舉行的。聖經是不准刊行發賣的，但很有人將新舊約的經文或整部的福音書用手抄下來誦讀的。基督徒在火車上旅行的時候，極容易被人認識的。他們常是很熱心宣傳他們的信仰。宗教的迫害並沒有減少基督徒的熱忱；雖然他們一切的公民權是被剝奪的，甚至連在政府商場與合作社裏做買賣的權利也沒有的。他們的子女不准入國立學校念書的。這班人也被禁止進入公共的場所。他們若有產業，須納很重的稅，幾乎與沒收相等。……』——Louis R. Patmont (見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的上海大美晚報)

(8) 斯特龍女士的『蘇俄反教運動的觀察』

「……教堂納稅的問題是現在蘇俄反宗教運動中最有趣的一點。依據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九年法令，教堂是免租免稅的。但這種法令已經修改，差不多增加了四條。教堂既定爲國有的房產，也當繳納普通的火險費和一切房屋的捐稅。去年有一種法令，非但規定房屋要納火險費，並且房屋中容易着火的东西也要納費的；於是教堂中有些貴重的物品似乎都要納稅了。還有關於教堂所用的蠟燭和別種私人的營業要加增捐稅。……」

「宗教所受重大的危害，實在不是在政府這些法規，却是在乎這班猛力的共產主義的青年，因爲他們在全國青年界中熱心宣傳人能控制天然的信條。……」

「共產主義領袖所贊助的攻擊宗教的方法，大約可以分做三類；（a）實際的攻擊，就是改良農民耕種的方法，以免除天災；（b）理論的攻擊，就是用進化學說，解釋地面上生物的發展；（c）社會的攻擊，就是組織俱樂部，研究班圖書館，音樂隊，戲劇團等等以代替從前鄉村中唯一的社會團體。至於國外所傳

爲奇特的攻擊也爲俄國共產黨的領袖所不許。例如史丹林 (Stalin) 曾經很苛刻的斥責那些沒收教堂大鐘而自以爲「革命」的同志。……」——Miss Anna Louise Strong (見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七日上海泰晤士報星期增刊轉載紐約泰晤士報 (New York Times))

※ ※ ※ ※ ※

尾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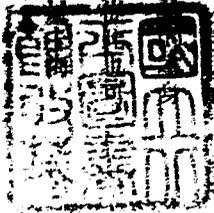
我想不到這本譯稿攔了一年以後還有出版的必要與可能。其實，關於蘇俄一切問題的書籍——無論是原本或是譯本——都須每年修補一回，重印一次的。我在過去一年中看到不少關於蘇俄宗教的補充材料；但因三餘無暇，沒有把每籍補入，又不能將全文譯出。這是我覺得很抱歉的。

我在校閱本書印稿尙未完畢的時候，忽又在了一本雜誌裏間接的得到一種很可

注意的消息說：『國民通訊社七月二十三日莫斯科電稱，莫斯科之主要猶太教堂前經共產猶太人請求封閉者，刻莫斯科市蘇維埃已遵照中央執行委員會新頒之保護宗教團體令，議決發還猶太人』。我不知道這種消息究竟可靠不可靠，我現在還沒有發出這種『新頒之保護宗教團體令』的內容是怎樣。所以我希望以後仍須時刻留心這個問題。如有所得，當先在新文社出版的野聲月刊上發表，等到本書再版時補入罷！

論到蘇俄政府對於宗教的態度，我想在五年計劃尚未完成以前，總沒有多大變化的。但宗教在蘇俄的命運究屬如何，這是要研究（一）人類是否固有宗教性的動物，（二）國民是否應享信仰自由的權利。關於第二點，是應當請全世界的法律家與政治家答覆的。不過對於第一點，我們已經知道俄國的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一種宗教——不妨稱為『列寧教』這是無可諱言的。所以我們想見宗教將來在蘇俄或全世界的命運了！

一九三〇年，聖誕節，



民國二十年一月初版

定價大洋壹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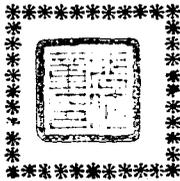
原著者 赫刻博士

補譯者 張仕章

發行者

上海狄思威路寶安路
新文社
五賢坊十二號

版
所
有
權



#24

443302